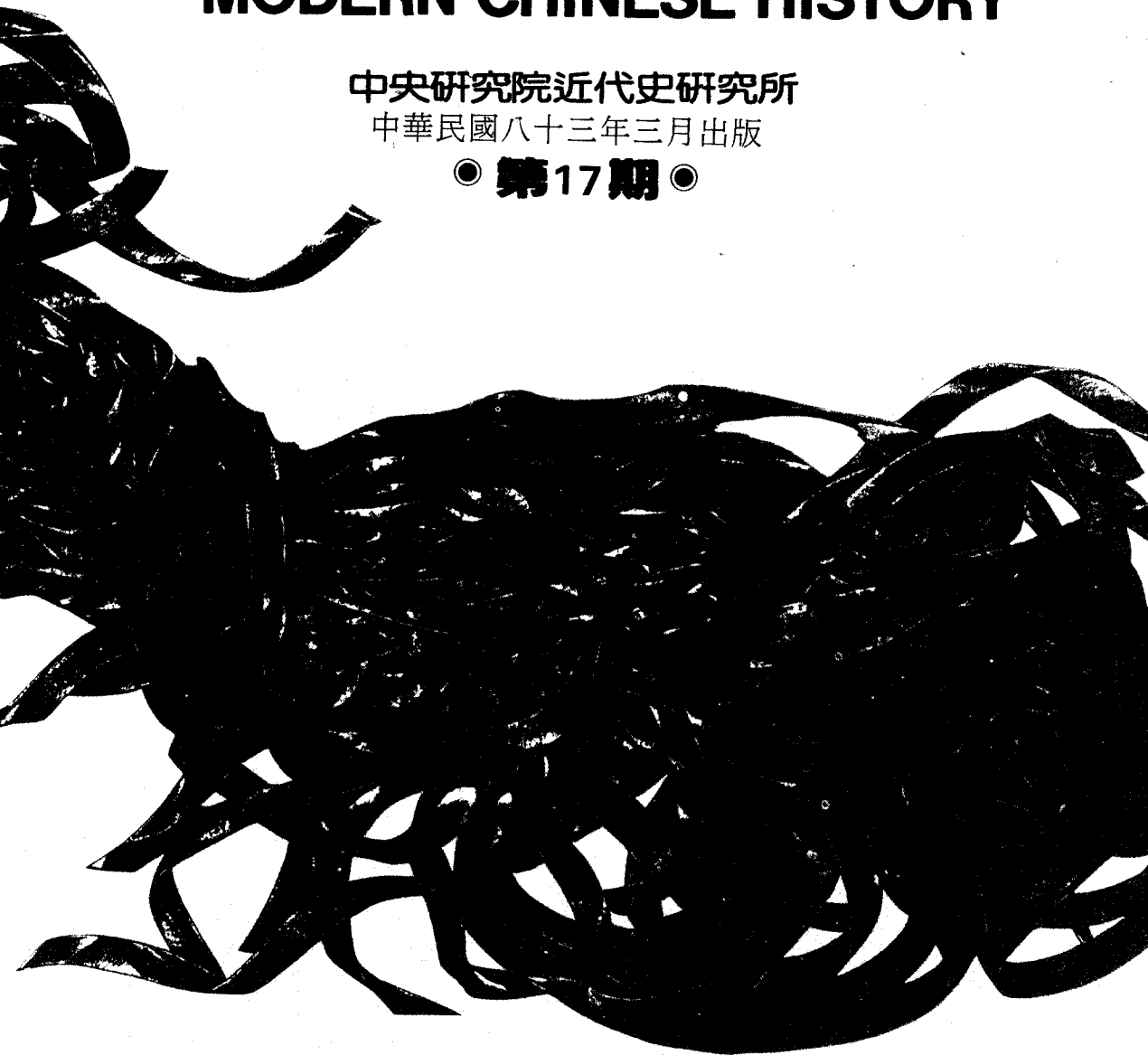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出版

◎ 第17期 ◎





↑ 中研院近史所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所合辦「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李遠哲院長致開幕詞

↓ 會場全景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出版

---

學術會議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許雪姬、謝國興	1
	曾國藩先生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呂實強	15
	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林滿紅	20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魏外揚	30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第43次全國學術大會……………塚本元	33
學人簡介	韋慶遠……………柏 樺	36
研究概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民國82年4月-82年12月）……………江淑玲輯	40
新書評介	「五四話語」之反省的再反省：當代大陸思潮與 顧昕的《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黃克武	44
	山本有造著：《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趙祐志	56
	Horst Gründer 著 <i>Welteroberung und Christentum. Ein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i> ……………Ursula Ballin	70
	杉山伸也、イアン・ブラウン編：《戰間期東南 アジアの經濟磨擦——日本南進とアジア・歐 米》……………王文裕	73
	Chieh-Kuo Pang 著 <i>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Taiwan Case</i> ……………陳秀珠	81
	李恩涵著：《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一九二 五——一九三一）》……………王綱領	98
	麥禮謙著：《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 社會發展史》……………張存武	101
	Key Ray Chong 著 <i>Cannibalism in China</i> ……………許文堂	104

---

史料介紹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蘇雲峯	108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藏中國檔案之介紹（一）……………林瓊柔	123
	俄羅斯檔案館中保存的有關中國的材料…A. M. Grigoriev	142
	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 1918-1937 ……………丘古耶夫斯基著、余敏玲譯	152
研究機構介紹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陳謙平	160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簡介……………曾碧霞	165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2年10月——1994年 3月）……………江淑玲輯	171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張珍琳輯	177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陳三井 張存武 林明德 劉鳳翰 魏秀梅  
             李健民 吳素樂 陳儀深 張啟雄  
 執行編輯 林明德  
 助理編輯 江淑玲 張珍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十七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250 元



學術會議

##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

許雪姬\*、謝國興\*\*

### 一、緣起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係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葉文心教授倡議，在得到教育部的贊助後，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此次會議的主旨在於就認同與國家的關係，作一廣泛而多層面的探討，以中國的歷史經驗為經緯，以西方的發展做側面的比較，因此設計出幾個研究主題：1. 認同與國家：總論與若干理論問題的探討；2. 戰爭、革命與認同感的建立；3. 認同、國家與現代化；4. 移民、社會組織與地方文化；5. 政治參與、政治文化、認同與國家；6. 文化的開放、閉鎖、疆界與國家形態、認同內涵；7. 宗教信仰、群體文化、與政治參與；8. 高等教育與群體自我意識的建立。除了上述撰稿方向外，對於臺灣近幾年來國內政治生態的急遽變化及本土意識高漲，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生存策略和發展前途，已成為社會高度關切的熱門問題，因此探討臺灣人（廣義的）的認同問題，應該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在邀請的對象上，以中研院各人文所、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歷史學及社會學教授為主，再加上院外學有專精的政治、社會、歷史學者。相關的行政配合，美國方面由柏克萊大學負責，國內出席者撰稿學者之邀請，議程的安排，及開會期間的工作則由近史所負責。為了要顧及美國學者專攻西洋史不諳中文；也為了使討論能更為充分，中、英文稿均由柏克萊大學負責翻譯成英、中文，同時也決定進行現場口譯工作。

### 二、開會經過

民國八十三年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認同與國家」研討會在近史所檔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案館召開，會議一連舉行三天，共發表論文二十篇，六篇由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撰稿，其餘十四篇為國內學者所寫。出席之中外學者約一百四十人。研討會進行期間，由梅纘月（Jun Y. Mei,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康豹（Paul Katz,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輪流擔任口譯的工作，兩人均具有歷史專業素養，在論文的宣讀與討論之傳譯上助益頗大。

大會開幕式，由李遠哲院士親臨主持（元月十五日正式接任中研院院長），他以自己一生中面臨三次不同的國籍為例，說明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困難性與複雜性。他認為由於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多，將會使下一個世紀的人類學會生活在一起，換言之國際化的趨勢已益趨明顯，這些主客觀因素，在討論認同與國家的問題時，亦應一併思考。

葉文心教授接著以會議引言人的身份發表她的看法，她認為，由近百年中國歷史經驗的發展來看，民族主義的興起，原先是一種反抗意識，從最早的反抗帝國主義到後來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是少數精英份子從上到下，鼓舞全國爭取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大一統理想與觀念是建立民族國家的精神指導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近代中國整合文化、建立民族國家的歷程，是在中西文化交接的過程中進行的，因此經濟跟社會的現代化，一方面固然促成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整合，另一方面卻也使中國的各區域（社區）呈現多元發展的現象，這種發展層次上的弔詭（paradox），是此次會議論文觀點呈現多樣、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此一層次的複雜性，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起點。

引言過後，接著展開歷時三天、十場的研討會，以下分場次逐一介紹：

- (一)第一場：1. 朱滋源「民國以來華人觀念的演化」（評論人陳其南）
- 2. R. Middlekauff “America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arly Republic”（評論人邵玉銘）
- 3. 陳儀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評論人 S. Barrows）

朱文將民國以來華人（泛指中華民族）國家觀念的演化分析成三種類型，一是政權核心地區（又以 1949 年劃分為前後兩階段），二是邊陲地帶（又分清末民初、二次大戰後、兩岸分立後三期），三是海外華人（又分清末、民初、抗戰、二次戰後四期）。其結論是：第一類核心區的政權在握有政權時，主張單一國制、主權絕對制；而喪失政權時，則強調分治的優點，多元治權說；第二類華人的思想則充滿族國主義思想，有建國的傾向，當中

央政權勢力弱時，就想爭取較多的自主權，甚至獨立；第三類海外華人的國家觀念變化最大，由於現實環境的變化，爲了求生存，使他們一步步的脫離「中國國民」的國家觀念。總之，民國以來華人國家觀念的分歧，愈久愈甚，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評論人認爲：無論中國或臺灣的民族主義，基本上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甚大，清末的革命爭的是政權的合法性，與嚴格的民族國家主義觀念所產生的行動不同，因此把現在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對政權、國家觀念的爭執，解釋成類似清末民初「中央與邊陲」的模式，並不正確。再者，中國或臺灣對國家或民族觀念的掌握與使用，跟世界上一般的 nationalism 不同，西方的 nationalism 含有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意義，強調 state、civism 等問題，而中國過去的民族、國家觀念是文化性的，兩者常糾結在一起，過去如此，今天仍是如此。另外，朱文將所有中國的民族含混的以「華族」稱之，可能會產生很大的爭議。

Robert Middlekauff 的論文篇幅不長，沒有引文亦無小註，類似通論性文章。其主要論點是：1776 年美國獨立革命前後，有一些不利於美國民族認同的因素存在，包括民族種類繁多、各殖民地（十三州）差異很大、各地語言不同、宗教教派林立、地方文明特色不同，尤其缺乏一個共同的殖民地政府；不過換另一個角度看，也有一致性的因素，諸如：一種比較英國式的「標準」文化（大傳統），以英語作爲官方語言，教派林立但不失寬容心理，富人階級的存在，教育、科學研究促進交流，報紙成爲溝通各殖民地的橋樑，共同享有的政治自由與各地的代議政體等。經過1776年前後的獨立革命運動，美國建立了新國家，制定了新憲法，但它所標榜的「團結的民族」與「共同的革命傳統」實際上是虛構的，1861年的分裂證明美國的統一是一種期望而已，故美國立國之初，實爲不完美的聯合，換句話說，並未建立一個強固自我認同的國家。

評論人認爲 Middlekauff 所提到的使美國成爲一個國家的正面因素遠大於使它分裂的因素，因此它的圓滿（完美）之程度遠大於它不圓滿的程度，事實上現代世界史上聯合成一個國家的例子，少有像美國這麼圓滿。Middlekauff 最後在綜合答覆時曾提到，美國的經驗對中國認同問題，提供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兩個問題：第一，中央與邊陲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第二，政治理念和原則，這是使美國凝結成一個國家的最重要因素。

陳文指出，民初以來的五族共和乃至中華民族的說法，基本上並未擺脫

以漢人爲中心的思考方式。近百年來中國雖然在對抗列強的壓迫中逐漸發展出中華民族的自覺，但少數民族自決的要求、省籍觀念與黨派鬥爭的現實卻又削弱了中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因此將國家疆域與中華民族的範圍劃上等號，只有「建構性」意義，並無經驗事實的意涵。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不適合再以傳統的「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思想觀念對待少數民族，否則只是一種漢民族自我中心的傲慢心態。即就漢族自身而論，因省界觀念與黨派鬥爭，各種政治勢力依照自己的邏輯競逐利益，造成國不國的現象，總之，強調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概念，仍有商榷的餘地。

評論人研究法國史，她以西方的經驗作比較，指出民族意識的形成不能用刻意強制的手段，否則負面效果在長久之後將有可能爆發，南斯拉夫就是例子。以瑞士及法國的某些地區爲例，留給地方某種程度的自我發展空間，並不見得對民族（或國家）的認同不利。不過他也提出，民族認同不一定如陳教授所注重的是由上而下的方式，也有由下而上的途徑，兩個途徑交會的中間地帶帶有模糊性。

- (二)第二場：1. 蔡慧玉「The “State Involution” Debate: State-Society Theoretical Constructs Reconsidered」(評論人 H. J. Lamley)  
 2. G. Koziol “Imagined Enemies and the Later Medieval State: The Failure of France under Philip the Fair”  
 (評論人吳圳義)

蔡文討論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提出的「國家內捲化 (State Involution)」理論應用在近代中國歷史的解釋上所發生的問題，她同時參照孔復禮 (Philip Kuhn) 的「衝突控制二元論 (Conflict-Control Dichotomy)」與黃宗智的「第三範疇 (the third realm)」理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政府與社會之間有關「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士民社會 (Civil Society)」的本質與現象，對「國家內捲化」理論有所評述、引申的理論性探討。評論人指出不同學者之間的理論差異，有些可能只是作者的引申，故建議在理論討論之外，應補充一些歷史背景的敘述。此外，評論人比較傾向於多作實際的研究，他擔心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理論，會有「學術內捲化」的隱憂。

此文引起了不少討論，尤其是探討「國家」的定義，中國的國家或民族認同是否有自己的淵源，而不一定是完全採借自西方的 nationalism。

Koziol之論文在探討非力普想利用一個假想中的敵人，意圖藉此團結百



姓，達成建國的目標，而卻只落得浪費國家資源的失敗下場。評論人提出兩點補充意見，第一，Philip 四世利用三級會議的召集，發動全國性的攻勢來迫害教宗 Boniface，雖然是不擇手段，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法國首次直接徵詢民意，具有相當的民主政治意義；第二，Philip 四世決策時受其身旁顧問之影響甚深，也是不容忽視的。

(三)第三場：1.蘇雲峯「地方自主意識之形成及其作用：以鄂人治鄂為例」（評論人 G. Brucker）

2.尹章義「『臺灣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歷史的觀點」（評論人張勝彥）

蘇文，探討1920至1926年間湖北地方自主意識形成之過程與作用，對省籍意識、地方主義之作用與侷限有所分析，歸結到唯有在國家憲法中，制訂各省自治條例，並實施軍隊國家化以後，才能有效排除各省地方自治的內、外障礙；在各省內部，則應先建立經濟與教育基礎，消除族群與階級衝突，才能實行自治。評論人 Brucker 教授，舉出一些西洋史上的例子來比較與討論，也提到省籍意識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可能關係，或許可以填補國家與家族之間的真空地帶。

尹文分別從空間與時間順序，敘述臺灣意識的形成脈絡，並分析臺灣海峽兩岸的互動對臺灣意識的影響。作者認為臺灣意識可以有種涵意，但尚無一種可以成為臺灣居民的集體意識，如果臺灣意識代表「臺灣共同體」的群體意識，則面臨金、馬、澎湖的歸屬問題、臺灣內部各族群、語群的共同利益與群際關係問題、臺灣與大陸的關係問題等。評論人指出：作者把臺灣意識的形成由愛臺灣、認同臺灣，轉變成國家認同的集體意識，找出了發展的時序，但其間的轉變歷程尚待進一步分析，二次大戰後中共政權與臺灣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關係，交代得不夠。

這篇論文的主題與臺灣目前的認同問題密切相關，所以引發了熱烈討論，正反意見紛陳，陳儀深教授舉出一些具體例證與觀念理論討論自決權、命運共同體等問題；張茂桂教授認為尹教授將臺灣意識界定在族群關係，過於狹窄；李國祁教授針對兩篇論文都提到的中央政權與地方自主意識之間的關係作一引申，提出應正視臺灣認同問題是怎麼發生的，以及應該如何解決的問題；呂士朋教授強調臺灣意識是一種分離意識，是歷史背景造成的，應該同情與諒解，但分離意識並不代表獨立意識；張存武教授認為臺灣獨立意識與中共在大陸的暴力統治密切相關，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關鍵在中共的政

治改革，之後仿照歐洲共同體的模式尋求海峽兩岸的出路；魏斐德（F. Wakeman）教授認為在有關臺灣意識的問題上，不應侷限於討論語言、群體或中華、臺灣等問題，應該探索有無中間媒介——像市民社會之類的東西之形成與作用等。尹章義教授對陳儀深與張茂桂兩位教授所提的屬於理念、定義層面的說法並不同意，顯見此類問題釐清不易，要取得共識尚待努力。

(五)第四場：1.R. Brentano,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Formation: Does Religion Integrate or Disperse Communities?” (評論人瞿海源)

2.王明珂「歷史、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  
(評論人張茂桂)

Brentano 的論文沒有注腳。他從自己幼年的生長經驗談起，最後舉英國及義大利兩個不同的例子，說明宗教有時候可以使一個大的社區或社會分裂，有時候也會對一個小社區提供整合的作用。評論人指出：Brentano 教授所舉的英國例子，其中宗教的分裂與整合作用可能是一起發生的，義大利的例子則似乎看不到宗教的作用；作者用本身的經驗出發來寫論文，是不是主觀性太強？另外，宗教對現代社會的整合與分裂作用，確實影響很大，但多半是對內部整合的力量小，但對國際間乃至於國內種族間的衝突，卻有負面的大影響。

王文則是以臺灣的族群經驗為例，來探討族群認同的本質及變動的原因。作者認為，臺灣的族群認同包括各層次的族群體系，影響個人族群身份選擇的主要因素是社會族群生活經驗、現實利益，以及對未來利益的預期；族群認同的凝聚依賴集體記憶，認同發生變遷則由結構性健忘來達成。王文有結合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理論觀點之初衷。評論人以一個社會學者的角度，認為王文命題、理論均不夠明確，對集體記憶、結構性健忘、文化親親主義等，沒有適當的界定。評論人關心的是探討集體記憶的起源問題、塑造者的身份、目的何在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兩位學者對問題的著重點、切入的角度、方法意識上可說各有見解，是一場不同學門間針鋒相對的討論。

(五)第五場：1.羅久蓉「救亡陰影下的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評論人 F. Wakeman)

2.黃俊傑、古偉瀛「新恩與舊義之間：日據時期李春生的國家認同」(評論人黃富三)

羅文從1905年前後梁啟超與汪精衛有關革命與立憲的論辯，分析清末的知識份子如何在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的糾結中，提出救亡對策，以及救亡對這兩種認同究竟起了什麼樣的影響。作者認為，救亡使得國家認同的感情訴求力量加強，理性減弱，不利於從事有關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建設性討論；在國家面臨滅亡壓力，而社會、政治、文化秩序又急速崩潰的時代，手段的有效性高於一切，不但理性與感情難以分開，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界線亦趨於模糊。評論人認為此文是在舊問題上看出新意義，全文申論亡國與國家、文化的關係，民族革命跟政治革命的關係，民族革命能否成為政治革命的手段，感情與理性等多方面的問題，從中充分體現「認同與國家」的過程。

黃、古文指出李春生是清末日據之交的一位臺灣商人，他是邊陲地區（臺灣）的民間知識份子（無科舉背景），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與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在政權轉移之際，順利的轉變其國家認同。本文係以李春生為例，探討「臺灣情結」、「中國情結」、「日本情結」之間的關係及互動，說明國家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是外鑠的，而且認同雖是參與新的未來，卻不必然棄絕傳統，李春生自言「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即其例證。評論人指出，李春生的世界性眼光或許可以用現實主義來解釋，基督教的信仰也不一定減弱個人對民族或國家的認同。論文中對李春生的臺灣意識、中國意識、日本意識之間的關係，應多加描繪。

此論文也引發了不少討論，包括基督教與認同問題、剪辮與文化認同問題、商人的認同與現實利害之關係等。黃教授在答覆時表示，李春生的現實主義或許用「務實主義」來說更為恰當，他的「普遍主義」（世界眼光）心態在清領臺灣時期可能是隱性的，割臺之後則成為顯性表露；古教授針對基督教信仰對李春生的影響的答覆是：基督教信仰有超越國家、民族的一面，加上李春生對教案的反感，使他從宗教角度不認同清廷的作為。

（六）第六場：陳其南「傳統中國的國家形態、家族意理與民間社會」（評論人葉文心）

陳文運用其社會學觀念，由歷史典籍找材料，自政治文化與社會結構演變的源流入手，觀察傳統中國與西歐社會由古至今的演變及其所呈現的差異。他認為中國的傳統國家本質偏重於文化認同，在「家」與「國」之間缺乏西方意義的市民社會，以致缺乏社會性的凝聚力，因此難以產生「共同體」的社會共識，以內化、制約個人成為社會、國家的「公民」，影響中國社會走向民主政治之路。本文有意釐清「國家」、「家族」、「社會」等

基本觀念之意涵，陳教授認為中國在「家族」之外缺乏 corporation（共同體），沒有 corporation，就難以形成社會性的 state（國家），於是乎談「國家形成」（national formation），談「認同」（identity），將發生基礎不足的問題。評論人除肯定陳教授此文有史有論，深具卓見之外，也提出三個不同角度的觀察，第一，陳文對儒家政治文化的歷史敘述，建立在孝經及少數中國典籍的詮釋上，且以直線發展的方式論述，實際上儒學自先秦迄宋明，發展多變，因此其所蘊涵的政治文化涵意，可能需要更加彈性的處理；第二，陳文以為中國家族涵蓋一切社會關係，只有「家」、「國」兩端，不過儒家也談「內」、「外」之分，兩者之間關係如何？是否中國社會的「私」中含有「公」的成份，反之亦然？第三，陳文在方法上先掌握理念架構，再向古人徵求材料，而非透過與古人對話交流，對古代經驗有所反思，以開拓今人視野，在方法論上尚有可以斟酌之處。

本場討論會原先議程上安排另一位美國學者宣讀論文，但會議前夕該學者因故不克前來，故議程臨時更改為「中場討論」，希望回顧一天半來論文的報告與討論，交換意見，增進共識，對後半議程的討論有所助益。中場討論時多位中外學者發言，討論環繞著大會主題的定義、不同學科之間應如何對話、如何在研究方法上彼此援引、互相尊重等問題。

(七)第七場：1. 李國祁「滿清的認同與否定——中國近代漢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評論人 I. Scheiner）

2. 張玉法「革命與認同：知識青年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反應」（評論人章開沅）

李文係其幾年來有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之綜合性論述，他認為清末漢民族主義為革命之主流，自甲午戰爭後，每五年為一階段，知識分子、紳商、整個漢民族先後投入、認同，才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其特徵言，第一，受儒家內省傳統影響，漢民族主義是安內重於攘外，從太平天國到抗戰前，都是如此；此外，受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想影響，主張由小我而至大我，解決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的可能矛盾；第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具有求新與反傳統的特質，影響及後來的五四運動；第三，在認同上充滿激情，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均係如此，造成中國歷史一方面因民族主義而光輝萬丈，另一方面也是遍體傷痕。評論人指出，李文若有不足之處，則在於對清末中國一些思想家如何轉變他們的國家認同，交代得還不夠清楚，針對儒家思想在清末的認同思想上起了什麼作用，還可再加以發揮。

張文著重說明孫中山革命四十年，主要是依賴知識份子為核心所展開，自1885年以後，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先後取代了滿清與北洋政府，成為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青年）的認同目標，才有國民革命——國民黨政權的建立。評論人先以自己的經驗說明認同的層次是多面的，而國家的認同最複雜，最難處理。他認為張文談的是知識青年對孫中山的認同，也就是對國家的認同，這對國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後半段有關國家形成的部份，張文談得不夠，還可以有所申論；另外，本文對孫中山形象塑造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因為這種塑造對國家的形成、國家認同都有影響，值得進一步說明。

這一場的兩篇論文直接、間接扣緊了認同的問題，因此討論相當熱烈。張朋園教授認為中國的 *national formation* 還在起步階段，辛亥革命對中國的 *national formation* 破壞大，益處小，原因在於「反滿」，在於「大漢民族自我中心主義」，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呂士朋教授呼應張朋園教授的看法，認為反滿是一種種族偏見，害人不淺，他對滿清的統治基本上是肯定的，近代中國的問題出在帝國主義，不能專責滿清。陳儀深教授提出「認同」的複雜性與敏感度，主要是出在對國家的認同上，有人沒有認同的危機，但在有些人身上，認同上的彼此矛盾衝突確是存在的，這也是問題的所在。朱宏源教授針對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的「國家」問題在十九世紀才產生，提出糾正，他認為從蕭公權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一書可以看出，從明朝開始，*Modern State* 的觀念已進入中國；另外，他也提出一個意見，孫中山與梁啟超有關民族認同的論辯，事實上代表地方與中央（或在野與在朝）的不同立場影響下所產生的不同觀點，客觀而論，梁啟超從中央的立場提出的見解，事實上是有遠見的。

(八)第八場：1. 黃英哲「魯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1945-1949——試論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重建與國家認同」（評論人鄭梓）

2. S. Barrows 「The Many Faces of Popular Culture  
“French Popular Culture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the 1870s”」（評論人吳錫德）

黃文是作者一系列有關許壽裳研究的論文中最近完成的一篇，探討「戰後初期」許壽裳來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時，如何將魯迅思想的傳播與「臺灣文化重建」工作做一有機的結合之經過與發展。作者認為戰後初期魯迅思想在臺灣確曾形成風潮，魯迅思想的「政治性」與「社會性」對臺灣文化界確有啟發，間接對二二八事件也有影響。評論人認為本文在幾方面有待補充與

釐清：第一，臺灣所傳播的魯迅作品到底是那些？臺灣風行的魯迅思想的實質內涵似難以把握，傳播效果也難以評估；第二，魯迅的戰鬥與批判精神如何為臺灣人所把握，進而演變為影響二二八事件之力量？第三，將許壽裳主導的臺灣省編譯館以外的黨、政派系人馬，簡化為國民黨系統的反魯迅思想陣營（宣傳三民主義），不符當時派系複雜，且各有意識形態之事實（表面上皆舉三民主義之旗幟），這是需要加以進一步釐清的。

S. Barrows 以「庶民文化」為研究重點，試圖剖析它與第三共和初期共和主義的互動與依存關係。作者分析第三共和初期保守派與共和派較勁期間，法國出現的庶民文化，以近乎文化革命的方式，支持共和派擊潰保守派的過程，並試圖釐清群眾心理與政治理念之間可能有的連帶關係。評論人認為：第一，本文承襲戰後法國年鑑學派心態史學的研究方向，凸出了「民間力量」在這場革命中的關鍵角色，但作為「庶民文化」產生者的「新階層」之面貌，在文章中卻顯得模糊；第二，文中引證許多資料，說明民眾對保守派代表人物（麥克馬洪元帥）的不滿與對當局若干禁令的激烈反彈，若能加上當時的社會、政策背景，以及經濟形態（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變化與重大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將更具說服力；第三，第三共和初期的政、經、文化混亂情境，與臺灣當前的政、經、社會失序似有可類比之處，差別在於當時法國已凝聚了國家認同，臺灣則尚在摸索、探尋國家的認同。

與會的部份學者對第三共和初期「保守」與「共和」兩派鬥爭過程中，少見暴力衝突、強制鎮壓，而是「文明」、「和平」的方式收場，與中國的情況對照，顯有不同，認為是值得深思的地方，這也是中西歷史可以「比較」的地方之一。

(四)第九場：1. G. Brucker “From Campanilismo to Nationhood: Forging at Italian Identity”（評論人賀允宜）

2. 李筱峰「國家認同的轉向——以戰後臺灣反對人士的十個個案為例」（評論人賴澤涵）

G. Brucker 主要是以義大利境內各自為政的城邦如何超越其原有的地域主義（Campanilismo）傳統，進而創建一個被義大利人認同的新國家之過程。1494 年法軍入侵義大利，佔領佛羅倫斯（Florence），馬奇維利（Machiavelli）身受異族入主之辱，首度呼籲義大利人團結一致，重光故土。這個「統一的義大利」新國家觀念，自十六世紀開始，成為愛國人士與知識份子的努力目標，一直到十九世紀才在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外力）協助下達

成統一建國的目標。但義大利的統一並未徹底完成，教皇國的存在就是明顯的例子。義大利建國運動歷時數百年，最後仍不算真正成功，其歷史經驗與晚清民初以來的中國建國運動有類似之處，二者皆為大一統傳統的發源地，在尋求新國家的認同上，都經歷了複雜曲折的過程，也都有認同的危機，義大利的統一建國最後勉強算是成功，而中國則尚在努力之中。Brucker 教授對義大利建國歷程的探討，不但可以作為其他類似運動的參考，而且從中也能體認一歷史現實：類似的運動並不保證必然成功。

李文是作者扣緊「認同與國家」這個主題所完成的一篇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論文。他列舉十個個案，包括本省人、外省人，老、中、青三個世代，分別敘述每個人由認同「大中國」轉變為認同「臺灣（獨立）」的歷程，分析這些人原始（大中國）認同的由來及認同強度的差異、導致後來國家認同轉向的原因及個別差異，最後提出一個重點式的觀察結論：早期的認同轉向，與國民黨政權採取高壓統治密切相關，九〇年代起，因臺灣政治日漸開放、民主化有相當進展，政治高壓手段逐漸絕跡，因此這一類型導致的臺獨傾向，已告一段落；目前的臺獨認同，主要源於臺灣在國際外交上的孤立、中共的對臺野心，導致求自保自全為目的的臺獨觀念方興未艾。

評論人指出，文中提到十位代表性「反對人士」之認同轉向，基本上是想為臺灣找尋出路，目標是臺灣獨立，但如何達到獨立的目標，這些人似乎沒有一套清楚的概念或方法，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這些被研究者當中，大部份健在，其著作、言論雖然不少，但多屬時勢論評之類，從資料運用的角度來說，學術性可能比較不足；第三，這十個人當中，大部份人士的著作中看不出具體思想轉變的歷程，本文對這些轉變歷程的心理分析也付諸厥如；第四，這些反對人士所認同的臺灣獨立，具體的意涵似乎不太明確，例如與「獨臺」的區別何在呢？

本文的內容談及現實的認同問題，自然引起許多討論。鄭梓教授提出三點參考意見，第一，臺灣不但是個「移入民」社會，也是個「移出民」社會，許多人移民出去之後又移回來，這也牽涉到認同這塊土地與政權的問題；第二，若從另一個角度看，有許多跟政權合作或認同這個政權的人士，他們的例子可能具有啟發性；第三，應以口述歷史的方式來補充資料的缺陷性。另外的意見，包括應該注意臺灣族群區別與臺獨認同之間的關係、臺獨成功的可能性也影響認同的態度與程度、反對人士的投機性等等。李教授對評論者及討論發言都有所回應，他認為臺獨的形式很多，彼此可能互不相

容，在口述資料上，進行十分困難，因為有人（個案之一）甚至不承認自己曾有大中國意識；心理的分析很重要，也最困難，像投機性的政客心理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十場：1.王曾才「中國的國家認同與現代化」（評論人李國祁）

2. S. Rothblatt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評論人張四德）

王文是一篇通論性的文字，論的成份多，關注的核心是統、獨問題。作者提出基本的見解：如果臺灣獨立行得通，倒不失為解決目前臺灣國家認同糾結的好辦法，但從現實角度來看，則困難重重，為全體中國人的福祉計，臺灣不應以臺獨路線來刺激中共當局，中共也應放大格局，不該封殺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兩岸關係應該聽其自然演變，最後將有圓滿解決方案。評論人提出一些相關的問題供與會者共同思考：臺灣與大陸的統獨之爭，是國家認同問題，與民族、文化認同無關，因此不適用民族自決的理論；在國家認同與現代化問題上，許多人認為經濟的繁榮可以拉近雙方的距離，但中共刻意避免經濟發展導致政治的民主化，加上兩岸中國人對誰統一誰並無共識，將來是否可能變成一個民族兩個國家？

王教授的論文直接挑明統、獨問題來談，雖然不是就統獨問題本身作理論或現象的深入分析，仍然引起熱烈的討論，不過就如同前幾場的一些熱門問題一樣，討論是熱烈而冷靜，但共識還有待建立。

Rothblatt 文主旨在於論述近兩百年來西方各國的大學在民族認同與認同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作者舉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及美國的大學為例，分別用「精英認同的形成」、「為社會服務」、「文化認同」、「自由個人主義」來指陳前述各國（地區）大學的不同本質，對於大學與認同形成之間的確切關係，說的不太明確。評論人認為：各國高等教育學府不斷在蛻變，因此要確定大學在國家認同形成時的作用，不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都很难，這是作者自己也承認的；她另外提出幾點質疑：第一，本論文在論述大學及國家認同問題上的通則時，似有過分簡化歷史事實的傾向；第二，為什麼選擇英格蘭、蘇格蘭、德國、美國的大學作為討論對象，而不選法國、義大利等，作者並未說明；第三，對每一個國家主要大學成立的歷史背景有所理解，大學教授扮演的角色加以注意，或許對大學與民族認同、認同形成的關係才能有比較清楚的解釋；第四，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價值系統（system of value），對社會也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十九世紀的美國，



WASP（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主導美國社會，是不是也會透過大學發揮其影響力？南北戰爭時，美國的大學扮演了什麼角色？二十世紀的某一個時期，美國的大學本身意味著要提昇更多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是不是也是一種價值系統？第五，本文最重要的一點，是想告訴讀者，近兩百年來的西方世界中，大學在國家認同這個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既重要且複雜，作者也試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不過，由於缺乏歷史事實的支持，本文對於幫助讀者深入瞭解這個問題，助益恐怕是有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個 team work，投入相當人力，共同努力才有可能。S. Rothblatt 教授的文章也引起了一些討論，不過似難以跟認同問題密切相關連。對於評論人的質疑，Rothblatt 教授的解釋是：大學取樣的標準，受個人的熟悉程度影響，也與易於證明個人觀點有關，史實不足之處，實是篇幅限制所致。

二十篇論文宣讀過後，最後一場是綜合討論，由陳三井所長、葉文心教授、F. Wakeman 教授共同主持。葉教授指出，本次討論會有兩個層面值得注意，第一，這是一次跨學科之間的對談，符合近年來學科之間畛域逐漸消除、科際對談越來越多的潮流；第二，「認同與國家」這個問題，在西方的經驗裡，源遠流長，在目前來說，並不是當前貼切的問題，不像今天臺灣的統、獨紛爭與辯論中，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意識。此次提交大會的部份中文論文，反映出對這個危機的迫切感，代表一方面這是一個學術的研討，一方面又是時代流變的軌跡，透過學術性的思維與論辯，也許能夠更進一步清理各問題的頭緒。F. Wakeman 教授在與會者自由發言之前，嘗試就三天來會議論文的理路、交叉點提出一個綜合性的觀察與分析。他試圖將此次大會重點之一的「比較」放進來，經他的穿針引線，提醒大家國家、認同的概念與問題的處理，不能先入為主，不妨在多元中求統一，就如同認同有由上而下的政治主導式，由下而上也有成功的例子。無論如何，認同的形成與國家的建立，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歷史的發展往往有其偶然與巧合，就像美國革命對當時大西洋兩岸的人來說都是出乎意外，但後代的史家卻可以解釋成那是歷史的不可避免。在自由發言時，中外學者均表示了意見，有人針對「比較」方面的欠缺，提出一些期望，有人繼續對「認同」的性質、意涵引申，或者將之作東、西方的不同比較，歷史經驗與臺灣現實的比較。從發言的熱烈情況來看，意猶未盡十分顯然。

### 三、後 記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在中西歷史發展上是經常發生的問題，此次研討會以近代中西歷史發展經驗為範圍做比較性的探討，雖然西方學者與國內學者關注的對象，主題涵括的年代不盡相同，着眼點也不僅是西歐、中國，還包括主辦地點臺灣當前熱門的認同問題，但這無損於與會者場內熱烈地討論與場外的互相請益，三天下來威信與會者皆感獲益良多。

這次研討會尚有以下幾項值得提出：

(一)與會者(包括主持人、撰稿人、評論人)不僅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各個學門，歷史學(中國近代史、西洋近代史、臺灣史)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學者濟濟一堂探討共同的主題。雖然學門不同切入點不同，方法互異，見解不盡相同，然而透過適切的討論，共識將可以逐步凝聚；而多學科間認真的對話，也有助於吸收彼此的長處。比較遺憾的是由於各方參加者頗多，今年並沒有設觀察員，以致有部分研究生向隅。

(二)就有關認同問題中外歷史的比較上，雖然部分與會者認為並未能達到所謂「比較」的層次，但經由法王 Philip the Fair 以假想敵來求取國家的認同，或者法國庶民營造出的文化，使國內兩派的鬥爭行為是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收場，大學教育、宗教在國家認同扮演何種角色？義大利複雜的追求新國家歷程上，有無值得借鏡之處？這些觀點都可以拿來和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類似情況做初步的比較。縱然這次研討會中談不上深刻的比較，也未嘗不是留給與會者將來研究一個更寬闊的思考空間。同時主辦單位深知歷史比較的因難，故在議程安排上，刻意安排了幾位美國學者評論中國學者的論文(雖然報告人與評論人研究專長並不一致)，美國學者所提論文則由國內研究西洋史的學者擔任評論工作，一方面希望增加中、西對話，一方面也希望激發一點比較的效果。觀其實際成效，有時中西對話不免天馬行空，但有時也確有不同角度思考的實質效益。這種安排是一個嘗試，得當與否，見仁見智，至少可供往後類似會議安排議程之參考。

(三)以日據時期及當代臺灣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關國家、民族、文化認同的問題，甚至個人認同的前後差異問題，在這次會議期間也被充分討論。由於認同牽涉範圍寬廣，也具敏感性，因此這一議題引起與會者熱烈討論，雖然個人的出發點不同，看法互異，但都能在冷靜中充分表達不同的意見，可見與會者對三天來開會所營造的文化有所認同。此外傳播媒體與一般大眾對此問題也相當感興趣，前來採訪、旁聽者之多也是近史所歷次開會中所僅見。

# 曾國藩先生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

(82年11月19-20日) 在臺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舉行

呂 實 強\*

這是一個深具特色的演講會，雖然只舉行兩天，也僅有四場演講，卻由於準備的充分，內涵的豐贍，尤其是與會者範圍之廣泛與學養之深厚，使此會呈現了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蓋自從1950年代後期，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 (Mary C. Wright) 發表其「同治中興」(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ú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教授李文孫 (Joseph R. Levenson) 發表其「儒家中國與其近代的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共三冊1958、1964、1965出版。他們都對儒家的傳統，視為中國近代化的阻力。芮瑪麗教授更認為，以曾國藩等為核心的一個儒家傳統理念，從事同治中興，表面上看來是成果顯著，實際上卻是一項淒涼的失敗。再加上中國大陸上自范文瀾出版其「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一文之後，隨著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曾國藩長期的被視為人民的叛徒，民族的罪人。於是在自由中國的臺灣，雖然仍然有不少的人，對曾國藩的道德、學問與事功，給予正面的評價，無奈不易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大眾廣泛的注意，曾國藩遂亦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影響。今天故宮博物院關心籌劃，舉辦了這一次前所未有的研究討論曾國藩的學術盛會，可視為一項挽轉狂瀾與起衰振敝的樞紐或關鍵。

另外則這個會的四位主講人，余英時先生來自美國，他是哈佛大學博士，曾在耶魯、哈佛任教，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於中國歷史文化思想造詣極深；一位是來自大陸的學者唐浩明先生，他曾參與對湘鄉曾國藩等故居所留存史料的整理工作，相當長的時間浸潤於曾家史料之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並就近訪問口碑，調查遺蹟，而後以歷史小說體裁著成曾國藩傳記一套三大冊，都兩千餘頁。歷史小說雖與正式的歷史有其差距之處，但其所參閱史料之廣，融會體驗之深，則非常突出；闡釋發揮，大致已能不受長期以來中共對曾國藩意識形態所拘束，而趨向其個人的判斷。另外二位在臺灣的學者，一位是張玉法先生，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亦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曾任近史所所長，二人均為終身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故主講者雖僅有四人，卻能對過去四十多年國際、大陸及臺灣有關曾國藩的研究，具有相當程度的整合與開拓新里程的作用。

演講會舉行兩天，自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下午結束。其全部的過程見以下簡表：

####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九時三十分 開幕典禮

十時三十分 第一場演講

主講人：唐浩明先生（大陸學者，著有〔曾國藩〕專書  
三大冊及四十大冊曾國藩相關文獻）

講題：曾國藩先生之生平與事功

十四時 第二場演講

主講人：張玉法先生（中央研究院院士）

講題：曾國藩的歷史地位

十六時 第三場演講

主講人：呂實強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

講題：曾國藩先生的行誼

####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九時三十分 第四場演講

主講人：余英時先生（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

講題：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十一時三十分 綜合討論

主持人：秦院長孝儀

十四時 參觀活動，地點：陽明書屋 摩耶精舍

此項議程，在演講順序，本來是將余英時先生的「曾國藩與『士大夫之

學』」排在第二場，張玉法先生的「曾國藩的歷史地位」排在第四場，後來因為余先生在第一天無法趕到，乃將其與張先生的時間對調，以資適應。本報導為說明的方便，仍依原先所安排的順序，摘要介紹。

首先是大會開幕式，由李副總統元簇致詞，他除讚揚曾國藩的文治武功之外，並強調其學養與毅力，歸結學問努力，知人善任，軍事才能及創新眼光，為曾氏立身行事的幾項重要基礎，由此而能帶領近代中國，邁向新局。

接著由秦院長孝儀說明這次會議舉辦的緣起，及故宮為了配合，編印舊藏的宮中檔、軍機檔、史館檔等有關曾氏的史料，成書共八鉅冊；並選擇其中尤為精要者，連同曾氏家藏奏稿、批牘、日記、家訓之屬，公開陳列展覽。

隨後為演講。

#### (一)唐浩明：曾國藩先生之生平與事功

唐先生的演講，分為五個支題，一為「一帆風順的幸運京官·刻苦自勵的理學信徒」。其中說明了曾氏自二十八歲中進士，入翰林，嗣後升遷快速，可謂宦途順利，然而就在這樣的優越境況中，國藩卻仍然自拔於流俗，研習經史，磨鍊詩文，更從事於理學的工夫，以此乃能奠立其恢宏的基礎，可擔當國家棟樑之任。二為「從文官到軍事統帥·由理學到申韓之術」，雖然文中謂曾氏辦理團練，訓練湘軍，一改過去在京師所奉行的敬靜慎審誠信仁厚的理學說教，轉而實行威猛森嚴、酷刑峻法的申韓之術，但亦認為曾氏「這種嫉惡如仇，剛直正派，勇於負責的精神，正是植根於長期來在京師所培養的浩然正氣，是一種銳意進取的勃勃生氣」。三為「百折不撓執行戰略決策·戰兢惕厲面對蓋世功勳」，說明在民族歧視之下，曾國藩所遭受的壓抑，但他仍能一本初衷，終成大功，並能謙抑自約，以持盈保泰。四為「師老無功於勦捻戰場·外慚內疚於教案處理」，敘述其勦捻無功，及處理天津教案之負謗，以及析論所以致此之由，並非盡咎在國藩。五為「開近代風氣先聲·辦徐圖自強實事」，逐述曾氏倡辦機器局、製造輪船、派遣幼童官費去美國留學等等，認為曾氏應是為中國最初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大政治家之一。

#### (二)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余先生先從一「歷史背景——道光時代（一八二一～五〇）的學術界」說起，認為道光時代，漢學考據趨於沒落，曾國藩因而趨向經世與理學。所以他雖然景仰顧炎武，但是道光以下群推為經世儒宗的顧炎武，而不是乾嘉

時代奉為考證始祖的顧炎武。二「曾國藩的成學過程」，認為曾氏之成學，最重要的階段在於其中進士入翰林連續任京官期間，而接受理學的洗禮尤為最重要的關鍵。三「曾國藩的『讀書之道』」，指出曾氏是一個有創造力和判斷力的人，一方面虛心受師友之教，另一方面卻並不輕易屈己從，放棄自己獨立的見解，並且在其已成之規模內，隨時有所調整與發展。四「結語」，就曾氏的學術作綜合與分析的評論。以為其學問之追求，就體來看，為讀書以成就人格為最高理想，經世與詩文等，均在此一目標中進行。故詩文造詣甚高，但最後亦進向道德修養的境域。他自謂：「平生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為學之津途，實已窺見其大」。百無一成，因為沒有走任何專家的道路，窺見其大，因為他的整體成就屬於通識的範圍。今天西方所謂「通識」，淵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的教育，也以塑造完美的人格為最高理想。從此點說，曾氏的「士大夫之學」，未嘗不與西方人文主義教育有相通之處。

#### （三）呂實強：曾國藩先生的行誼

本篇講辭，於前言中先介紹過去研究曾國藩者對曾氏評價之歧異，尤其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對之貶斥詆責，與臺灣一般對曾氏的讚揚。然後以修身、齊家與師友三項，逐加檢討。一「修身」，認為曾氏對修身曾下過深澈的工夫，由研幾察微，至舉止言動，體用賅備，表裡兼治，乃能建立其根本，乃使其立身行事，均能以此為根基，品格學問事功，亦均緣此而得以建立。二「齊家」，其家庭教育極嚴，尤其所揭倡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幾為所有官宦富豪之家所不曾兼具。然曾氏卻以此自履篤行，並及於所有子女，統觀當時所有大家巨族，高官顯宦，其後代能相沿此風而不衰敗者，亦幾曾國藩一家，良有以也。三「師友」，於此一方面，其師友之多而且賢，亦於並時而起之諸人中，無一能望其項背。所以能成就其事業，此實為其關鍵。然所以能致此，修身、齊家亦實為基礎。而後於餘論中分析太平天國政權之極權專制暴虐殘酷，為歷史上所罕見，曾國藩將其平定，為一曠世偉業，何得因此而貶損其行誼。

#### （四）張玉法：曾國藩的歷史地位

張先生先以一「前言」來闡釋一個人物的歷史地位的遽難固定，身後對其評價，有相當的分歧，尤其是中共統治下之大陸，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史觀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對之批貶甚厲，惟所有自由地區的學者，則對之多持肯定的態度。二「敦品：從修身到齊家」，引曾氏所撰五箴：立志、居敬、主

靜、有恒、養身，以析其修身；據曾氏所期望家中出現名學者、家風廉謹敬慎，以稼穡爲本，治家八字訣：早掃考寶書蔬魚豬，重視子弟教品勵學等以明其齊家。三「治學：游刃於義理與經世之間」，認爲曾氏一生治學，在北京任官時期，以理學爲宗，勦太平天國時期則兼之以經世，而其經世則是以義理爲出發點。四「定亂：從忠君到保教愛民」，認爲忠君爲傳統中國最大的道德，保教即保仁義道德、保民族文化，愛民則深知民間疾苦，隨時以救民安民爲念爲行。五「洋務：開中體西用的宏規」，指出雖一般均謂中體西用論係完成於張之洞，但其方向大略實倡始於曾國藩，蓋其治學從政，既以義理爲體，經世爲用，體不能變，用可以變，西法既有裨於用，乃毅然採行，遂開啓自強運動——亦即中體西用之宏規。六「結論」，認爲自1927年長沙雅禮大學歷史教授赫爾（William James Hail）在其「曾國藩與太平之亂」（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一書，譽曾氏爲戰士、政治家、滿清的忠僕、儒家的偉人、遠東的華盛頓，此後六十餘年間，除民族主義派史學家指其違背民族大義，左派史學家指其爲漢奸劊子手以外，一般評價正面較多，負面甚少。誠然曾氏亦留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但均屬間接而非直接，當不足以影響其正面的建樹。

以上扼要略述此次會議之內容，於此尙擬補充一點個人的觀感，以爲本篇的結束。此次會議的主講者，唐浩明先生曾在湘鄉整理曾氏有關史料多年，且撰有歷史小說式的曾國藩傳記，暢銷海內外，其工力深厚，資料豐富，自然影響深遠，而且突破大陸四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尤令人注目。余英時先生在學術思想史方面學貫中西，望重士林，治學更義理與考據兼該，不但足以轉移昔年芮瑪麗、李文孫教授等之偏見，即對中國大陸學術界亦有釐正澄清之效。張玉法先生久以中國近現代史之成就享譽中外，以其學養爲曾國藩在歷史中定位，自易爲各方面學者專家所接受。呂實強亦專治中國近現代史多年，且深儀曾國藩之爲人，論其行誼，當有其獨到之見解與可資信服之處。而且此會雖名義爲演講會，但與會之人主要均係由各學術機構——包括各大學及研究院所所推薦之專家學者，以及社會人士對曾氏立身處世學問道德文章深具興趣者，濟濟數百人共聚一堂，再加上故宮博物院出版與展覽豐富與珍貴的史料配合，這次會議不但爲一次空前的創舉與盛會，亦象徵曾國藩的研究，從此將轉入一個正常的學術事業，不再爲偏見與政治方面的意識形態所左右，此項中國歷史文化中寶貴的遺產，必將對人類與社會，發生更多的裨益。

# 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

林 滿 紅\*

## 一、第十一屆世界經濟史大會之會前會

世界經濟史大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成立於1959年。每四年召開一次。至1994年，已是第十一屆。此會秘書組設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歷史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大會則分別在歐洲斯德哥爾摩、慕尼黑、列寧格勒、哥本哈根、愛丁堡、布達佩斯、魯汶等等大城市輪辦。第十一屆將於1994年9月在米蘭舉行。

這個以歐洲為主體的經濟史大會，事實上是經濟史方面最大的國際聯合會，連美國經濟史學會也是它的會員。以第十屆在魯汶召開的大會為例，報名參加的世界各國學者有一千三百人左右，連同眷屬，則有兩千多人。經濟史方面的重要理論，如至今仍影響頗深的 Simon Kuznets 的國民所得與現代經濟成長理論，Fernald Braudel 的整體歷史研究理論，都以此一大會為重要影響據點。1993年以經濟史研究得諾貝爾獎的 Douglas North 也在1990年魯汶經濟史大會的方法論研討小組之中。

經濟史大會所提出論文的性質，在1990年以前，屬方法論者約佔10%，屬古代與中古時期者約佔30%，屬近代者約佔60%，而近代部分論文所佔比例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

世界經濟史大會自1959年成立以來，主要是西方學者討論西方經濟史的學術會議。在最近世界快速重新整合的背景之下，大會也越來越將亞洲、非洲的經濟史納入討論。在將亞洲史納入討論的過程中，日本的經濟史學者貢獻良多。就1990年的魯汶大會來自亞洲的參加者來說，東南亞學者有1人，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大陸學者有 2 人，臺灣學者有 3 人，印度學者有 9 人，日本學者則有 56 人。已成為大會委員會之一委員的速水融自 1970 年代起即將日本德川時期的歷史人口發展與經濟史介紹給西方學者。角山榮、濱下武志、川勝平太、杉原薰、杉山伸也等學者則試圖在此大會中指出晚近崛起的亞太經濟有其歷史根源——亞洲內部原有根深蒂固的商業網絡。

繼 1990 年已有一場相關研討會提出於大會之後，1994 年又有兩場。此文所報導之「亞洲商業網絡 (1850-1930) 會議」即為其一。由於經濟史大會中討論的場次甚多，以第十一屆大會為例，即有 A、B、C 三組共 76 個場次。每個場次在大會之中多只由幾位教授報告要點，而後由有興趣的大會參加者就原已發出的論文加入討論，由提出論文者提出答辯。而於大會召開之前，每個場次都需另外召開一個會前會，就該場次所提出論文，由論文提出者進行較密集的討論，以便印出論文集在大會流通。「亞洲商業網絡 (1850-1930) 會議」這一個會前會係由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杉山伸也召開，於 1994 年 3 月 17 至 19 日在日本東京近郊最有名的溫泉區——熱海的赤根旅館舉行。

## 二、會議目的與參加者

所謂商業網絡，包括商品流通的路線與工具，從事商品流通的商人的資金來源和融貸對象，商人與其部屬，與其他商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杉山伸也教授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有三：

1. 就十九世紀中葉至 1930 年代，亞洲內部的商品流通及金融網絡進行個案研究，並考察其經濟史的意義。
2. 以往的歷史研究常以國別史劃分畛域，此一會議企圖打破國界的藩籬，而以亞洲為一區域，指出近代以來亞洲內部各地區之間的交流。
3. 以往經濟史的研究側重生產方面，最近稍稍注意消費方面，但如最近美日談判所呈顯的，流通部門亦極重要，此次會議因而擬側重流通部門之歷史探討，並由之吸取若干啟發。

在這些基本前提之下，被邀請參加此次會議的學者，有日本、中國、朝鮮、西亞、東南亞等國或地之經濟史學者。日本經濟史學者除杉山伸也之外，另有名古屋市立大學之籠谷直人、東北大學之谷本雅之；中國經濟史學者有美國康乃爾大學之 Sherman Cochran，香港嶺南大學之霍啟昌，日本

東洋英和女學院的古田和子，上智大學的 Linda Grove，東京大學的濱下武志，和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滿紅（林也研究臺灣經濟史）；朝鮮經濟史學者有日本東京農工大學的木村健二；西亞經濟史學者有慶應大學的坂本勉；東南亞經濟史學者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 Ian Brown。

### 三、宣讀論文

會議議程詳如附件所示。各宣讀論文大要依宣讀順序為：

坂本勉之「近代伊朗絲貿易網絡」指出伊朗在 1830 年代後半至 1840 年代對西方開放通商口岸之後，其出口貿易中居舉足輕重地位的絲出口貿易（1864 年高達伊朗出口值之 84%，佔世界絲產量之 38%）的輸出路線及輸出商人的變化。主要產於裏海南邊的生絲、蠶繭，開港前原多由裏海轉經陸路出口至歐洲，出口商人為回教徒的亞美尼亞商人。開港後先因有蠶瘟，生絲出口地位漸為地毯、煙草所取代，再因改由伊斯坦堡經黑海出口之生絲可藉汽船載運，又因伊朗欠歐洲債務，生絲出口用以還債，在歐洲與伊朗間居中介地位的希臘商人（基督徒）遂取亞美尼亞商人而代之。

籠谷直人「1896 至 1936 年間東洋棉花公司與日印棉花貿易」主要利用大阪市立大學所藏的該公司檔案研究其在日印棉花貿易中的經營方式與利潤變化。東洋棉花與日本棉花、江商合稱當時日本從事印度棉花貿易的三大公司。三大公司劃定領域逕入印度中部購買棉花，以東棉而言，直購在 1920 年代，佔約 50%。1920 年代東棉之利潤亦豐，但至 1930 年代，因印度商人起而代之，逕銷棉花至日本，東棉在印度之購棉生意轉趨不利，遂轉而致力於荷屬印尼之棉製品貿易。

谷本雅之「日本的英國棉紡織品進口商」指出日本在 1858 年橫濱開港，1867 年神戶開港之後，因茶、絲出口獲利，棉紡織品的進口增加率大於中國，英國棉紡織品進口值佔總進口值之 30-50%。棉紡織品之中，1870 年代以前棉布進口居多，1870 年代至 1889 年以棉紗居多，1889 年之後棉花居多。此等新增加之棉紡織品進口締造了行會以外的新興商人。除了一些投機商人介入較短的時間之外，主要由貿易船的經理人轉成的批發商人則迭有更新，他們也是引進棉紗促成日本生產現代棉布來取代西方棉布的工業家。

霍啟昌的「香港華商的商業網絡」，以高家、馬家的私人商業信函、帳冊、年報為資料探討兩家國際商業網絡的拓展。高家於 1830 年代至泰國從事

該地之米及其他土產出口至中國的貿易，1850年代因發現香港可為一貿易據點，而將主店移至香港，分店設在曼谷、新加坡，到第二、三代更設分店於神戶、廣州。馬家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香港之一大企業，事業延伸至北美之加拿大、舊金山、Sacramento 等地。兩家的商業網絡都靠私人關係拓展。馬家子嗣較少，屬下兩百多名員工多臺山族親。高家第一代育有九子，整個企業由此九子拓展。雖依傳統方式營運，營運項目則由傳統之米、土產貿易拓及諸多現代企業，如汕頭的銀行、電力公司、水利公司、棉紡織及香港的兩家保險公司、新加坡之橡膠公司。因為所從事之銀行業務極有信用，客戶樂於往來，加上兼營若干船運公司之代理工作，出入貨物甚快而少囤貯，獲益甚豐。但在九子之後，繼承發生問題，企業遂告衰弛。

古田和子之「上海——蘭開夏棉紡織品在東亞之一貿易據點」利用北華捷報 (North China Herald) 之週資料統計1874至1893年間英國蘭開夏棉紡織品透過上海之分銷情形。其分銷點包括漢口、鎮江、天津、牛莊、長崎、神戶、釜山、仁川等等。以1870年代之神戶為例，其進口之蘭開夏棉紡織品三分之一係由上海轉口。全文分1874-78、1881-85、1886-89、1890-93 幾個階段統計上海各分銷口岸分銷蘭開夏棉紡織品比例的變化及各分銷口岸分銷量的相關係數。由1874至1893年間，持續約有四分之一再由漢口分銷，四分之一以下由天津分銷，15%由鎮江分銷，其他再由其他各港分銷。華中、華北各港之分銷數量常互為消長，東北、日本、朝鮮各港之分銷數量與華中之分銷數量則較少關連。

林滿紅之「清末大陸來臺貿易商人（郊商）的興衰問題」相對於1909年至1990年間十位研究郊商的學者指出：1. 以往學者大多因郊商在臺灣各大城市之活躍地位而忽略郊商有很多是「根在大陸而店在臺灣」的福建商人。往來兩岸之間的船隻由此等福建商人製造、經營，承購兩岸貿易品的資金，很多也由之融貸，故於兩岸貿易居於壟斷地位。2. 以往謂此等郊商於西力東漸之後因為不敵西力競爭，加上本身腐化而告衰弛，事實上，以往郊商研究者所用以說明臺灣郊商衰微的證據多半為十九世紀上半葉（清道光年間及咸豐初年）的證據。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臺灣與中國大陸一樣同受世界經濟蕭條影響，而不純粹是西力競爭或郊商腐化的問題。至1895年以前的十九世紀下半葉（清咸豐末年至同治光緒年間），則臺灣郊商也分享世界經濟景氣是而更為擴張。此一擴張包括貿易量的增加及商業管理方面的若干現代化發展。3. 臺灣郊商也並不像以往學者所說之於西力東漸之後改而依附英國資本之

下，而與大陸經濟關係式微。清領臺灣後期的郊商非常倚重大陸上的山西票號與錢莊資本。臺灣郊商與大陸的官僚家庭與幕友等非正式官僚體系又有其關連。陸臺貿易數量又有所增加，因而清末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關係是更為緊密而非式微。相對於主張亞洲內部貿易在西力東漸以後更為擴張，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之內居於舉足輕重地位的世界經濟史學者，本文指出：臺灣的郊商與中國、亞洲內部諸多傳統商人一樣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更為擴張。臺灣郊商與拉丁美洲、中東、部分非洲以外諸多開發中國家的傳統商人相同，發展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資本市場及本土原有的資本市場的雙重依附關係。來到臺灣的大陸商人係福建地區從事長程貿易商人之一分支，福建商人之貿易網絡自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延展至東南亞，陸臺貿易乃其一環。十九世紀上半葉陸臺貿易因世界經濟蕭條而緊縮的現象是否延及整個亞洲地區，值得注意。在福建地位高低有別的長程貿易商人的頂端係為一些官僚家庭所投資的商行，他們與官府的深厚關係，使其對整個長程貿易居於掌控地位。但也因為這些長程貿易商人與清朝官僚體系的密切關係使他們隨清朝覆亡而衰落。在清政權滅亡之際，亞洲內部的商業勢力是否有過一番結構性的重組，也值得深思。

Sherman Cochran 文探討虎標萬金油企業1910年至1950年間的商業網絡。此一企業開基主人為來自福建永定的緬甸華僑胡文虎。在父親所留下緬甸的一家藥店的基礎上，胡文虎拓展了北至北京，東至臺北，南至雅加達，西至緬甸 Rangoon 的國際企業。胡文虎在擴張其企業的過程中，未曾擔任外商買辦，也未曾學習英文或到過西方，他的經理、僱員多為其永定同鄉，但透過西方商人在東方所例示的一些商業行為，胡文虎逐漸走上坦途。他把攜帶、使用不便的中國式草藥改成攜帶、使用方便的萬金油。透過廣告、辦報、從事慈善事業，挨家挨戶兜售，分行經理定期報告業務，其企業聲望亦蒸蒸日上。但其與國民政府及中共政府之間則多齟齬。胡氏先支持蔣氏政權，但因胡借予福建政府之債款未見償還，胡在上海的存款，因戰時通貨膨脹，由三百萬元跌為一金元，胡遂憤而投靠中共政權。其在大陸之企業卻遭沒收，遂又轉而親近在臺灣的蔣政權。不過其在東亞、東南亞的事業仍然欣榮。與諸多華商分別在東南亞政權或蔣氏政權底下遭到壓制，胡的企業則另有發展空間。

杉山伸也有關1895至1930年間英商 Butterfield and Swire 在香港的太古精製糖公司的研究，著重其與日本精製糖公司如何競爭大陸市場。在1895

年以前，太古公司所製精製糖尚可供應日本。1895年之後，因為臺灣供應大日本、明治等糖業公司70%的原糖，又加上日本在1910年以前取得關稅自主權，外糖稅負較重，太古公司盡失其日本市場。太古公司所需原糖另需仰給於非本身殖民地的爪哇，又因太古公司在中國的貸款，索還時間較為短促，也需倚賴買辦中介，不若日本公司很多可以由能够操中文的僱員直接售糖至中國鄉間，1910年以後大日本精製糖公司已取代太古公司操控中國的精製糖價格，直至1932年中國展開抵制日貨運動，太古公司才再領先日本的製糖公司。

Linda Grove 研究1860至1930年間天津因為開放通商口岸而與腹地更為整合的過程。在開港之前，天津是華中、華南的米經運河北運北京的中間站，又為沿海鹽場，與南方的關係較為密切，天津土話多安徽腔即其一例。此外天津乃是北方之一防衛中心，與腹地的經貿關係並不密切，開港之後，內蒙羊毛、駱駝毛大量由天津出口，華北的棉花或進口的棉紗在天津附近製成棉布販售華北腹地，農村產品亦漸由天津出口，天津亦為華北之一金融中心。天津雖為全國第二大港，但與第一大港的上海不同，直到開港之後才與腹地密切整合。

濱下武志「在朝鮮的中國商人(1880-1910)」一文強調東方國家對西方開放的通商口岸，事實上也增加了東方國家之間彼此的商貿機會。此商貿活動多由東方原有的商人或原有的制度所推動。朝鮮自1876年釜山開港之後，中國商人，日本商人，西洋商人互競朝鮮市場。就1892至1893年間之三者人數而言，日人最多，為華人之四至五倍，西人最少，約華人之十分之一。中韓貿易在1883至1925年間約增為三十倍。1893年訂定的中韓條約，除近代條約精神之外，亦仍保有昔日朝貢關係的殘餘。

木村健次則探討日商 Kameya Aisuke 在朝鮮發展之商業網絡。當1876年朝鮮開港之際，很多德川政府所支持的關西商人因得不到明治政府支持，轉而到日本周邊的琉球、北海道、朝鮮發展。Kameya Aisuke 之到朝鮮是其中一例。透過伯叔、兄長牽引、大阪地區資金互助會的資金融通、以前在大阪的店友的合夥關係、以及三井財閥的支持，Aisuke 除了進行日韓貿易之外，也由上海進口棉紡織品至朝鮮，也將業務拓展至銀行、船運、倉庫、電力、燒酒、煙草等方面，除曾擔任朝鮮之日人商會會長之外，其財勢尚足以在日俄戰爭之中大力奧援日本政府，但因仍以房地產為最大投資對象，一次大戰後遂隨著景氣不佳而趨衰頹。

Ian Brown 則由一個東南亞研究者的立場來評析此次之討論會。他認為：1. 東亞商業網絡的研究，遠遠超過東南亞商業網絡的研究。2. 在東亞商業網絡的描繪過程中，特別著重透過水域的連繫，其與腹地的關連有待進一步探究。3. 在強調東亞內部關係時，仍不宜忽略西方力量的影響。4. 相對東南亞研究之著重國家力量的探討，這些研究有關國家的影響著墨不够。5. 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成爲很突顯的商業中樞，其他商業圈則多重疊，東亞地區商業中樞的集中性與重疊性爲何，也值得進一步研究。

最後有關米蘭之會如何準備的討論，除抽離出幾大議題之外，更強調得將亞洲地區的個案研究，更一般化而便於與西洋經濟史學者進行溝通。

#### 四、重要議題：商業網絡的持續與變遷

綜合以上各文內容及會場中、會場外的若干討論，這個會議的重要議題，可以用「商業網絡的持續與變遷」來加以概述。

商業網絡的持續可見於霍啟昌、古田和子、Cochran、林滿紅、濱下武志、木村健次諸文。古田和子、濱下武志、林滿紅均描繪出對西方之開放貿易反而增加了東亞各區之間的商貿關係。霍啟昌、Cochran、木村健次、林滿紅更從個案指出東亞本身的商人利用其傳統的同族、同鄉關係擴張其傳統的商業活動，或延展至現代的商業活動。由籠谷直人、杉山伸也二文更見日本商社頗多可以不用藉助買辦而直接進入印度或中國的鄉村購買棉花或配售精製糖。延展至現代商業活動的部分，就各文所示，均只承西方商人之示範作用，而未透過擔任西方商人買辦或到西方來加以學習。這些東亞商人的商業行爲 Cochran 認爲是介於 A. D. Chandler 所說之“personal capitalism”與“managerial capitalism”之間。

西方介入造成商業網絡在延續過程中的變異，也可見於濱下武志一文。據林滿紅指出，就濱下所呈顯的資料看來，前往朝鮮的中國商人，來自江浙、閩廣者比例越來越多，來自山東者比例越來越少，因此雖然同樣是中國商人前往朝鮮經商，其間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受西力影響而更加崛起的江浙、閩廣商人在朝鮮的地位也有所提升。而就坂本勉、谷本雅之二文看來，則西力造成商業網絡截然的變異。谷本雅之所論及的英國棉紡織品進口造成行會以外的新興商人崛起，其情形有似林滿紅文中所提及的高雄陳家，其逕銷南部臺灣糖至日本，是行會商人以外的發展。雖然新興商人與行會商

人有別，仍是本國商人。坂本勉的伊朗例子則指出西力東漸之後，傳統商人完全為外國商人所取代。根據坂本勉指出，伊朗乃一乾燥地區，臨海的港口較少，與日本、臺灣之海港眾多，提供商人更多發展機會不同，而就林滿紅文看來，伊朗正屬於本土資本市場薄弱的中東地區，不若東亞的日本、臺灣、中國，本土資本原較充裕。東亞商人在西力東漸之後，固然有如北部臺灣之局部依附英國資本的現象，但也有如大陸來臺商人之依賴山西票號、錢莊資本、Aisuke 之依賴大阪之資金市場，香港高家之倚賴華資。以故，東亞商人在西力東漸之後即使商業網絡有所變異，並不若中東之發生對西方資本之完全倚賴關係。

除西力影響之外，造成網絡變遷的一大因素是政局或政策的變化。如木村健次所指出，由德川幕府轉至明治政府之際，很多關西商人因為得不到明治政府支持而外移周邊地區發展。又如林滿紅文所指出，與清朝官僚家庭關係密切的大陸來臺貿易商人，隨 1911 年清朝官僚體系之覆亡而衰微。再如籠谷直人所說，日本商人在印度購棉利潤豐厚，1930年代則轉而不利，據林滿紅指出，如與籠谷直人有關「日印商會」的研究參照思考，可以推測日本政策對日商的利潤變化可能有所影響。就「日印商會」一文看來，1930年代日本在中國備受抵制之後轉而積極擴張印度之棉紡織品貿易。其擴張之速激起英國反彈。在日本政府退出國聯，國際地位陷入孤立狀態之時，日本乃與英、印妥協，召開日印商會，限制日商在印度之商貿活動。在這次會議宣讀各文之中，唯有胡文虎的跨國企業當其局部企業在若干國家受到該地政府沒收或打擊時，在其他國家的企業仍能進行。

影響商業網絡的因素，除西力刺激、政策、政局變化等等之外，消費市場的貧富情況或其變化也影響商業網絡。如杉山伸也研究的太古精製糖與古田和子研究的蘭開夏英國棉紡織品都以華中全國首富之區為最大銷場不為無因。但全國各區之間的貧富關係也因為對西方開放貿易而有所起落，林滿紅的臺灣研究指出臺灣北部在清末尚凌駕臺灣南部而崛起，很多昂貴物資轉而以臺灣北部為較大銷場。Linda Grove 的天津腹地也在口岸開岸開放之後更加活絡。由此也可以看出像 William Skinner 所說整個商業網絡之中不同等級市鎮間的層階關係 (hierarchy) 並不必然屹立不搖。

## 附：議 程

17 March

〈Session I〉 Chair: Linda Grove

2. 00~2. 10pm

S. Sugiyama (杉山伸也), 'Introduction'

2. 10~4. 20pm

Tsutomu Sakamoto (坂本勉), 'The Modern Ottoman Merchants  
in the Iranian Silk Trade Networks'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Tea break〕

4. 20~5. 10pm

Naoto Kagotani (籠谷直人), 'Toyo Menka Co. and the Japan-  
India Cotton Trade'

Discussant: Man-houng Lin (林滿紅)

18 March

〈Session II〉 Chair: Sherman Cochran

9. 00~9. 50am

K. C. Fok (霍啟昌), 'Lineage Ties, Business Partnership and  
Financial Agency: The Many Roles of a Hong Kong Commercial  
Network'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9. 50~10. 40am

Kazuko Furuta (古田和子), 'Shanghai: The East Asian Emporium  
for Lancashire Goods'

Discussant: Masayuki Tanimoto (谷本雅之)

〔Coffee break〕

11. 00~11. 50am

Masayuki Tanimoto, 'Who Marketed Imported Cotton Goods?-The  
Japanese Case'

Discussant: Linda Grove



[Lunch]

〈Session III〉 Chair: Ian Brown

2. 00~2. 50pm

Man-houng Lin, 'Decline or Prosperity? Mainland China's  
Merchants Tra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1820s-1895'

Discussant: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

2. 50~3. 40pm

Sherman Cochran, 'Sino-Japanese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iscussant: Kazuko Furuta

[Tea break]

4. 10~5. 00pm

S. Sugiyama, 'Marketing and Competition in China, 1895-1930:  
The Taikoo Sugar Refinery'

Discussant: K. C. Fok

19 March

〈Session IV〉 Chair: K. C. Fok

9. 50~10. 40am

Takeshi Hamashita, 'Old Korean Hands: Chinese Merchants in  
Korea'

Discussant: Ian Brown

[Coffee break]

11. 00~11. 50am

Kenji Kimura (木村健次), 'The Business Networks of Japanese  
Residents in Pre-war Korea'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Lunch]

〈Session V〉 Chair: Linda Grove

1. 30~2. 00pm

Ian Brown, 'Commercial Networks in Asia: General Over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ffee break]

2: 30-4: 30

Concluding Discussion for Milan

#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魏 外 揚\*

籌備多時的「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四年三月三至五日在臺北市立圖書館十樓會議廳舉行。這是繼「基督教與中國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八八年）、「基督教大學教育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一年）後，又一次環繞著「基督教與中國」這個課題的重要學術會議。此一會議仍舊是由中原、東海、東吳三所大學與美國的 Puget Sound 大學共同主辦，宇宙光傳播中心協辦。

過去研究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發展史的中外學者，往往將注意力放在教案與反教運動方面，近年來則逐漸將焦點轉移到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之上。舉凡教育、醫療、救濟、公益等事業，乃至思想觀念的啓發、社會風氣的革新等，都有不少精闢的專論著作問世，研究成果甚為豐碩。因而在此時刻，集合中外學者，觀摩研究方法、交換研究心得，實有其特殊意義。尤其此次會議，獲得大陸學者所提供的數篇論文，使得此次研討更具備多樣性與代表性。

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共計為二十七篇，現依地區排列如下：

1. 劉廣京 晚清人權論初探——兼論基督教思想之影響
2. Suzanne Wilson Barnett: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 Power, Prosperity, and Politics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Press in China
3. Samuel H. Chao: John L. Nevius (1829-1893) (倪維思) and The Three Self Movement: Modernization of Mission Methods in China
4. Robert Eric Entenmann: Christian Norms and Chinese Mores: Catholicism,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

\* 中原大學講師

5. Lawrence D. Kessler: *Modernism, Missionaries, a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6. Jessie G. Lutz: *The Legacy of the YWCA and YMCA for a Civil Society in China*  
(以上美國)
7. Margo Speisman Gewurtz: "The Cinderella of Mission Work", *Canadian Missionaries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North Honan, 1890-1925*  
(以上加拿大)
8. 李志剛 赫德 (Robert Hart) 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
9. 吳梓明 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教會大學文獻與近代中國教育研究
10. 梁家麟 西化、傳統文化：傳教士與「文化侵略」問題  
(以上香港)
11. 鍾志邦 基督教與儒家的對話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展望  
(以上新加坡)
12. 于曉蓉 教堂建築與中國現代化都市面貌的關係
13. 林金水 艾儒略 (Julius Alenio) 在泉州的交遊與傳教活動
14. 沈定平 「西學」的傳播與中國的早期近代化
15. 徐如雷 試析「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論」
16. 章開沅 貝德士 (Dr. M. B. Bates) 與金陵大學
17. 顧衛民 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  
(以上中國大陸)
18. 王成勉 余日章與公民教育運動
19. 王爾敏 上海仁濟醫院志略
20. 呂實強 明清之際中國知識分子反教言論中的拒斥科技與固執迷信  
——兼論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21. 林治平 福州衛理公會移民群體在砂勞越從事墾拓開發及文化教育工作對東馬現代化的影響
22. 查時傑 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牧師與淡水牛津學堂
23. 張奉箴 在華天主教的大學教育及其影響
24. 羅光 天主教士林哲學與儒家哲學現代化
25. 蘇雲峯 教會與德日二國政府在華教育事業之比較研究

## 26. 魏外揚 基督教在臺早期的醫療宣教

## 27. John Geddes: Pioneers in Women's Education

(以上臺灣)

很明顯的，基督教教育成爲這次研討會的首要主題，如 Margo S. Gewurtz，吳梓明、章開沅、查時傑、張奉箴、蘇雲峯與 John Geddes 等學者，他們的論文題目即已說明直接與教育有關。其他如 Lawrence D. Kessler, Jessie G. Lutz，顧衛民、王成勉與林治平等學者，他們的論文中也涉及不少與教育有關的問題。從層面來看，高等教育、宗教教育、婦女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都有專文探討；從地方區域來看，特別對上海、江陰（江蘇省）、河南省北部、臺灣省北部等地區，作了個案研究。總之，基督教教育絕不是這次研討會中的「灰姑娘」（Cinderella），而是受眾人所關注、所肯定，的確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管道。

經過二天半九個場次的密集研討後，大會在第三天（週末）下午安排了一次淡水教會史蹟之旅，參加者很踴躍，坐滿一部大型遊覽車。感謝「滬尾工作室」的蘇文魁先生，熱心引導我們參觀，在他的精采解說之下，每一件古蹟都充滿意義，成爲宣教先賢們熱愛斯土斯民的最好見證。

宇宙光傳播中心的同仁們爲這次會議付出很多心力，單是會前的準備工作就投注許多心血，每一篇論文都重排版印製，既清新又美觀，贏得與會人士的一致稱讚。整體而言，會議堪稱圓滿。場地適宜，議程順暢，各場次的主席與評論都很稱職，與會人士也都提供許多回應。邵玉銘教授的開幕演講，內容充實，見解精要；張光正校長在閉幕演講中，敘述其家族皈依基督的歷程，溫馨而感人。將來在論文集出版時，最好都能刊出。當然也有遺憾，一是此一研究領域的前輩，中央研究院劉廣京院士最後決定不克親自出席，只將論文寄至大會發表，使大會遜色不少；二是中國大陸的幾位學者，都因中共當局有所留難而受到阻滯，無法前來。落得只有文到人不到，令人遺憾。

三年後，一九九七年，是宣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入華的一百九十週年，屆時仍將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資紀念。Daniel H. Bays 在閉幕的總結報告中建議，下次會議的視野不妨再放寬些，不僅繼續探討「中國的現代化」，也應該探討「基督教的國際化」，因爲這是當前普世教會發展的趨勢，而基督教過去在中國的發展，也正是此一趨勢最值得引爲借鏡的一段經驗。我認爲他的建議很好，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來尋找中國現代化的根源與能源。

#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第43次全國學術大會

塚 本 元\*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 (Japan Association for Modern China Studies) 是研究現代 (含近代和現代) 中國和現代亞洲的學者所組織的。該會大概有四百五十名會員。會員的專長分屬於歷史、文學、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每年召開一次「全國學術大會」。第 43 次全國學術大會，於去年 (1993) 10月23日至24日假神戶商科大学 (神戶市西區) 舉行，約 150 名之會員出席該次會議。

會議進行的方式有二種：第一種是以主題分類，四組同時進行的方式舉行。分類的方式如下：第一組是「政治・法律」、第二組是「經濟」、第三組是「文學・思想」、第四組是「歷史・社會」。於10月23日宣讀和討論的論文，有24篇。第二種是共同主題，此次大會的主題是「中國社會的歷史變動」。於24日宣讀和討論共同主題的論文有 6 篇。此外，於23日大會揭幕的第一天也同時舉行的國際性「臺灣海峽之兩岸——孫文與中國之統一」專題之公開討論會，除與會者參與外，一般市民也共同參與了討論。

## 附錄：會議議程

第一日 10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 自由主題

第一組 政治・法律

上午 主持人 西村幸次郎 (大阪大學)

報告人 謝宏 (大阪大學研究生)：中國的經濟基本法成立之摸索

趙宏偉 (東京大學研究生)：試論現代中國的政治體制之起源

高橋信夫 (京都外國語大學)：毛澤東與官僚主義，1956-57年

---

\* 日本法政大學副教授

下午 主持人 國分良成（慶應大學）

石田收（東京家政學院筑波短期大學）：「鄧小平思想」之特徵——白貓黑貓論爭的背景

湯本國穗（千葉大學）：政治與專門性——以1930年代為中心

村田忠禧（橫濱國立大學）：89年天安門事件之再檢討

## 第二組 經濟

主持人 田島俊雄（東京大學）

山田敦（大阪市立大學研究生）：日本殖民地時代初期臺灣之殖產工業——以嘉義地方的製糖業為中心

東美晴（甲南大學研究生）：童養媳再考——上海郊外農村的個案

大島一二（東京農業大學）：關於農村外流勞動力之現狀的分析——以江蘇省、廣東省工業化農村的實態調查為例

下午 主持人 西村明（九州大學）

章政（東京農業大學研究生）：市場化進展與鄉鎮企業之原料供給及製品販賣之現狀——以江蘇省之實例為中心

三野昭一（早稻田大學）：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小嶋正巳（流通經濟大學）：國營企業的活性化

## 第三組 文學・思想

上午 主持人 山田敬三（神戶大學）

楊曉文（神戶大學研究生）：豐子愷的夏目漱石觀

下村作次郎（天理大學）：對臺灣文學之一個觀點——以向戰前「日本內地」文壇「進出」作品為中心

主持人 鳥井克之（關西大學）

胡士雲（大阪外語大學）：現代中國的語言政策

下午 主持人 鳥井克之（關西大學）

登坂學（橫濱市役所）：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少數民族教育之研究——關於多數派語言與少數派語言之關係

主持人 坂口直樹（同志社大學）

白水紀子（橫濱國立大學）：中國之話劇運動——以活報劇為中心

瀨戶宏（攝南大學）：關於焦菊隱與話劇之民族化——老舍「茶館」之演出

## 第四組 歷史・社會

上午 主持人 西村成雄（大阪外國語大學）

宮城美雪（神戶大學研究生）：中華蘇維埃政權之公教育——其理念與現實

光田剛（東京大學研究生）：大正民主主義與中國國民革命

田中仁（大阪外國語大學）：關於華北事變的一個考察——平津地區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活動

下午 主持人 近藤邦康（東京大學）

金子肇（下關市立大學）：上海工商同業公會的成立與國民政府——關於「業規」法認定問題

栃木利夫（法政大學）：北伐戰爭之再檢討

中屋敷宏（弘前大學）：「社會主義」之崩潰與中國之現代化

#### 國際性專題公開討論

臺灣海峽之兩岸——孫文和中國之統一

主持人 野村浩一（日本現代中國學會董事長・立教大學）

引言人 山田敬三（孫中山紀念會・神戶大學文學部）

討論人 陸士清（上海・復旦大學臺灣香港文化研究所）

陳鵬仁（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

若林正文（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狹間直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共催 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

後援 日本放送協會神戶放送局

第二日 10月24日（星期天）

共同主題 「中國社會之歷史的變動」

主持人 加々美光行（愛知大學）、上原一慶（京都大學）

辻康吾（東海大學）：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評介

荻野脩二（關西大學）：評論人

國谷知史（新潟大學）：經濟改革與立法——從法律側面來看中國社會之歷史變動

遠山昭次（九州國際大學）：評論人

涂照彥（名古屋大學）：1990年代之東洋資本主義與中國——以國際經濟論觀點之探討

加藤弘之（神戶大學）：評論人

會中發表之論文將預定刊載在1994年6月出版的「現代中國」第68號。



## 學人簡介

# 韋慶遠

柏 樺\*

韋慶遠，民國十七年（1928年）出生，廣東省順德縣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教授。

他少年時在香港、澳門讀書，抗戰勝利後到北京上大學。1950年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歷任中國歷史教研室、檔案系講師、副教授、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比較寬廣的，對明清歷史檔案及明清史料整理、明清社會經濟史、明清政治制度史、中國近代憲政運動史等多方面都有專門著述。早在50年代後期，他即完成了《中國檔案史稿》和《明代黃冊制度》兩部專著，後者直到現在仍為國內外明史專業教學列為必讀參考書。1978年以來，他又陸續出版了名為《檔房論史文編》、《明清史辨析》等論文集，《清代奴婢制度》（合著）等專著，主編了諸如《中國政治制度史》、《清代全史》第五卷等著作。他一直重視史學的基本資料建設，由他主持編輯出版的，諸如《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資料》、《清代的礦業》、《清代的旗地》等，是以大量利用歷史檔案為主，輔以各種官書、政書、私人著述筆記材料的專題性參考書。他歷年已發表了史學論文八十餘篇，其中如《論清代的皇當》、《明初的三楊與儒家政治》、《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等，國內外均予以較高評價。他在撰寫每一篇論文時，都非常注意打好資料基礎，不辭辛勞地搜集資料，然後加工深入地縷分細析，反復推敲，務求得出切合歷史實際的結論。因他撰寫的清史論文總有近50%屬於首次使用的原始資料，故許多學者認為：「韋先生所發表的論文常有新見，而且立論平允而切中肯綮」。他除了已出版的十餘種專著、論文集、教材、資料書以外，現已完成了由中國人民大學與南京大學共同編寫的新體裁《中國政治制度史》教材，由國家行政

\* 人民大學檔案學院碩士，現任檔案學院講師。



學院委託編寫的《中國文官制度》教材的主編工作。與高放、劉文源先生合著的大型專題論著《清末憲政運動史稿》亦已殺青。

在教學方面，他在校內外開設過《中國檔案史》、《中國國家機關史》、《中國政治制度史》、《明清檔案與明清史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等課程。指導過十餘名碩士研究生，還指導十餘名外國進修生。他不斷以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豐富教學。有些三四十年前聽過他講課的老校友，迄今還有來校談到在當年聽課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任客座研究員，在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多次在美國、日本、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大專院校和學術團體參與研究和進行專題演講。他在參加國際學術交流中獲得海外學者的尊重，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曾致函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成仿吾，內謂：「韋教授給我們帶來了崇實的學風，提高了哈佛大學的研究水平。」

他的學術思想可以歸納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治史和治檔相結合，以整理檔案作為史學研究的準備，以史學研究作為對歷史檔案功能的發揮。他一直強調，歷史學是研究既往事實的科學，而明清以來的歷史檔案則是最豐富最系統史料的「載體」，能「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但他並沒有因此對檔案產生迷信，認為必須清醒地看到，所有現存明清檔案，相當一部分乃是當時朝廷、官府、官僚及其僕從製作的官文書，只能是浸透著封建地主階層的立場和觀點，只能是從各個方面維護著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強調在利用官文書的同時，應充分重視對契約、譜牒、信札等民間檔案的史料價值，又絕不能排斥其他圖書文獻資料的作用，必須對它們參詳比較，進行具體的估量和分析，然後有選擇地審慎使用。他概括地提出：「用書不如用檔，用檔不忘用書，盡信檔不如無檔，盡信書不如無書，史檔結合又相攻，混沌史實可分明」。

第二，研究政治制度必須與研究社會經濟相結合，務求從社會基礎的深入了解對上層建築作出相吻合的解釋。他認為必須對政治制度與各該時期的典章、人物、事件作動態的研究，必須區分出前、中、後期，區分出體制總體和具體規章的結合和矛盾，區分出政策方針與其實際執行狀況的一致和歧異的方面。這在他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政治制度史》中有所體現。該教材不僅把各個時期總的國家體制以及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監察、人事、財政、文教、民族等方面的典章制度的形成和執行情況加以介紹，而且還將其置於各該時期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階級關係和政治局勢的總體中進

行分析，從發展的角度來論述其興衰和演變。這種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不僅加深了學員對中國政治制度史的認識，而且提高了他們的學習興趣。香港中文大學已將該書列為教材，臺灣有些院校也將該書民國以前的部分列為教材。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州縣研究》正是在上述方針指導下順利進行著。

第三，在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他認為不但應對每一歷史人物依托進行活動的客觀社會、政治環境、本人經歷的轉折特點、功罪等進行實事求是的論述，還應該對有關人物較深層次的心理狀況進行有根據的分析。他近年講過一些有關歷史心理學的專題，特別對明代16帝的心理狀況及其前後變化，對歷史發展的正負面影響進行探討。他認為，這是當前對歷史人物研究的薄弱環節，有必要進行深入鑽研。在他已發表的論文中，如對明初的楊士奇、楊榮、楊溥，明中葉的嘉、隆、萬三帝，對清代康、雍、乾三帝，都通過大量史料以對他們的心態進行分析，其中新意耐人回味。

第四，他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涉及的方面比較廣泛，近年先後發表過諸如經濟政策、財政金融、高利貸、礦業、商業、鹽業、製造業及運輸業等方面的系列論文。他採取了「人棄我取，小題深造」的辦法，對過去從未有人研究過的，諸如清代的皇當、官當、當舖業中的官僚資本以及生息銀兩制度等，逐一進行論述。他還特別注意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對江南、閩粵和臺灣等地區的經濟發展，臺灣與大陸的經濟聯繫等，都寫過專門的論文。他認為，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重點應放在各地區的特點和專門性問題上，放在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上，絕不能人同一驗，地同一式，絕不能從既定的框架進行史料填充。

## 主要著作目錄

- 1.《中國檔案史稿》（1957年《檔案工作》雜誌第1-6期連載）。
- 2.《明代黃冊制度》（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
- 3.《清代奴婢制度》（與吳奇衍、魯素合作，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 4.《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
- 5.《檔房論史文編》（論文集，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6.《明清史辨析》（論文集，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 7.《清朝全史》（任全書編委，第五卷主編，著重論述雍乾時期社會經濟，199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8.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該卷編委，政治制度分支主編，1992年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9. 《中國政治制度史》（按朝代順序編寫的高等學校用的教科書，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0. 《中國政治制度史》（按專題排列的高校自學考試教科書，與王德寶教授共同主編，1993年高教出版社出版）。
  11. 《康雍乾城鄉人民反抗資料》（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
  12. 《清代的礦業資料》（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
  13. 《清代的旗地資料》（1989年中華書局出版）。
- 歷年發表的論文約八十餘篇，不一一細列篇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兩種**

(48) 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 212頁 精300元

陳存恭訪問 陳美惠紀錄

趙正楷先生，字法真，一九〇二年生於山西省崞縣。民國十四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法科，先後供職山西省政府村政處、公報館、人民公營事業董事處。抗戰時轉任甘肅水泥公司業務主任。戰後為淄博煤礦公司營運課長，隨公司來臺，出任新竹煤礦公司總務主任、臺碱公司董事會秘書、安順廠副廠長。對地方行政及經建事業獻替良多。著有「徐永昌傳」、「求己齋回憶錄」。

(49) 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1940-1962)

許雪姬訪問 官曼莉、林世青、蔡說麗紀錄

315頁 精400元

往昔在臺灣享有「南唐榮、北大同」之譽的唐榮公司，成立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於此之前唐榮、唐傳宗父子經營唐榮商店，為設在屏東的臺糖做採購的工作，其後獲日本政府許可，唐傳宗設置唐榮鐵工所，開始了慘澹的經營。初期專門收購糖廠的廢銅鐵加工轉賣，光復後增設製釘、電鍍廠，兼及拆船業；民國三十七年增設電爐，鋼鐵產量大增，揚名全臺。然至民國三十八年，局勢動盪，通貨膨脹嚴重，唐榮銀根抽緊，幸賴政府支援，始度難關；此後努力研發技術，提昇名質，在穩定中成長，並積極進行如磚廠、煉銅、電燈、水泥電桿等不同面向的經營。民國四十四年增資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實則仍為家族經營。

此後由於進行多角化營運，且購地擴廠，導致資金周轉困難，逐漸吸收民間游資，並向各行庫融資。民國四十六年起，出口雖賺取不少外匯，但以內銷為主的製品，未全為國營企業所採購，致使部份投資血本無歸，直、間接使唐榮營運產生危機；民國四十九年，臺銀宣佈凍結其債權，引發擠兌風波，後以政府引用國家總動員法，派員接管，清查結果資產、債權相抵，民國五十一年二月改組成立新公司，由省府接管，自此成為省營唐榮公司。

本書除了唐傳宗先生以及相關人物的訪問紀錄外，另加上六個附錄及一個附件，期使讀者能清楚地認識民營時期的唐榮廠，並對文字資料與訪談資料互相印證。



## 研究概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民國82年4月～82年12月)

江淑玲\*輯

### 一、知識份子與大眾文化，1901～1937（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李孝悌

計畫執行期：民國82、4、1～83、3、31

計畫內容：一九〇〇年以後，利用各種民間戲曲向一般「不識之無」的民眾灌輸新知識、新觀念、新道德的主張，漸漸成爲各階層知識份子的共識。鼓勵用戲曲來開啟民智的議論大量出現，各式各樣的改良戲曲也紛紛出籠。本計畫將對京劇、粵劇、秦腔等民間劇種實際演出過的「改良新戲」，就其內容、影響作全面、系統的分析。此外，各地的「時事新戲」和「文明戲」也在論述之列。而採用舊有的曲藝形式寫成的「醒世歌」等，有不少唱本傳世，本計畫亦擬對其內容、讀者（聽眾）羣和分佈的情形加以探討。此外，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因實際需要和理論趨向的影響，對民間戲曲、文化和演藝者給予更高的重視，在一切爲工農兵服務的口號和政策下，終於在1949年以後建立了一個以人民的文化爲導向的新的文化取向。本計畫的目的之一就在論述這個大小傳統、士庶文化易位的原因和過程。

### 二、清代皇族的家庭結構與經濟生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賴惠敏

計畫執行期：82、7、1～83、6、30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計畫內容：近三年來，美國與臺灣學者合作計畫，建立清代皇族宗室家譜的電腦資料庫，目前已建立八萬人的詳細個人檔案，這些資料提供給學者從事皇族的人口研究工作，其成果將陸續發表於國際學術刊物。目前利用宗人府的嫁娶恩賞銀檔案，抄錄皇族婦女生卒年及結婚日期，以便分析婦女的結婚年齡和生育行爲。此外，也利用檔案和文集探討皇族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包括妻、妾、兒媳、寡婦的角色，及她們角色轉變時的適應能力，且從法律的觀點來探討婦女權益問題。此外又從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搜集不少皇族的土地資料，由於皇族家庭中有貴賤、嫡庶、長幼的身分等差，影響其承繼財產的優先次序，此方面資料可用來討論皇族的財產繼承方式；另方面將用來探討皇族莊園的經營方式。

### 三、日軍佔領臺灣期間的軍事措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劉鳳翰

協同主持人：許雪姬

計畫執行期：民國82、10、1～83、9、30

計畫內容：日本據臺的五十一年期間，以臺灣爲其南侵基地，除對中國的福建、廣東外，並對中南半島、菲律賓、南洋羣島，乃至澳洲作爲佔領目標，故在臺灣進行一系列的海、陸（空）軍基地與相關措施。中日戰爭前夕，日軍在臺灣有若干要塞及守備部隊，陸海軍總兵力約萬餘人，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將守備部隊編成臺灣混成旅團（波田支隊）開往中國參加武漢會戰。珍珠港事變後，臺灣成爲日本內地與南洋羣島間的聯絡樞紐，此期增加了防空部隊及後方勤務機構與人員。至投降前夕，日軍在臺兵力竟達十八萬之多，其他相關性的配合措施亦隨之大幅增加。因此，日軍在其佔領臺灣末期，爲配合其整體作戰而作的軍事措施，乃成爲瞭解日軍對南洋作戰而做策略性調整的重點。本計畫擬根據日軍佔領臺灣期間之軍事設施史實等原始資料，對日軍據臺期間的軍事措置作一全面性探討，以補足學界對此段研究的空白。

### 四、日本對中國煤礦投資之研究，1900～194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陳慈玉

計畫執行期：民國82、12、1～83、11、30

計畫內容：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由於實行殖產興業政策，近代工業迅速發展，對於燃料煤的需求比以前增加甚多。二十世紀初期日俄戰爭的勝利，帶給日本經濟空前的景氣。於是大礦業資本不僅壟斷國內九州、北海道等地的優良龐大礦區，進一步欲開拓海外礦區，著眼於朝鮮、臺灣和中國東北的煤、鐵礦。二十一條要求簽訂（1915）後，日本取得山東和東北等地的權益，民間資本更積極地將投資領域擴展至中國本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本供給資本財給世界的歐洲成爲戰場，反而亟需軍需品和其他工業品，日本的海運業也得以擴張，此外，對於鋼材和燃料煤的需求因此劇增。甚至其他製造業亦連環反應，因此勃興。這些工業的能源皆來自煤炭。於是日本除了擴大國內煤炭生產外，並增加殖民地和中國煤的進口（臺煤自1916年開始大量流入日本）。本計畫將分析日本對華煤礦投資的政策，並探討財閥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取得中國煤礦的方式，以期進一步了解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與日本（包括殖民地臺灣）的經濟關係和兩國的官商關係，也將研討由此對中國經濟所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 五、臺灣光復初期之產業政策與企業經營——唐榮鐵工廠個案研究，1940～196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許雪姬

共同主持人：劉素芬

計畫執行期：民國82、10、1～83、9、30

計畫內容：臺灣經濟發展奇蹟及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啟示，一直是許多經濟發展學者研究的主題，然而有關經濟發展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始終是最引發爭議而難於釐清的盲點。前人研究多偏重於政府經濟政策如何成功地引導產業發展的方向，進而獲致經濟成長的光明面；相形之下，對於民間企業與政府政策的互動與調適困境，以及政策干預所可能造成之社會經濟成本扭曲，則較少著墨。本研究個案之唐榮鐵工廠成立於日據時期（1940），歷經二次大戰與光復後之通貨膨脹危機，在民國四十年代經營極爲成功，卻因急速擴張導致周轉不靈，最後由政府接管改爲省營。本計畫研究重點包括：（一）光復後政府經濟干預政策之形成背景。（二）在政府制定具有明顯階段性之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之下，民間業者如何調整企業經營之方向與內容。（三）比較光復前後之政府角色與企業經營之互動。（四）臺灣企業經營文化之形成。藉此可以明瞭光復後臺灣經濟發展初期所遭遇之困難，及不同政治、社會、

文化背景之下，政府經濟政策與企業經營之間的關係。

六、居正全集資料之蒐集與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陳三井

國外協同主持人：居蜜女士（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專家）

計畫執行期：民國82、7、1~84、6、30

計畫內容：居正一生，自游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以來，前後經歷武昌首義、臨時政府成立、二次革命討袁、南下護法、中華革命黨改組、一全大會、西山會議反共、清黨、寧漢分裂、北伐、勘亂、行憲、國共和談、播遷來臺等重要階段。在黨務工作方面，先後擔任黨務部部長、總務部主任、組織部長、參議、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等職。在政府行政工作方面，歷任內務部次長、部長、交通部長、司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院長等職。在軍事方面，民國二年討袁軍興，任吳淞要塞司令官，民國五年至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在外交方面，曾與犬養毅內閣代表萱野長知會談東北問題，折衝樽俎，頗有成就。在中央民代方面，先後出任參議院議員、監察院委員。綜觀居氏一生，在近代史及民國史上，實具重要地位。本計畫分兩年執行，第一年以蒐集資料為主，包括家屬提供部分，以及在臺灣、大陸、美國、日本四個地區之相關資料，委請專人作全面性之蒐集，先建立目錄，再行複印或抄錄。第二年訂定註釋體例，在原地先進行註釋工作，再交中研院近史所集中整理，並裝釘至可出版之程度，供研究者之參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演講集

(1) 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

康無為 (Harold Kahn) 著 100頁 平200元

Three Historians: Thoughts on Reading Their Books  
 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

Imperial Taste: the Monumental and Exotic in the Qianlong Reign  
 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

Drawing Conclusions: 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  
 「畫中有話」：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之前的歷史

函購八折，郵撥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五四話語」之反省的再反省

當代大陸思潮與顧昕的《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

黃克武\*\*

1993年11月筆者第一次赴大陸參加一個有關戊戌後康有為、梁啟超與維新派的學術研討會，根據會中大陸學者的論文與發言，筆者發現 80 年代以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伴隨著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思想控制的寬鬆，對大陸學術界已經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其中一個較明顯的現象是歷史研究的「多元化」，從前官方馬克斯主義歷史學與「革命中心史觀」獨霸的現象已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種聲音的爭鳴。例如在這一次會議中從前被人們大力貶抑的保皇黨，已順應改革形勢的高漲而稱為較具正面意義的「維新派」；改革派的梁啟超也在「愛國主義者」的旗幟下被塑造為新的偶像。這些現象不能說是與當局改革開放的背景完全無關。當然，由於政治控制雖已鬆動卻仍有相當的主控權，而在中共長期宣傳與教育之下成長的學者也已養成思想上自我規範的習慣，所以所謂的「多元」仍是在一定範圍之內的。

在上述會議中，當筆者的言論開始「越軌」之時，有學者為捍衛「正統典範」而提出說明，有學者以為筆者是年少無知、信口雌黃而破口大罵，有學者以「不要破壞兩岸學術交流」為由而予以規勸，也有學者從部分肯定的角度提出一些背景性的解釋或辯難。這些現象無疑地反映目前大陸史學界正處於一個轉變的關頭，由於內外情勢的變遷，有不少的人，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學生，一方面不信服馬克斯史學的階段論或史學為政治服務的教條，另一

---

\*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書價：港幣七十五元，頁數：227頁。本書承蒙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推介，在撰寫過程中又受到多次指正，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方面也不安於實事求事，而希望在兩者之外走出一條新的路子。

這樣的嘗試在大陸的學術環境中是相當困難的，這不但是由於政治控制、學術與政治的緊密關連和港、臺與外文圖書資料的缺乏等因素所造成，也是由於大陸學術界普遍缺乏分析反省能力，看不見自身思想的預設，又不重視二手資料的學術習慣所致。在一個不注意他人研究與「學術累積」，又不屑於接受外界嚴厲批判的環境中，要使學術有所進步是談何容易！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顧昕這本書的出現是十分可喜的事，上述對大陸學術界的批判在這本書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證。顧氏主要以中國大陸1980年代以來在報章、期刊上對五四運動的討論，尤其是1989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為核心，檢討「五四話語」(the May Fourth Discourses)被當代人們「意識型態化」的過程。他所注意的不僅是歷史，也不僅是當前的學術界與知識份子，而是歷史學與現實的糾結，以及在此糾結之中不同主張者所共有的思想預設。該書無論是在方法論與對大陸學術界的描述與分析之上都有相當深刻的見解，筆者認為對大陸未來學術發展有很正面的貢獻。但此書在香港出版，又對中共極權統治的「罪行」，尤其是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共軍隊血腥鎮壓北京的民眾民主示威」(頁四九)持反對意見，這樣的「意識型態」的色彩或許會影響該書在大陸的流通，因此不揣簡陋加以介紹，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顧昕所討論的主要題目依照其章節的安排包括：一、李澤厚以「救亡壓倒啟蒙」來說明五四運動的失敗之論點及其所受到的批判。二、「五四精神是什麼？」的討論。三、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所提出之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其傳統根源與五四反傳統思想與文革的關係等論點的討論。四、五四全盤西化論與其反對者之論爭。五、對五四啟蒙運動之闕失面的討論。六、相對於李澤厚從外在面所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有些學者則從五四運動的內部尋找其失敗的種子。這些人有何觀點？

參加上述討論的代表人物約略可以形成一個光譜，其中至少包括以下數類：一、正統或「原教旨式」的馬克斯主義者；二、人道主義的與非官方的馬克斯主義者，如李澤厚及其支持者；三、當代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這些人也反對官方意識型態）如包遵信、劉曉波等；四、海外反對中共的異議份子；五、當代新儒家以及像杜維明等宣傳新儒理念的學者；六、西方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如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林毓生、舒衡哲 (Vera Schwarcz)、傅樂詩 (Charlotte Furth) 與郭穎頤等，這些人的作品因為被

翻譯為中文而參與大陸學術界的討論。此外也有一些不易歸類的知識份子。

以下我們首先描述顧氏在此書中的理論架構以及依靠此理論架構他對中國大陸學術界所作的描寫、分析與評估。其次再談我對該書的一些批評意見。

對於五四運動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一些批判性的觀點，除了早期的新儒家以外，張灝指出五四思想有烏托邦式的絕對化心態，「結果『德先生』與『賽先生』變成了『德菩薩』與『賽菩薩』」。金耀基也指出五四對民主與科學的理解是浪漫化與意理化的。<sup>①</sup>顧昕有相當類似的觀點，但是他用一個比較系統的架構來做分析，企圖得到一個更全面與更深入的了解。顧氏分析的起點是學術與意識型態之間的分際，他反對後現代主義者將所有的學術思想都視為意識型態的論點（頁9），以為「學術」與「意識型態」兩者「顯然是不同的」（頁8）。學術旨在說明實然，其中包含兩個層次的活動，一是描述客觀現象的特徵，一是解釋現象與現象之間的聯繫。是故真正的學術只從事於描寫、了解因果關係與預測等工作，但是卻要避免規範性的評估與指導。所以他認為在上述定義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學術性的，而歷史學如果尊敬這些條件，尤其是其中的「邏輯的結構」，也可以是屬於學術的（頁13）。從顧氏全書對學術一詞的使用來看，他以為所謂「純粹性的學術」似乎只存在於西方，在中國不易找到。他大力讚揚波普爾（Karl R. Popper）、韋伯（Max Weber）、伯林（Isaiah Berlin）、海耶克（F. A. Hayek）、史華慈（B. Schwartz）、魏特夫（K. Wittfogel）等西方學者，而對中國學者不自覺地將學術與意識型態混為一談的現象嚴加貶抑。

從顧氏對大陸當代學術界之批判來看，我們發現他是從一種特殊的「學術」立場出發的，用他的話來說，他所肯定的學術立場是海耶克、波普爾以及伯林等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而來，以「經驗主義文明觀」為基礎的自由主義，以為「文明是經由一個累積成長的過程演化而成，人類理性是文明的產物，它只有在文明的框架內才能成長並成功運作起來」；「文明的開展被視為一個試錯的過程（trial and error），即不斷地嘗試，發現錯誤不斷加以修正」（頁123）。因此他對追求「一個最終解決之道」的信念抱持著疑拒的態度，也不相信「有某種根本的現代化之路的存在」

①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收入《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8年），頁145。金耀基，「五四新傳統的批判與繼承：對民主與科學的再思」，《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196。

(頁226) 。②

顧氏對「意識型態」一詞的界定主要是來自社會學家席爾斯 (Edward Shils)，他以為意識型態所研究的主題與學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是人、社會、宇宙及其相互關係，但其主旨則是規範性的，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信仰體系」或「生活指南」。意識型態通常是將事實或規範性的陳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明確而易於了解的體系，並以一些口號來顯示其意旨。此一體系又是權威性與強制性的，可以為人類的行為或政策提供合法性的依據。

顧氏認為學術與意識型態之差別就像「實然」與「應然」的差別一樣是不容混淆的，例如他說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馬克斯主義有顯而易見的不同，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與中共教科書所描繪的五四之間也是有所差異的，前者為學術，後者為意識型態。但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了解到兩者之間有「剪不斷的糾纏關係」(頁159)，人們常常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之下將兩者混為一談，以學術來「包裝」意識型態。這種情況他稱為學術的「意識型態化」或「神話化」，在此書中他特別注意到歷史學的「意識型態化」的問題。

意識型態化的概念也涉及顧氏所謂布狄厄 (Pierre Bourdieu) 「符號資本」與「符號鬭爭」的說法。根據布狄厄各種符號形式如語言、體態、衣著、慣例等是表達社會現實 (亦即描述與解釋世界) 的一個認知力量，掌握了這種符號的權力就有如掌握了一種經濟或政治資本，可以對弱勢羣體加以控制，此種資本即「符號資本」。社會不同羣體為爭奪此資本而有「符號鬭爭」。顧氏以為在中國「五四」是一種符號，不同人們爭奪對五四的解釋權即為一種符號鬭爭。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將「符號」視為資本並為自身之利益服務即為意識型態化，而符號鬭爭則是意識型態之鬭爭的一種表現。

顧氏以為意識型態的話語主要包括：一、官方的宣傳與官方對歷史問題與當代意見的「裁決」。二、學者以學術討論來作價值判斷 (例如支持官方意見或某種道德要求)、未來借鑑，甚至當成攻擊對手的武器。三、一般人

② 顧昕在他的《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3年)一書中對「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有一較清楚的說明，他說「休姆的道德哲學，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和倫理學、亞當弗格森的歷史學和倫理學一起，匯成了不同於法國啟蒙運動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與法國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相區別，蘇格蘭啟蒙運動持一種社會演化論，即強調道德、法律和政治制度為歷史的、社會的漸進演化而形成。這一啟蒙傳統，為英國傳統下的自由主義，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道德的，奠定了思想基礎」，見頁32。

以歷史表達來滿足認同或情感上的需求。對他來說意識型態自身不必然是負面的東西，但是混淆學術與意識型態之間的界線則絕對是應予避免的。

爲什麼？作者一方面認爲這種混淆妨礙了學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意識型態化的結果使「應然」的討論含糊不清，讓人們找不到適合的方向。他特別強調因爲學術與意識型態的混淆使中國當代的意識型態有以下的特色：一、泛道德主義，以道德標準作爲評判事物的基礎。二、目的論的歷史觀，以爲歷史發展有一必然的規律與發展的路向，此一規律與路向是不依個人意志而轉移的。這種歷史觀也帶有樂觀主義的成分，因爲只要跟著歷史所昭示的原則去做，自然可以達成目標。三、上述對歷史規律的看法又與他們對科學的看法結合在一起，以爲歷史發展配合科學的普遍規律。四、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認爲上述歷史的路向所達到的結局是一個純淨完美的目標，而不考慮到這種絕對的理想在歷史中的可行性。五、整體主義與一元論式的進路，認爲世界上美好的東西是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的各部分也是相關的，所以可以尋找一個最終的解決之道，達成上述純淨的理想。

在此一思維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大陸五四話語之中的「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法治」、「商品經濟」、「學術」或「現代化」等詞，或是其中之一，或是結合數項，被認爲是達到此一最終理想的「根本方法」，中國當代不少的知識份子樂觀地相信只要在這一個或二個方面有所成功，其它的困難會迎刃而解。這一想法顯示在許多方面，如五四以來「科學主義」的信念（亦即把科學當成一種價值或信仰來崇拜）、烏托邦式的民主觀（頁 65, 179）、魏明康的平等觀（頁 161）與劉曉波對「現代性」的看法（頁 162），以及嚴家其對「商先生」（商品經濟）、「洛先生」（法治）的期盼（頁 159）和中共所宣稱的「四項基本原則」都不脫此一思想模式的色彩。甚至連林毓生所提出的「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之口號，顧氏也以爲表現出「一元論式的進路」，而與「自由創造精神的展開不相容」（頁 123）。

爲什麼中國意識型態的討論會有以上的特色？顧氏以爲首先是因爲中國傳統之中就有高度意識型態化的傾向，因而產生這些影響深遠的思想模式。他基本上同意林毓生對一元論思想模式的分析，以爲此一思想模式「不僅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存在，也不僅在五四知識份子上存在，而且還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身上繼續存在」（頁 107）。與一元論有關而也是從傳統來的是泛道德論的褒貶史觀（道德理想主義），以及由此而來的目的論的歷史觀

與烏托邦思想。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形成了上述對歷史必然性的信念、整體主義與科學主義等，這些觀念又影響到當代。

顧氏認為當代意識型態化的產生也因為中國知識份子缺乏自覺與反省的精神，所以無法釐清上述從傳統來的思想預設，或探討布狄厄所謂「未經討論的空間」（頁 210, 223），他以爲此一未經反省的傳統是「五四話語意識型態化的內在原因」（頁 223）。顧氏進一步分析此一現象，他指出有些學者「渾然不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思想方法值得反省」，對別人的反省又視而不見；另一些人則是瞭解別人的反省卻「不加理性批判地予以拒絕」。例如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已有深刻的反省，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此一很有價值的看法卻視而不見，顧氏很敏銳地指出「事實上，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依然同他們的五四先輩那樣，儘管對西方的思潮熱情，但對那些同中國傳統不相投合的內容，存有根深蒂固的隔膜感」（頁 223）。即使是像李澤厚那樣大陸第一流的歷史學者，雖然也熟悉波爾普的觀點，卻表示他治中國思想史的旨趣是「百花齊放，殊途同歸，同歸於歷史唯物主義，同歸於像馬克斯那樣科學地解釋歷史，找出它固有的客觀規律，以有助於今日之現實，即『有助於人們去主動地創造歷史』」（頁 224）。在這種氣氛下，將學術尤其是歷史與意識型態混淆在一起無寧是很自然的事。

大陸學者缺乏反省能力的另一表現是分析能力的不足。在顧昕所討論的文章之中，他指出有不少人邏輯混亂，所以常常分析與評估不分，在分析時或者不重視層次的區別，例如將「思想模式」與「思想主潮」混爲一談（頁 100），或者是不加論證而草率地下論斷。此外也有人在批評某一現象的同時自己又犯了他所批評的錯誤（頁 189）。由於分析能力不足也導致不少學者對他人著作，尤其西方的著作，有所誤解。韋伯、伯林、波普爾與林毓生的作品都曾受到此一待遇。與誤解他人學說相關的另一個缺點是西方所謂稻草人式的批評方式（straw man），亦即將他人的論點簡單化或加以扭曲之後再予以痛擊。在此書中顧昕很敏銳地指出好幾個這樣的例子。（頁 112, 135）

缺乏反省與分析能力也表現在封閉式的研究方法之上。顧氏指出大陸學術界有不重視二手研究與學術累積的積習。他說「中國大陸學者在著述時，對過去有人做過的相關研究及其成果一向沒有徵引的習慣。這學風長期積習難改」（頁 182）。他又批評汪暉「儘管他顯然瞭解諸位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沒有引文，從而使他的討論沒有基於學術累積，從而在編史學上有某種型式上的缺陷」（頁 202）。這種積習自然使他們看不到西方學術界

一些有價值的反省工作。

顧昕認為中國學術界意識型態化也與西方的影響有關，在這方面他著墨不多，大致而言他主要依賴蘇格蘭與法國兩種啟蒙運動的傳統來作分析。對他來說中國的問題是太受到法國啟蒙運動傳統的影響，以為「人類可以經由理性的設計在傳統的廢墟上完全重建一個新的文明」。他指出五四以來的反傳統精神滋養了一種整體主義的樂觀精神，這種精神「正合中國新文化知識份子所心儀的法國啟蒙運動的真諦」（頁 143）。作者似乎暗示中國知識份子那麼肯定法國啟蒙運動主要是因為此一思路配合一些來自傳統的觀念。當然另一方面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所具有的「經驗主義的文明觀」以及自由主義的看法在中國因為與傳統扞格不入，因而未受到應有的尊重，似乎也成為中國思想意識型態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頁108）。

最後顧昕以為意識型態化的產生又受到中國共產黨文化的影響。他指出馬克斯主義本身即是高度意識型態化的體系，其中具有歷史決定論、烏托邦色彩、對科學規律的比附等，此外共黨文化中鬭爭的技巧如「抹黑戰術」等也影響到學術的討論（頁113）。顧氏沒有討論馬克斯主義與上述「法國啟蒙運動傳統」的關係，但他似乎同意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盛行也是因為它的主張配合了上述的中國思想傳統與五四以來的一些思想傾向。

顧氏在此書中不但對比較傾向五四運動的思想提出批判，對於反對五四的「當代新儒家」思想同樣表示不滿。他雖然也提到「新儒家對五四時期盛行的『科學一層論』、『理智一元論』和『泛民主泛自由』之風氣的批評，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新儒家學派對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的學理性的意見」（頁 143），但他一方面不願肯定這些早期戰友在反省五四運動之上的開拓之功，認為他們的批判「並不構成對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潮的學術性反省，而含有濃烈的情感和意識型態的色彩」（頁 141）；另一方面他不加論證地說「整體來說，牟宗三的論證非常膚淺」（頁 141）。

顧氏全書的論旨可以用他在結論的一段話來說明，「本書的研究表明，五四話語的意旨遠非整理和重述過去。通過使自己信奉的價值或目的在中國現代史的起點上佔據核心地位，每一位歷史學家以過去歷史的正確解釋者的身份，為未來中國的方向確定了思想的指南。這種指南據說是符合歷史必然性的」（頁 208）。他以為無論是政治核心或核心以外的知識份子與異議份子都具有他所說的意識型態化的現象，而且沒有意識到在正統、異端爭論的同時雙方所共同具有的思想預設。

以上是顧氏書中對大陸學術界以「五四話語」為中心所做之描述、分析與評估。我認為該書最主要的貢獻是在描述與分析方面，他使讀者對大陸史學界的研究取向有很深入的了解，又對這些現象之後的構成因素有很具說服力的分析。當然顧昕並不是第一個指出傳統或清末以來一些思想模式對現代話語之影響的學者，除了作者在書中仔細討論的林毓生曾談到所謂的一元性、整體性的思考模式以外，在墨子刻教授與我個人有關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或當代臺灣的政治評論的著作中也反省到「烏托邦式的民主、科學觀念」「潮流史觀」等課題，又更進一步討論為顧氏所忽略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與人性論，以及這些觀念在中西雙方的淵源。<sup>③</sup>但顧氏所處理的大陸當代學術界是一個十分新鮮並又不太為人重視的領域，而也達到類似的結論。這充分顯示清末以來中國思想界在變化多端的表象下仍具有很強的連續性，而把這些思想預設挖掘出來並探討其與中國近代歷史變局的關係以及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正是思想史研究無容旁貸的責任。顧昕在這一本書中所展現的反省能力在此意義下是值得喝采的。

再者顧昕並沒有像杜維明與方勵之等人以為當代知識份子可以區分為兩類型，一類是開明的異議份子，他們完全了解自由、民主與科學的本質；另一類則是政治化的知識份子，他們支持現實政權。顧氏多半避免了這種對知識份子角色的理想化，按照他的分析在促成意識型態化的各種因素之中，馬克斯主義與中共的宣傳所扮演的角色不算最關鍵，更重要的是整個思想界所共同具有的一些趨勢。他的觀點與目前學術界的主張很不相同，我認為頗具說服力。其實顧氏所指出意識型態化的現象如烏托邦思想與一元化心態等不僅是存在於大陸的學術界，也存在於臺灣以及海外華人的思想界。

我認為顧氏一書的主要問題在於他對五四話語的評估之上。當然我們必須區別比較成功、合理的學術工作以及較差勁的學術工作，但是在從事這種評估工作時必須要更清楚地意識到評估標準的問題。顧氏以為學術是純粹的實然層面的描寫與解釋，並不帶價值判斷的色彩，事實上我們很難找到那麼純粹的「學術」。例如為顧氏評定為「學術著作」的 Karl Wittfogel 的《東方專制主義》（頁 24）在西方學術界早已成為過時之論，Eberhard 在四

③ 墨子刻，「從約翰彌爾民主理論看臺灣政治言論」，《當代》，期24（民國77年），頁 78-95。黃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頁 363-398；《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

十多年前即對該書史料的選擇、解釋等作過深入的檢討，<sup>④</sup>目前幾乎已經沒有人同意中國古代是基於水力工程控制的專制主義；而根據 Edward Said 的說法，西方的漢學研究都帶有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判斷。

再者就是顧氏自己也免不了他所說的「意識型態化」的現象，不自覺地說出帶有意識型態色彩的話語。例如上述他對六四的評價顯示他肯定海耶克與伯林等西方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民主與人權，他並把此一主張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結合在一起。這種主張他以為是學術，但很多人會認為何嘗不是一種意識型態。

顧氏不但相信有清楚的標準可以界定純粹的學術，而且以為這種純粹的學術只有在西方可以找到。這一種對中西文化的看法即是墨子刻先生所謂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所具有的「中國文化的殘廢感」，以為西方文化可以達到人類的理想，中國文化則是歷史的怪胎。<sup>⑤</sup>這一觀點正是顧氏在書中所批判的「整體主義」的思考方式。顧昕的這種整體主義的中西文化觀很自然地和他對歷史的其它想法聯繫在一起，所以在實然層面他較信服費正清等人以「衝擊與反應」模式來解釋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接觸，以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正是那種不具有自我矯正機制的社會」、「它未能孕育出一個現代文明，而必須有待於西方文明的衝擊，這已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頁 125）；在應然層面則較肯定以西化的方法直接引進外來的東西（尤其是海耶克、波普爾以及伯林的思想），來改正這個不具動力的社會。這些歷史性的陳述不但具有價值判斷的色彩，而且帶有顧昕自己所反對的思想預設。

由此可見好像沒有人能完全避免價值判斷，不但如此，目前不少的西方學者更認為價值判斷是學術中應該有的一部分，例如 Robert Bellah 的 *Habits of the Heart* 與 Etzioni 的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等書都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問題不是如何避免價值判斷，而是討論何種判斷合理，何種不合理。根據 Richard J. Bernstein 的說法對此問題有三種可能的答案：一是相對主義，一是客觀主義，一是詮釋論(hermeneutic approach)。我同意主張「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的相對主義很有問題，但是其它的兩種呢？顧昕對學術與意識型態兩者的區別顯示他和波普爾一樣不是一個相

④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2) .

⑤ 墨子刻，「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自覺問題」，收入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1年），頁 86、125。



對主義者（Relativist 或懷疑主義者 Skeptic），而是一個客觀主義者（Objectivist），此觀點以為當人們遇到關於「理性之定義」的辯論之時，一定會找到一個既客觀又普遍的標準來評定是非。誠如 Bernstein 所說的，客觀主義有許多的問題，而上述對顧昕之觀點的討論也證實了他的論點。

Bernstein 所謂第三個認識論的角度是 hermeneutic approach 的認識論，此一觀點不像客觀主義主張有絕對的真理，又不像相對主義以為沒有人可以說服別人，而是像一個討論會，每個人提出支持自身論點的理由，並互相溝通辯難，挖掘思想的預設與思考的盲點，由此而討論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標準來判定是非。<sup>⑥</sup>這一認識論與顧昕的立場不同，雖然 Bernstein 的看法也不一定可以完全解決認識論的難題，但不失為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意見。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樂觀地覺得自己可以完全避免學術工作中的價值判斷，並以為自己對道德、理性之標準的了解不需要作很深入的反省。我很同意顧氏在後記之中所說「學術和意識型態各自有其價值，兩者不應混淆」（頁 227），但在書中他對學術基本上是抱持了過度樂觀的態度，對於不同於他的意識型態（尤其是那些披了學術外衣的意識型態）又不太願意承認別人「自有」的價值。

我們可以以他對「當代新儒家」的看法為例來作說明。上面已經約略提及，他以為牟宗三的意見是膚淺之論，這樣的論斷反而令人覺得作者本身的膚淺。我認為顧氏對波普爾的推崇與對新儒家的貶抑顯示他將五四視為學術與思想的進步，是「啟蒙」，當然他批評其中膚淺的反傳統的主張與烏托邦式的民主、科學觀等，與其他五四歌頌者不同；但他顯然也不肯定反對五四運動的新儒家，他對新儒家「在哲學上為儒家式的道德實踐找到本體論的基礎，同時以宗教家的情懷呼喚儒家價值體系的復歸，通過發掘人類『內在的道德良知』，激發人的『道德覺悟』」（頁140）的觀點並不表同情。這樣的觀點我認為仍是片面性的，事實上已經有學者指出近代中國學術的進步是有賴於「五四」與「反五四」兩方面之間的辯難與修正，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新儒家對傳統人文精神的重建與企圖將精神價值與工具性理性結合在一起的努力是應予肯定的。<sup>⑦</sup>再者今日新儒家所抱持的對中國傳統的想法已經受到中外許多

⑥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

⑦ 持此一觀點的學者如韋政通「兩種心態，一個目標」，《中國論壇》，卷15期10（1983）頁31-42。

學者的正面評價，如狄百瑞 (T. de Bary)、墨子刻、杜維明、余英時、金耀基等，大陸學者李澤厚也將他的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與肯定傳統的看法結合在一起，而臺灣現代化過程中對儒家傳統的肯定也證明了新儒家的基本立場，這些例子多少顯示當代新儒家在中國現代思想演變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我認為該書還有一些其它的缺失。顧氏對西方思想傳統的分析主要依靠「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與「法國啟蒙運動傳統」之區別，此一區別不是那麼恰當與有意義。我同意 David Held、John Dunn、Charles Lindblom 等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將西方民主傳統分為較強的民主傳統與較弱的民主傳統，亦即是拙著所稱的「盧騷、黑格爾與馬克斯的民主傳統」與「約翰彌爾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區別。同時我也運用墨子刻先生的說法而統稱之為「轉化類型」與「調適類型」，我們認為前者主張全面性的激烈變革，以達到一完美的理想；後者則接受現實的一些不合理現象，主張局部性的緩慢改良，此外兩者在認識論、歷史觀與人性論等方面也有不同。<sup>⑧</sup>從這樣的區別來看，中國許多所謂「意識型態化」的現象與其接受西方轉化傳統的民主觀念——無論是盧騷還是馬克斯——有密切關係。換言之，上述目的論歷史觀、烏托邦主義、整體主義等雖然和中國一些傳統觀念有很深的關係，但也受到西方轉化思想中的一些預設的影響（例如盧騷「總意」的觀念與其它西方轉化傳統中的烏托邦成分），因此中國學術界「意識型態化」之現象有中西雙方面的根源，並非完全出於單方面的主觀扭曲。我認為顧昕對五四話語中受西方影響與中西交雜的部分，因為他對西方了解的局限，因而所作的分析是不够的。

從轉化與調適的區別也可以看出顧昕所描繪與批評的五四運動和當代大陸的思想趨向是近於轉化類型，而顧氏本人所持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強調「試錯」的立場則較傾向調適類型，因此本書可以說是從調適的角度對轉化思想之批判，兩者形成一個話語 (discourse)，而在這個話語之中，兩方面的看法都有應然與實然、意識型態與學術的成分。在描寫他們的看法之

<sup>⑧</sup> 有關這兩個西方民主傳統的分法在西方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之間似乎並無爭議性，如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John Dun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23；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都有十分類似的說法。至於轉化類型與調適類型的詳細討論見墨子刻先生的著作以及拙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一章。

後，我們可以辯論何者較為合理，但是我們不應簡單地說一為學術性的，一為意識型態化的。

顧氏另一個缺點是在行文的邏輯性方面，有時有重複與不够清晰之處。最好的例子是他引用席爾斯對意識型態之定義的一部分。他沒有好好地消化席爾斯所談的意識型態的九個特色，而只是用生硬的中文翻譯這些特點，結果讀者所得到的印象是重複而模糊的。這樣的現象在中國人介紹西方思想時最易犯的毛病，在這方面作者似乎是毫不例外。

最後該書有少數的錯字與註解格式的缺失希望再版時能更正。例如書中對中文的專書與期刊不加分別，均用《》的符號；此外也沒有徵引書目與引得，這對一本討論編史學的著作來說是一件頗為遺憾的事。<sup>⑩</sup>不過整體來說該書的紙張、排版與印刷的品質都很好，書中新義疊出，是任何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有興趣的讀者所不應忽略的一本佳作。

⑩ 筆者所見書中的一些缺失或錯誤如下：1. 頁30，註⑨ Vera Schwarcz 的書缺出版年代。2. 頁85，註③ Wards 一字應為 Words。3. 頁115，註②所引劉廣京與郭廷以的兩篇文章應為該書第九、十章，並非第八、九章。4. 頁156，註⑤ Benjamin I. Schwartz 的論文不應用代表專書的斜體字。5. 頁224，註④ Enemies 一字應為 Enemies。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版專刊

### (70)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

#### 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黃克武著 217頁 精350元 平300元

本書以梁啟超所撰之《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分析二十世紀初期梁氏思想的內涵與變遷，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作者認為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的思想有以下三個十分凸出，而又往往受到誤解的特點。第一，他具有相當強的幽暗意識，對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體認；第二，他對個人自由有很根本的尊重，他認為中國應創造一個富強安定的環境以回應帝國主義的入侵，而達成此羣體之目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就此而言他的思想類似於彌爾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傳統，而與盧騷、黑格爾、馬克斯的民主傳統不同，並與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異趣；第三，他的觀點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但另一方面與中國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作者更進一步以為上述梁氏的幽暗意識，他對個人自由之強調與他對傳統的愛好三者是結合在一起的，三者密切連繫而相互增強。

從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趨勢來看，梁氏代表的是溫和漸進的調適思想，而與譚嗣同、孫中山等人主張激烈變革的轉化思想有所不同。作者認為在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界正處於這樣一個思想抉擇的關頭，開始之時兩者的勢力是旗鼓相當，後來愈來愈多的人放棄了梁啟超的調適思想，而採取革命派的轉化主張。此一思想的變遷，並配合其他的社會經濟與國際環境等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與混亂。

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山本有造著。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2月10日，313頁。

## 壹、前言：

本書作者山本有造1940年生，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山本氏自1967年獲得京大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即以良好的經濟學基礎為背景，投入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的研究。1972年發表〈植民地下朝鮮・臺灣の域外收支（朝鮮篇）〉一文，該文以縝密計算作成「山本推計」，使得有關朝鮮國際貿易收支的許多問題得以解決，並成為研究殖民地國際貿易問題的典範模式，山本因而譽滿學界，本書即是集結山本氏研究殖民地數量經濟史（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sup>①</sup>二十餘年成果的作品。

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臺灣、大陸、韓國、日本學者或因本土關懷，或考量力有未逮，或基於學術興趣，均僅侷限於某地域的個別研究，但日本殖民帝國統治往往有全盤性的考量，政策中常隱含某種程度的整體「計畫」，若未立於「總體宏觀」的視角殊難真正掌握此時期歷史發展的脈動。再者，日本殖民帝國主義對於臺灣、大陸東北、韓國等不同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或採取全然相異的措施，或變更政策的輕重程度，或僅為其他殖民地成功經驗的移植，欲闡明其中意義與各殖民地特質，「區域比較」研究無疑是最重要的方法。山本氏在序言中開宗明義表示本書即是要反省日本殖民地研究偏向個別化及欠缺比較視角的缺陷，因此本書論述時既重視日本與各殖民地的整體互動關係，又強調比較各殖民地經濟上的不同表現，從而推究其原因或闡釋特質，確實為兼具「總體宏觀」與「區域比較」研究特色的作品。職是之故，筆者願就閱讀本書所見試予評介，俾供參考。

## 貳、內容介紹：

本書除序言及跋外，共分7章、21節，附表64、圖11，另有參考文獻及索引。全書內容依其性質可歸納為三部分，茲摘述要點於下。

① 作者在序言中自言其研究數量經濟史的程序為：(一)置於經濟學基礎的一定模式之上，而整理作成歷史統計。(二)觀察統計資料與確認觀察事實。(三)設定並檢證假說。

第一部分敘述殖民統治的架構，包括〈第一章日本殖民地統治思想的開展〉與〈第二章日本殖民地經濟支配的制度性基礎〉。

第一章作者將日本殖民統治政策分為三期：第一期為1919年以前，此期日本政界為臺灣「六三問題」爆發爭執，陸軍、總督府與貴族院政府勢力相結，主張賦予臺灣總督直接發布具法律效力命令之權，實施「殖民地主義」特殊統治，民黨議員則因其所專擅的立法權遭致剝奪深表不滿，主張實施「內地延長主義」，將殖民地納入國會控制，但此時因政黨力量不足遭致失敗，臺灣總督府根據「六三法」及「三一法」進行特殊統治。朝鮮方面，1910年以前日本以保護國化方式擴張勢力，有賀長雄與立作太郎等學者也對「保護國」意含熱烈討論，以深化「保護國」的國際法解釋，為兼併韓國提供學理上的準備。1910年日併朝鮮後，也如同臺灣一樣實施「殖民地主義」特殊統治，因此，此期可說是「殖民地主義」派主導殖民政策的時代。

第二期為1919-37年，本期殖民統治轉變為「文化政治」，作者認為此與「平民宰相」原敬積極推動「同化主義」殖民政策關係最大，其欲將政黨勢力伸進殖民地以壓制藩閥軍人勢力擴張。早在1895年日本據臺之初，時任臺灣事務局委員的原敬即提出「敕令主義」及「主務大臣具有總督監督權」等看法，主張將臺灣「內地化」，惜孤掌難鳴失敗。1919年新任首相的原敬又發表〈朝鮮統治私見〉，該文認為日韓言語、風俗、歷史、地理相近，朝鮮有徹底同化的可能，所以極力主張「同化主義」。但當時也有部分自由主義學者認為民族主義為頑不可化的力量，質疑批判「同化主義」主張「自治主義」，著名的學者有山本美越乃與泉哲。山本與泉哲都抨擊殖民地統治措施不當，主張應以殖民地議會及責任內閣為過渡，訓練殖民地人民自治的能力，但兩人在程度上仍有差別，例如兩人對自治程度提升後是否可邁向獨立即持不同看法，山本以母國利益為考量，斷然否定，泉哲則抱持促進殖民地人民幸福為文明國任務的理念，認為自治瓜熟蒂落時當然可以獨立。

第三期為1937-45年，本期殖民政策再劇變為極端「同化主義」的「皇民化政策」。此時軍部勢力抬頭，企圖雙管齊下強化精神、物質基礎以順遂「戰時體制」進行。在精神強化方面，朝、臺分別展開「內鮮一體」、「內臺一體」結合「皇民化」的政策；在強化物質基礎方面，朝鮮進行「大陸兵站基地」化，以「農工併進」為具體政策，臺灣則進行「南進基地」化，以「工業化」為具體措施。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皇民化政策」轉入更激進的後期，中央軍部企圖在義務、權利方面進行更徹底的同化，以加強殖

民地對戰爭奉獻。義務方面，朝臺先後修改戶籍法，實施全面徵兵制；權利方面，1945年日本宣布朝臺將可以選任眾議員，參加帝國議會，貴族院也同意給予朝臺若干名額。行政權方面亦同，「皇民化政策」前期大權仍在各總督府，後期中央軍部為全面掌控，於是不顧各總督府反對於1942年宣布撤廢拓務省，將臺朝改歸內務省直轄，並擴增首相及各省大臣對總督監督指揮之權，達到內外行政一元化，因此，山本氏認為日本的「同化主義」統治政策最後因戰爭催化而急速達到終點。

本章中作者亦曾比較臺灣、朝鮮、樺太三地殖民統治實況而歸結出一個原則，即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特殊性隨「外地性」加強遞增，而決定「外地性」強弱的因素有三：一、與內地的「鄰近度」，二、殖民統治的「成熟度」，三、陸軍勢力的「浸透度」，大致「外地性」強弱的關係為朝鮮>臺灣>樺太。

第二章作者歷述日本將殖民地納入共同關稅圈、通貨圈的過程。第一節作者將日本的殖民地關稅政策分為二類：第一種類為實施與日本本土相同關稅制度者，包括樺太（1909年完成統一）、臺灣（1911年）、南洋羣島（1922年）；第二種類因政經特殊情勢，容許有獨立關稅制度，但以特惠關稅結合，關東州屬之，該地大連港因具有日本租界自由港及中國條約港雙重身分，無法直接納入同一關稅圈，但為照顧日人利益故採取特惠關稅制度。朝鮮介於兩種類型之間，1910年日併韓國，為緩和列強干涉壓力，宣布十年內關稅制度不變，20年十年期限結束，日本實行關稅統一，但因應朝鮮經濟程度仍有特殊措置，例如：為免影響朝鮮財政收入，「移入稅」採漸廢政策，歷經四次改革至1941年才完全廢除。此外的「滿洲」則屬外國性質，日對滿貿易有大連海線與朝鮮陸線兩路，大連海線關稅減免因條約、外交因素無法實現，朝鮮陸線初雖能實施特惠關稅，但1922年華盛頓會議在列強的壓力下也不得不取消。1932年3月「滿洲」脫離中國獨立，形成新的關稅圈，日本原欲進行日滿關稅統一，但因「滿洲國」財政對關稅收入依賴甚深，加上日本視「滿洲」為獨立國，若給予特惠關稅，與日本訂有最惠國條款的國家勢必要求比照，所以始終未能將「滿洲」納入同一關稅圈。

第二節作者將日本殖民地的通貨制度分為三大類型：第一類因經濟規模甚小，為省設置特殊幣制之勞，將日圓原封不動移植，如樺太（1909年實施）、南洋羣島（1915年）；第二類為免該地經濟惡化波及日本，採取與日本本土相同「貨幣法」，但由殖民地中央銀行發行與等價通貨的政策，臺灣（1897

年適用日本貨幣法，1911年實質實施金本位）、朝鮮（1918年實施日本貨幣法）屬之；第三類以納入日圓通貨圈為目標，但因內外政經情勢阻礙無法完全貫徹者，如「滿洲」因日人金圓派與銀圓派競爭及華日國權對抗而無法統一通貨，直到1935年才達成日滿通貨「等價統合」。

第二部分為本書精華，論述殖民地經濟構造，包括〈第三章日本殖民地帝國的經濟構造〉、〈第四章殖民地朝鮮、臺灣的資本形成〉、〈第五章殖民地朝鮮臺灣的國際收支〉、〈第六章日本的殖民地投資〉。

第三章作者企圖對1930年代中葉處於全盛時期的日本帝國經濟結構作橫剖面分析，其首先依各殖民地與日本經濟的疏密關係，將帝國畫成同心圓結構，日本為其「圓心」，樺太、朝鮮、臺灣並列「第二層圓環」，關東州、南洋則為「第三層圓環」，另以「滿洲國」及在中國的租界構成「外環圓」。

接著作者概觀殖民地的經濟構造。在國內生產淨值 GDP 方面，1937年日本占整個帝國 GDP 的83%，朝鮮為11%，臺灣 3.7%，關東州 1.4%，樺太、南洋則分別僅占 0.7%及 0.2%。每人平均 GDP 方面，若以日本為指數 100，臺灣為 55-60居次，朝鮮 30-40又次之，「滿洲國」最低，僅30-35。產業構造方面，各殖民地第一級產業都占重要地位，尤其是朝鮮和「滿洲國」，第二級產業則在樺太、南洋、關東州較為重要，第三級產業關東州及「滿洲國」因有滿鐵比例較高。各級產業產值與日本相較，第一級產業日本占總額67%，殖民地合占33%，第二級產業日本占87%，而殖民地更僅合占13%，可見儘管殖民地推行工業化，成果仍然有限。

各殖民地的產業重點方面，朝鮮以米、麥、大豆生產為重心，工礦部門也有許多因得稀少資源恩惠而發展。臺灣則農工部門較為均衡，一方面發展以米糖為中心的農業，另一方面加工農林產品的輕工業也頗見成長。關東州農業以玉米、花生、蔬果為主，工業則以榨油、窯業為代表。樺太林漁業、採煤及紙漿生產較為重要。南洋羣島初以礦林業為主要產業，後砂糖業漸居重要地位。

貿易關係方面，殖民地間除滿鮮間有相當規模的貿易外，其餘各地間貿易量有限。日本與殖民地的貿易，以朝鮮最大，臺灣約僅其半，對滿貿易意外的小，此因由朝鮮轉口所致。貿易收支方面，日本對朝鮮、關東州為出超，對臺灣、樺太、南洋則是入超。日本商品輸出以輕工業產品最多，占總額61%，其中殖民地與亞洲市場各占1/4，先進國市場獨占1/2，重化學工業品輸出不多，且集中於殖民地市場。輸入方面，食品82%依賴殖民地提供，

非金屬礦物朝鮮亦足供應，但重要工業物資纖維、金屬及石油卻依賴美國甚深。綜而言之，日本由殖民地入超 8 億日圓的糧食及原料，出超 5 億日圓輕工業產品、4 億日圓重化學工業品、1 億日圓的其他產品，而有 2 億日圓的貿易盈餘。

最後作者再對此時期的糧食、原料、投資、市場問題分析。糧食問題方面，1900-10年殖民地米的對日輸出，被認為是既可解決日本糧食不足問題又可促進殖民地開發的兩利事業。20年代為建立帝國整體的自給體制，日本進一步促進殖民地農業開發，朝鮮 1920-34年實行投資 2 億餘日圓的「產米增植計畫」，臺灣也在引進蓬萊米栽植及修築嘉南大圳改善灌溉兩方面頗有進步，「滿洲」則對提供臺灣蔗作所須的豆肥，及朝鮮因減少 100萬石米糧消費「飢餓輸出」須要粟、高粱代用品，支撐帝國糧食自給圈底部有所貢獻。但20年代後期發生「昭和恐慌」，日本與殖民地的親密關係因持續性米價下跌及日本農村破產漸生矛盾，30年代後情勢又雪上加霜，雙方衝突日趨尖銳。

原料問題方面，日本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鐵飢饉」的慘痛教訓，20年代力求鐵鋼生產自給，至1930年日本鋼材幾達自給程度，但也衍生製鋼原料對外依賴加深的問題，故提升滿鮮鑄鐵的生產力成為新課題。1931年朝鮮宇垣總督首先開發電力，以廉價電力吸引內地大量資金，對提升朝鮮生產力貢獻很大。「滿洲」也於32年起進行第一期經濟建設，但此時經濟政策尚以達「滿洲」自給為目標，並非以供應內地所需為考量，34年才更張經濟政策，採取區域分工的「適地適應主義」，強制將「滿洲」資源送回日本。

投資問題方面，作者稱30年代為「殖民地投資期」，其中尤以對鮮滿的工業投資最為突出。朝鮮方面，以電化部門擴張最為迅速，投資形態也漸變為以日本民間獨占資本為主；「滿洲」方面，投資額高達11億 6 千萬日圓，超過朝鮮 4 億餘日圓，其以滿鐵投資為主，但由於「滿洲」尚處經濟開發階段，所以滿鐵只能投資於無法立即高獲利的公共部門，造成滿鐵肥大化——收益低下——資金難以籌集的窘境。

市場問題方面，此時期因重化學工業化的擴大，殖民地自身也成為日本重化工業產品傾銷的市場，導致滿鮮貿易赤字暴增，但日本卻未蒙利，反必須以擴大投資彌補；更嚴重的是日本因從第三國輸入原料、燃料急速增加，使得對第三國入超日甚，貿易失衡日趨惡化，於是產生日本國際收支對外貨依賴——外貨不足的問題，而對再生產結構帶來沉重的負擔。



第四章作者首先比較臺、日、朝 1911-38年國內支出毛額 GDE 的年平均成長率，發現臺灣以4.4%表現最好，朝鮮 3.7%居次，日本3.3%最末。若分期觀之，臺朝恰互為消長，1913-22年，臺灣為 5.3%、日本為4.7%，與之相較朝鮮的 8.6%顯得成長特別快速；不景氣的20年代情況相反，朝鮮急劇衰退為 0 ~ 2%，臺灣卻仍有 4 ~ 5%的穩定成長；30年代再度反轉，相較於臺灣的衰退為 3%強，朝鮮的 3%弱顯然有很大的進步。作者認為此與臺、朝農工生產部門消長有關，農業方面，據臺之初呈現停滯狀態，10年代轉為高度成長，其後持續發展，朝鮮則占領初期有高度成長，其後則明顯減緩。工業方面，朝鮮自始即較臺灣成長迅速，30年代與臺灣的差距更加速擴大。因此作者歸結20年代臺灣農業穩定成長及30年代朝鮮工業化飛躍進展是主導兩地經濟成長的最重要因素。

作者又計算出臺、朝每人的平均 GDE，1920年兩地比為 127日圓：103日圓，臺灣大幅領先，此後臺灣繼續成長，朝鮮卻在20年代及30年代前半呈現萎縮，直到30年代後半才反轉成長，結果 30年代結束，臺、朝每人的 GDE 比為165圓：107圓，形成「富裕臺灣」與「貧窮朝鮮」的鮮明對比。作者認為臺灣經濟能穩定成長關鍵因素在於20年代的獎勵蓬萊米栽種成功，確立以米糖為兩大支柱的農業，「米糖相剋」正代表農民可自由選擇米糖種植，經濟機會擴大，故能克服農業不景氣問題。相反的20年代朝鮮也處於農業開發期，但朝鮮的「產米增植計畫」卻未成功，30年代後半起儘管朝鮮工業化有長足進步，但以工業化帶動 GDE 增加的成果卻有限。

為何會產生臺、朝經濟發展的不同結果，作者又從臺、朝資本型態差異的角度解釋。作者指出1911-38年平均資本形成率臺灣為11.4%，朝鮮僅9.3%，1910、20年為臺灣兩個明顯的高峰，朝鮮卻在1920年跌至谷底。若將資本形成分為「建設」、「設備」兩大部門，臺灣平均每人的「建設」投資約為朝鮮四倍，「設備」投資也為朝鮮兩倍。投資主導者方面，在殖民初期臺、朝皆以官方投資為重，但稍後臺灣即轉由民間主導，朝鮮則一貫由政府扮演主角。

政府對運輸、通信、道路、港灣等基礎建設的投資，雖然朝鮮總督府較臺灣總督府更為熱心，但朝鮮偏向軍事性，臺灣則兼重經濟性，再加上朝鮮「統治教化」花費過鉅，使得朝鮮總督府無力從事經濟開發，臺灣則相反，無論何時經濟開發費用均占政府投資的40%左右。

再看長期資本輸入，至1939年止臺灣累積額約為 6.6億，朝鮮則約 33.7

億，以朝鮮經濟規模為臺灣四倍計，顯然日本對朝鮮的投資比例較臺灣為高，但日資僅占臺灣資本形成總額的20%，朝鮮卻全由日資形成，因此對提升朝鮮 GDE 效果有限。

日資對朝鮮企業的投資總額，1930年以前日本對臺、朝投資大致相等，30年代後半期的工業投資才使朝鮮的長期資本輸入大幅超越臺灣，因此作者最後探討工業化對臺灣、朝鮮資本形成的影響。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朝鮮即加快工業化的腳步，首先進行電力開發，企圖以廉價電力吸引日資進入。中日戰爭開始後，朝鮮「大陸前進基地」的地位更趨重要，日本財閥在朝鮮的活動更得進一步擴張。41年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更徹底動員朝鮮人力投入工業化行列。反觀臺灣，工業化顯然延緩許多，雖然1934、37年先後完成日月潭第一、二發電廠，但因「米糖壟斷構造」相當成功，直到30年代經濟重點仍在於米糖的增產，積極進行工業化必須等到1941年召開「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後才開始。

此外，影響臺、朝經濟發展結果差異的原因尚須考慮日本資本與民族資本在當地（地場）產業的競爭。日人移民朝鮮無論在總數或增加速度上都勝於臺灣，且從事農業及商業者比例較高，因此在當地產業的實力也較為雄厚，以米穀業為例，日本人於米穀流通、加工的過程都居於主導地位。反觀臺灣，臺人無論在米穀流通或加工的過程中都盤據強固的勢力，日資毫無介入的餘地。中小工廠的情況亦同，員工100人以上的大工廠無論臺、朝日資都占壓倒性多數，但員工99人以下的中小工廠，臺灣過半數為民族資本，而朝鮮卻仍為日資主控。

第五章第一節作者觀察1939年以前臺、朝的貿易收支概況，指出臺灣貿易收支因逐步邁向「糧食、原料基地」化發展，故呈現日趨改善，至1909年已轉為出超，合計1939年以前貿易收支共有11億日圓的盈餘；而朝鮮貿易收支卻因逐漸「商品市場」化而日益惡化，至1939年累積赤字高達25億日圓；再者，兩地貿易收支都隨日本經濟情勢而有變動，顯示日本景氣與否與殖民地貿易收支關係密切。

第二節作者算出臺、朝兩地的長期資本輸入，至1939年朝鮮的長期資本累積額為34億日圓，臺灣則為6億日圓。作者再將「經常收支」與「長期資本收支」相加，算出兩地「基礎收支」，朝鮮經常收支25億日圓赤字，加上34億日圓的長期資本，總合基礎收支為正9億日圓。臺灣經常收支正11億日圓，加上6億日圓的長期資本，合計基礎收支為正17億日圓。

第三節作者認為臺灣短期資本的流出甚鉅，因此有加以計算的必要。作者指出臺灣短期資本回流日本的途徑有二：一為國庫金出納，二為臺銀的對日貸款。至1939年為止，作者估算國庫金回流日本總數為11億日圓強，而臺銀的對日貸款為7千萬日圓。大致而言，1923年以前臺灣為債務國，29年以後則債權持續增加。

作者最後又討論臺灣的對外清算，此項機制進行的途徑有二：一、現金清算，由於日本銀行券亦得在臺流通，所以對臺灣收支總合亦具清算意義，現已無法得知歷年流通的確切數據，但知日本戰敗時臺灣約有5600萬日本銀行券。二、透過臺銀母、分行清算，因為臺銀具有臺灣中央銀行的身分，所以一切的島外資金交流都須經由臺銀，因此臺銀的清算功能十分顯著。作者文末並指出由於臺銀清算能力良好，臺日間資金能夠流通順暢，但臺銀券與日銀券比價相同，破壞了依匯價變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的功用，喪失國際收支的自然屏障，所以當戰爭壓力日重物資缺乏，日本就想以擴大發行銀行券換取臺灣、朝鮮的糧食。

第六章作者指出日本資金流向殖民地的數額小於日人在殖民地「蓄積資產」額很多，換言之，日人在臺、朝資產的增殖並非全賴日本資本的流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殖民地當地創造出來的。以朝鮮為例，1931、38、41年日本本土「流出资本」與殖民地「蓄積資產」兩者的差額各達到殖民地「蓄積資產」總額的30%、26%、45%，頗為可觀。

作者認為產生差額的因素有二：一、總督府、國策會社、日人中小商工業者以國家權勢為後盾，無償或廉價蠶食鯨吞殖民地資產，其中尤以土地收奪最鉅，以朝鮮為例，至1910年日人官民共兼併了8599町步的土地，這些土地成為日人資產的核心。二、利潤的再投資，作者以朝鮮興業和朝鮮窒素會社為例，前者每年皆能維持將利潤15-20%用於再投資，後者更是採取不發放紅利政策，將利得完全用於事業的擴張。其他公司情況亦同，以1934-36年言，投資人平均獲利率為5.16%，而紅利發放率卻不到3%，可見有相當多的紅利用於再投資。國營事業方面，作者估算1931年朝鮮總督府實質資產約有12億日圓，至1938年則已增為28億日圓，其急速增殖即是官有資產利得以「官業費」之名進行再投資的結果。

本書第三部分為計算資料，即〈第七章殖民地朝鮮、臺灣的「域外收支」〉。作者自言撰述本章的目的有二：一、關於殖民地投資的研究，向來僅根據殖民地資產蓄積（stock）額的統計資料作分析，對於須賴費心計算

方能獲得的日本資本流出（flow）額則忽而未計，因此分析並不完備。二、由於戰前日本的國際收支的統計資料事實上是包括整個「日本帝國」，以「日本本土」為範圍的統計不得其詳，成為計算戰後經濟發展很大的障礙，為將殖民地與日本本土的國際收支分離，必須對殖民地國際收支加以計算。本章中作者計算前皆先檢視所據以統計資料的內容、性質、限制及缺陷，接著說明計算的過程，最後再製成簡明扼要的統計圖表，信而有徵，為本書三至六章論述的基礎。

### 叁、內容評析：

本書內容的大要已略述如前，以下筆者就本書的研究方法、論點、立場、結構及參考資料略加評論。

綜觀本書研究方法有兩大特點：一、立於「整體宏觀」與「區域比較」的研究視角，兼顧總體與區域發展；二、經由「數量經濟史」的研究方法探討日本的殖民地論。

關於第一點，作者在緒論中自言研究論旨主要是欲對當前日本殖民地研究欠缺「總體」、「比較」角度的研究方法作深層反省，故其立論必經「整體宏觀」與「區域比較」研究，再申論帝國的總體構造與各殖民地的區域特質。筆者認為山本氏的「整體宏觀」兼有時間、空間兩個層面，例如：經由時間宏觀，山本氏在第一章指出1919、37、41年為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重要轉捩點，氏認為1919年以前「殖民地主義」派得勢，之後由「內地延長主義」派主導，至37年中日戰爭爆發，再由軍部接手進行極端同化主義的「皇民化政策」，而該政策又以41年底太平洋戰爭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又如：經由空間宏觀，山本氏在第三章畫出日本帝國的經濟同心圓構造，氏將日本置諸殖民帝國經濟構造的「圓心」，樺太、臺灣、朝鮮並列「第二層圓環」，關東州、南洋羣島畫歸「第三層圓環」，而「滿洲國」及在中國的租界則為「外環圓」。

為明瞭各殖民地的發展程度，山本氏總於「整體宏觀」之後強調「區域比較」研究，例如：第一章作者比較各殖民地「外地性」強弱，以闡釋其與各地殖民政策特殊性的關係；第三章比較臺、朝國內生產淨值NDP、每人平均NDP及第一、二、三級產業所占比例等；第四章又比較臺、朝國內支出毛額GDE、每人平均GDE、資本形成率、「建設」與「設備」部門投

資比及日本資本與民族資本在當地產業上的競爭力等；第五章再比較臺、朝的貿易、金銀、服務三種收支、長期資本、基礎收支等；第六章則比較臺、朝兩地的日本資本流向殖民地與殖民地蓄積資本增殖相背發展的程度。

經由比較研究山本氏也常能類化、概化殖民地的發展趨勢，例如：第一章作者將決定「外地性」強弱的因素歸納為三個指標：一、與內地的「鄰近度」，二、殖民統治的「成熟度」，三、陸軍勢力的「浸透度」，而獲致「外地性」強弱關係為朝鮮>臺灣>樺太的結論。第二章中氏又將關稅制度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相同關稅制度型，包括樺太、南洋羣島、臺灣；二、獨立但採特惠關稅制度型，包括關東州、「滿洲國」；三、中介型，朝鮮屬之。通貨制度方面，作者也將之分為三類：一、與內地相同通貨型，包括樺太、南洋羣島；二、等價統合通貨型，包含臺灣、朝鮮；三、為不完全日圓通貨型，關東州、「滿洲國」屬之。

山本氏雖由「整體宏觀」、「區域比較」研究中獲得前人所未見的研究成果，然筆者以為山本氏在時空上的「宏觀」、「比較」尚有未盡之處。空間方面，山本氏全書以朝鮮、臺灣為主要研究地域，並未能涵蓋日本所有殖民地，而且每章所研究的空間也不相同，第一章以朝鮮、臺灣為主，稍略涉及樺太；第二、三章對朝鮮、臺灣、樺太、南洋羣島、關東州、「滿洲國」均有論及，最為完備；第四、六、七章僅論朝鮮、臺灣；第五章一、二節以朝鮮、臺灣為主，第三節只論臺灣。筆者認為若能統一每章所論的研究地域，將有助於獲得更完整的結論。時間方面亦同，本書第一章為涵蓋 1895-1945 年的全面性研究，第二章時間斷限約為 1895-1937 年，第三章又僅分析 1930 年代中葉，而第四、五、六、七章則將討論重心置於 1910-39 年，未討論戰爭末期。首先，與研究空間一樣，作者若能將各章的研究時間延伸為涵蓋整個殖民帝國時期，將可便利比較研究，而獲致更完密周延的理論。其次，第三章只對 30 年代中葉日本殖民帝國經濟結構作靜態分析，實不足概括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全貌，而且殖民帝國各時期的經濟結構未必與 30 年代中葉相同，各殖民地每個時期產生的經濟問題亦有不相同。再者，當日本僅有一個與擁有多個殖民地的整體經濟計畫也有很大差異，對待僅為勢力範圍與已成爲殖民地更有不同考量，若能全面探討殖民地各時期經濟構造、問題的轉變應更具意義。

而第四、五、六、七章只討論 1910-39 年更欠周延，因為 1939 年以後正是殖民地經濟發展質量變化最劇烈的時期，許多經濟情勢在此時完全改觀，

並決定性地塑造出戰後的經濟面貌。例如：1939年以後，山本氏第六章所指稱的日本流出資本與殖民地蓄積資產相背發展的現象即有很大轉變，筆者根據黃通等合著《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中的資料，發現此時臺灣資本回流日本的數額因負擔戰費及購買日本公債急速增加，僅 1940-44年短短五年間即高達12億 7 千餘萬日圓，<sup>②</sup> 將近1927-39年日本資本流入臺灣總數 7 億 1 千 8 萬餘日圓的 1.8倍，此勢必急劇縮小日本流出資本與殖民地蓄積額的差距，可見日本將資產蓄積於殖民地，未盡數搜括回流本土的情況在戰爭末期實已有重大轉變。韓國方面，山本氏僅討論1910年以後的經濟發展歷程，然韓國經濟殖民化從1876年實已開始，山本氏對 1876-1910年韓國的經濟發展未予探討似也美中不足。

再者，山本氏雖能立於「總體宏觀」的角度，對殖民地經濟史研究多所發現，但作者對此「總體」的最重要部分：日本，其經濟脈動與各殖民地發展關係的探討卻嫌疏略。而且山本氏的「總體宏觀」將殖民地視為帝國的外地邊緣區，過分強調殖民地經濟只是日本邊陲化、從屬化的發展，忽略殖民地經濟結構亦有自主性的一面，例如：在臺灣民族資本能掌握米穀的加工、流通過程，即是因日人無法從根瓦解臺灣經濟社會結構中原有的地主制及農村金融系統；<sup>③</sup> 又如，臺灣對外貿易雖為殖民政府強制轉向與日本結合，但因臺灣文化、經濟與大陸接近，所以日本始終未能將「陸臺貿易」完全斷絕，1895-1945年陸臺貿易仍佔臺灣對外貿易總額的7.4%，臺商在兩岸貿易中的表現甚至較以前更為積極與活潑。<sup>④</sup>

而對於經由「整體宏觀」與「區域比較」研究所得的「外地性」強弱關係殖民統治政策的論點，筆者也略有補充意見。如前所述，山本氏認為決定殖民地「外地性」強弱的因素有三：一、與內地的「鄰近度」，二、殖民統治的「成熟度」，三、陸軍勢力的「滲透度」，而「外地性」強弱又影響殖民地發展的特殊性，此種論點推於統治思想（朝鮮>臺灣>樺太）、關稅制度（「滿洲國」、關東州>朝鮮>臺灣、南洋羣島、樺太）、通貨制度（「滿洲國」、關東州>朝鮮、臺灣>南洋羣島、樺太）大致都能符合，但對南

② 黃通、張宗漢、李昌權合編，《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臺北，聯經，民國76年，初版），頁84-89。

③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1991年，初版），頁182-207。

④ 詳見林滿紅於「第一屆臺灣經驗研討會」宣讀的〈日據時期的臺商與兩岸經貿關係——臺灣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1年4月）。

洋羣島的印證力稍嫌不足，南洋羣島距日本內地最遠，統治「成熟度」也未必較臺灣、朝鮮、關東州成熟，只有陸軍勢力「滲透度」較小領先，照山本的論點「外地性」應甚為強烈，然其關稅、通貨制度卻與日本內地相同，其決定因素似乎是因經濟規模不大，為省設置特殊制度勞費之故，因此若於三大因素外加上「便利性」因素，論證可能較為完善。再者，「戰爭壓力」因素也應併入考慮，例如：韓國因距大陸戰場最近，戰爭壓力最大，所以韓國在兵役義務、權利完全同化也較臺灣為速，況且作者亦自言「同化主義」最後因戰爭壓力而急速達到終點，因此宜再添加「戰爭壓力」因素。另外，根據筆者對臺灣、朝鮮、關東州商工會議所制度的研究，殖民政府同意實施與日本本土相同的商（業）工會議所制度以朝鮮最早，關東州次之，臺灣則在請願三十餘年後始獲同意設置，而且商工會議所的會規，臺灣也是控制最嚴格，特殊性最大，<sup>⑤</sup>因此影響「外地性」強弱的因素，能否全面適用尚待斟酌商榷。而第三章所畫的帝國經濟同心圓構造（外地性依作者之意為在中國的日本租借、「滿洲國」>關東州、南洋羣島>朝鮮、臺灣、樺太）將南洋羣島置於與關東州同級，似與作者自身論點互相矛盾，因為南洋羣島無論通貨政策或關稅制度都與樺太列為同級，採取與日本本土相同制度，但在山本氏的帝國經濟同心圓構造中卻非如此，似有欠妥當。儘管如此，作者對原則化影響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因素，提供刺激性的思考空間，仍功不可沒。

關於本書研究方法的第二大特點：經由「數量經濟史」的研究方法探討殖民地論方面，個人認為山本氏累二十餘年之功，以縝密計算建立殖民地國際收支研究典範，這是本書最值得稱道之處。筆者以為山本氏至少在臺、朝國內生產淨值NDP、平均每人NDP、國內支出毛額GDE、每人平均GDE、資本形成率、日資對「建設」與「設備」投資、貿易、金銀、服務三項經常收支、長期資本、基礎收支、日本流向殖民地的資本、殖民地蓄積資產、貿易外收支等數量經濟史研究上有不可抹滅的開拓之功與勞績。

在本書的論點方面，筆者對於山本氏指出戰爭催化「同化政策」及工業化發展、臺灣「米糖壟斷構造」成功妨礙工業化進展、臺灣民族資本實力較

<sup>⑤</sup> 拙作〈日據時期臺灣地方性商工團體之研究（1895-1945）——從商工會、商工會議所到商工經濟會〉（學期報告，未刊稿）。

強等論點<sup>⑥</sup>深表佩服，但筆者欲釐清本書兩處論述。第一處是山本有造認為1920年代為朝鮮、臺灣農業發展的急速開發期（頁57），對臺灣確為如此，不管經濟大恐慌之前或以後臺灣農業皆未受影響，一貫地蓬勃發展，但筆者以為更精確地說，應對朝鮮部分修正，因為根據本書頁138的論述及頁155的統計資料，朝鮮農業20年代後半起已呈衰退之勢。再者，山本氏認為朝鮮從1920年代後半起未能像臺灣一樣克服農業不景氣問題，所以導致農業成長急速衰退（頁155），可是由頁136「日本米供給表」中，我們可以發現20年代後半臺、朝米穀輸日同樣處於停滯階段，30年代前半朝鮮米穀輸日增加幅度雖不如臺灣，但成長也極為快速，若依本書論述將農業重心完全置於米業、農業發展即等於米業興衰的情況看來，實不至於造成1923-32年臺灣第一級產業成長高達18.66%，而朝鮮僅2.51%，及1928-37年臺灣成長20.04%，朝鮮卻僅8.85%的景況，因此，山本強調朝鮮米業因無法克服不景氣導致農業所得銳減的論點似有補充之餘地。

對本書論述有待釐清的第二點是：關於「米糖相剋」問題，山本氏認為「米糖相剋」代表臺灣總督府與農民的經濟選擇增加（頁137），筆者以為此易誤導讀者認為是臺灣總督府刻意要造成如此情勢的。根據柯志明的研究實則不然，此係臺灣總督府無法解決日本資本家米、糖派間的利益衝突，而給與臺灣米業民族資本家喘息之機所致，對臺灣總督府而言實為迫不得已，所以當1939年之後臺灣總督府控制力加強，即積極遏止「米糖相剋」這種所謂經濟機會擴大，<sup>⑦</sup>這也是必須澄清的。

本書的觀點方面，山本氏的立場尚稱客觀，不僅書中對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經常使用「侵略」字眼批評，且由客觀史實中暗示對殖民地的經濟侵略，也可能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沉重負擔（頁176）。但必須指出的是：山本對影響殖民地經濟發展絕對重要的「差別待遇」因素過份忽視，整體觀察殖民地經濟發展似為一片繁榮景象，但對殖民地民族資本的發展是否也真是如此？答案絕非如此肯定，數十年的殖民統治經濟整體也許有頗大進展，但大

<sup>⑥</sup> 筆者與蔡明達合撰，〈紅太陽底下的「發展」——評介 Carter J. Eckert 著《Offspring of Empire》並比較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和朝鮮的工業發展〉，《歷史學報》第二十一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民國82年6月），亦有類似看法。

<sup>⑦</sup> 參見柯志明，〈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日據臺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1925-1942）〉，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臺北，東大，民國82年10月，初版），頁167-235。



部分利得都爲日人所獨享，民族資本因「差別待遇」抑制，日益從屬化與矮化是不爭的事實。本書作者山本有造爲日本人，研究觀點不免忽略探討「差別待遇」因素，欲真正瞭解殖民地時期民族資本發展的實況，唯有靠臺灣、中國大陸、韓國學者自身努力。

結構方面，由於本書係集結六篇論文及新作一章而成，且論著時間先後相差近20年，雖經作者以類相從、歸納整理、修訂潤色，結構仍略嫌鬆散，內容時有重複。再者，第一章探討殖民統治政策的轉變過程，偏向政治性，與本書經濟史性質稍有不稱，應將研究重心置於各殖民地經濟政策轉變的歷程較爲恰當，因此，筆者建議改爲論述決定殖民地經濟發展方向的各種經濟會議，例如：臺灣1930年的「臨時產業調查會」、35年的「熱帶產業調查會」、41年的「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及朝鮮1921、36、38年召開的三次類似經濟會議。此外，第一章第二節論述有賀長雄與立作太郎的「保護國論爭」也稍嫌突兀，因爲山本所論偏向外交性，未與第一章殖民政策的題旨緊密相扣，致文章銜接不够流暢。

本書的參考資料方面，筆者根據書末的參考文獻粗略統計，總計參考戰前私家著述專著29種、論文報告21種，政府研究調查資料專著15種、論文報告1種，私人經濟機構研究調查資料專著13種、論文報告1種，合計80種；戰後學者論述專著48種、論文報告103種、史料匯編6種，政府出版品史料重編19種、研究專著2種，私人經濟機構出版品史料重編4種、研究專著1種，計183種，合計戰前、戰後參考資料共263種，因此本書參考資料之豐富頗值得稱述，再者，戰前的參考資料中不乏臺灣難得一睹之珍貴史料。可惜全書以日文資料爲主，只引用韓文資料2種、英文資料7種，至於中文資料則全未引用，資料取材似有畸重畸輕之憾。

此外，本書尚有一處手民之誤，頁150第2段第5行指示讀者參考表3-17下段，經查並無表3-17，應爲表3-16之誤。

綜而言之，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整體宏觀」與「區域比較」研究，爲臺灣、大陸東北、韓國殖民地時期經濟發展史研究開拓更寬闊的視野，參考史料之宏富也頗值得稱述，而本書在數量經濟史上的成績更彌足珍貴，縱有一二瑕疵，應無礙本書列入經濟史上乘著作之林，值得一讀。

□臺灣師大史研所碩士班·趙祐志□

Horst Gründer, **Welteroberung und Christentum. Ein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Gütersloh: Gerd Mohn, 1992. 751 pp.

Those interested in German colonial imperialism in general and German Christian mission until World War I in particular have profited from publications by Dr. Horst Gründer,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Münster University, Germany. The work under review, "World conquest and Christianity", although in parts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vious research, expands the scope of his enquiry both in depth and width. It is therefore rightfully subtitled, "A handbook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Age"

The author shows that ever since Antiquity, once Christianity had been adopted by the Roman empire, and more obviously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their sword-supported "defence of the Church" and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religious and secular concerns were closely interlocked in the Christian world. His main narrative, however, expounds the political role and socio-cultural func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and relig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expansionism/colonialism 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n his introduction, Dr. Gründer outlines the problematique he is concerned with. Ever since the Renaissance, he reminds his readers, the category of one coherent Earth-unit determined our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Still, the "globaliz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was generated from European/Western premises. Though expansionism was by no means limited to Europe, no other civilization succeeded as thoroughly in dominating world history as did the Christian Occident.

The great "discoveries" of 1492/98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conquest which was to mould and overpow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a (now apparently irreversible) development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he Earth". The term denotes, first of

all, the gradual spread of European political rule over, and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a major portion o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However, linked in a complex way with these power-and profit-oriented interests (apart from indigence and curiosity) was the high-handed conviction of Europeans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own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latter understoo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former. Carrying their institutions, economic, socio-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concepts to the “unenlightened heathens”, not a few Europeans firmly believed in the religious meritoriousness of their miss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was indeed due to the religious factor that European expansionism gained its unique impetus: “The Christian ‘monotheistic’ God suffered no other gods besides himself. It may well be that in this absolutist claim, in this still unbroken sense of ‘legality’, lay the roots of the radicalism of Western cultural imperialism [...]. In any case, [the claim,] ‘It is God’s will’ remained effective until the very end of European expansionism,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mediate or intermediate.” (p. 16) He does not explain why the other two major religions who acknowledged the same “jealous” God had either never engaged in any missionary activities to speak of (Judaism), or had failed to be as “successful” as the Christians in spite of aggressive expansionism (Islam).

Still, Gnder certainly has a valid point when he states that the cultural-religious penetration of the areas colonized by Europe has until now rarely been included in surveys of what he calls “motivation analysis” of Western colonialist imperialism. Economic (profit-oriented) interests used to be stressed at the expense of all other motives. This was obviously true for economic and socioeconomic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enin etc). But even historicopolitical models, though taking missionaryism into account, explained its role descriptively rather than analytically. Natio-, socio-, and politic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imperialism did include mission activities; unfortunately, their critique of the phenomenon, more often than not, verged on polemics.

It is the “periphery-oriented” theory of imperialism that served the author as a useful tool in placing the “mission factor” properly with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European nations and those of their “periphery”. However, he caution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precludes narrow adherence to any single theoretical approach.

The bulk of the book is taken up by the narrative of the European conquests since the 15th century. It makes fascinating reading, the more so since Gründer abstains from personal commentaries while meticulously documenting each and any of his statements. The stories, which take us virtually around the world, do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 author organizes his material into two major parts,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chronology of his enquiry, viz. Part I: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zation”; Part II: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and [Christian] mission”. Consequently, he has to take his readers to the same non-European areas more than once. This procedure makes immense sense in a study that attempts to rewrite European colonial-imperialist history under the missionary aspect. Since mission activities were almost inseparately linked to more secular motives, they naturally reflected the politicocultural changes their base of departure underwent during four centuries.

Being concerned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 will naturally find Gründer’s chapters on East Asia most interesting. In Part I, this refers to chapters VII (“The ‘God destroyed’ --Japan’s Christian century”, pp. 210-257) and VIII (“The great misunderstanding--Jesuit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17th century”, pp. 258-274); in Part II, to chapter XIII (“‘Opium and missionaries’ --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387-428) and perhaps to chapter XII (“‘Gesta Dei per Francos’ -- French imperialism in Vietnam”, pp.368-386). For instance, the reader is confronted with intriguing details on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by Japan and China to colonial-imperialist and, in their wake, mission attempts at penetration.

However, the book is so composed that all the other 13 chapters ought to be studied as well, even if they deal with European activities in both Americas, the Near East, India, South-East Asia, Oceania, and Africa. The author tells, after all, a coherent tale about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European expansionism,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Christian missionaryism within this process. Anyone inquiring into this field will benefit from the wealth of material here unfolded.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Ursula Ballin□

**戰間期東南アジアの經濟摩擦——日本南進とアジア・歐米**，杉山伸也，  
イアン・ブラウン (Ian G. Brown) 編，日本，同文館出版株式會社，平成二年八月 (1990年8月)。

本書係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在日本下田 (伊豆附近) 所召開之「戰間期東南亞國際經濟摩擦」的國際研討會之研究成果。編者強調此書的取向是希望能脫離各別的「地域研究」而變成「地域間研究」。探討此時期的東南亞、日本、歐美間之關係，須先有的背景認識為：(一)華盛頓公約裁減軍備，曾使國際間一度形勢安定；(二)第一次大戰後，以紐約和倫敦為中心的世界經濟並不穩固，亟須經濟重新調整。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更使情況不安。恐慌後，經濟的集團化、政治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形成壁壘，為其犖犖大者。(三)此時期之東南亞，除泰國外，全為英 (新加坡、馬來亞、緬甸)、荷 (東印度尼西亞)、美 (菲律賓)、法 (越南) 之殖民地。因此可說是歐、美列強政治支配的縮圖。(四)日本的南進，使得上述關係產生流動變化。特別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經濟的大舉進入，更使此地區糾紛多起。

本書由兩大部分所構成，即「日本的進入東南亞」及「東南亞和歐美 (對日本) 的對應情況」；共有九篇論文，茲簡述如下：

第一章「戰間期日本經濟南進的思想背景」，作者為清水元。清水氏指出日本的南進政策正式成立於一九三六年的廣田弘毅內閣。推查此一政策的擬定，與當時日本綿紡織業在東南亞與英、荷貿易摩擦有關。此一經濟的變化是一九三〇年代國際貿易因經濟恐慌而急驟萎縮，但日本卻藉降低匯率之

手法，大量輸出產品，而激起歐、美指責。在對歐美的指責方面，日本提出了「世界正義觀」、「基於正義的國際秩序」和「公正的分配」等訴求。代表者有：有高橋龜吉的「人道、道義貿易理論」，強調東南亞貧困，日本之廉價輸出有助提升當地生活品質。另外則是室伏高信提出「南進論」，此書乃是在國聯制裁滿洲事變和東南亞經濟摩擦背景下寫出的，強調反西歐帝國主義，而要以日本的南進來解放當地市場，實現自由與平等，此種「道義的帝國主義」，可說是日本南進之思想基調。

第二章作者為袁彩菱，題目為「日本在馬來亞的橡膠及鐵礦投資」。作者指出日本在馬來亞的橡膠與鐵礦投資發展過程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進攻馬來亞背後的「膨脹主義」關係密切。其時馬來亞的殖民母國為英國，因此日、英的衝突綿亙此一時期。在橡膠投資方面，日本在馬來亞經營膠園的畝數，由一九〇七年九七英畝，變化成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的一萬零三百七十五英畝。此一擴大與日本汽車輪胎業興盛有關。面對日本的佔有率增加，英國於一九一七年頒布膠園禁止買賣法案，規定除英國人、馬來人、英國聯邦和馬來聯邦人，及當地居住七年以上而且有意定居者，方能買賣五〇英畝以上之膠園。此使日本大為激動，雖經抗議後，此法案於一九一九年取消，然而美國勢力進入，日本勢力衰退，至第二次大戰前膠園畝數已不及一九一一年之半數。作者指出，膠園與日本南進政策的制定關係密切。因為：(一)膠園問題促使日本注意南洋經濟，為帝國擴張主義奠基；(二)三井、大倉、藤田、古河、久原等大企業，均在馬來亞經營膠園，因此形成對日本政府的壓力；(三)支援膠園乃日本資本之殖民地化之一環。例如負責對南洋膠園融資的臺灣銀行，於一九一二年在新加坡設立分行；此年亦為日本橡膠栽培協會設立之時，可見兩者之密切。

至於鐵礦投資方面，日本在馬來西的鐵礦投資與其鋼鐵業發展密不可分。最早在馬來投資者為石原廣一郎。此人於一九一七年膠園禁止法令後，向臺灣銀行申請融資一百萬圓，經過探勘，在馬來亞尋得純度65%的赤鐵礦。其時由於：(一)英美歐洲資本著重於錫、金礦開採；(二)日本探礦可增加稅收，因此受英國人的歡迎。石原的探礦，其背後目的係滿足日本鋼鐵業的原料供應。原來，日本鋼鐵業之百分之九〇鐵砂來自中國與馬來亞。石原產業成立後，一九二八年即佔日本所需百分之四十；到了一九三七年，則佔有率達一半。可見其與日本鋼鐵業之發展關係，至為密切。作者文末指出，日人至南洋除對經濟方面有影響外，亦使膨脹主義得以興起。例如飯塚茂在一九

二九年著有「南洋の雄姿」，列舉日本對殖民地的獎勵，並對各國政情、經濟、風俗詳加介紹。此書重印九次，影響力極大，又例如石原廣一郎，本身即是「南進論」的主要鼓吹者，他於一九四〇年出版「轉換日本の針路」，高唱「海外發展的積極政策」。如此，馬來亞的開發、土地購置，本身實已染有濃厚的日本膨脹主義色彩。

第三章「日本綿紡製品的輸出與貿易摩擦」，杉山伸也著。日本的綿紡織業是進口替代的典型例子。自一八八〇年代後半葉，日本棉紡勃興。甲午戰後，日本綿紡正式輸出。時至第一次大戰已在中國東北驅逐英、美綿布，確立粗布、綿紡市場的優勢地位。然而日本的輸出，無疑使執世界纖維市場牛耳的歐美綿紡織業感到壓力，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綿紡製品在印度、東南亞的輸出增加，便引起與英國、荷蘭之間的深刻衝突。

作者指出，日本綿紡織製品進入東南亞的原因，乃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製品自東南亞市場退出的契機所達成的。戰後，中國棉紡發展起來，致使日本喪失中國市場，須東南亞市場更亟，此可由一九二六年南洋貿易會議上之紡織聯合會之提議證明。至於日本綿紡織發展的內在條件，作者認為早期是利用工資低、工時長而獲得的。然而此種情形，於一九一九年為國際勞動機構所指責，因而制定保護法，生產量銳減百分之十五，為應付此一情況，日本改用機械，大量提高生產力，奠定以後競爭之實力。

作者指出日本當時之綿紡出口地區，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年以中國、關東州、印度、荷屬東印度尼西亞為主，合計佔百分八十的輸出。一九三〇年代，滿洲雖大量使用日本綿織品，然而中國排日風潮大盛，因此市場轉向東南亞，與其地之交易比率躍升為百分之四十三，尤其是荷蘭的東印度尼西亞最為重要。至於日本增加市場佔有率的手段，作者認為除匯率調降外，技術更新亦是重要因素。

由於日本以低價格為販賣之武器，因此一九三〇年，英國制定印度國內之保護政策；而印度本身亦於一九三三年廢止自一九〇四年以來的日印通商條約。英、印指責日本利用(一)低工資；(二)不周全的勞動保護條件；(三)低匯率政策，調低成本，因此是「不公平的交易」。為此，一九三四年日印、日英會商解決之道。由於英主張協議須對全球綿製品市場作分配，日本則堅持除英殖民地外，不及於他國；英國指責日本產品以低價為手段，而日本則稱此乃「合理化」產品的自然成果，因而談判破裂。英因此在各殖民地設立交易分配政策，限制日本綿產品。

至於日本與荷蘭方面，荷蘭東印度是日綿重要市場。荷蘭向持自由貿易傳統，故初不加限制。如此，日綿大舉奪取荷蘭綿製品市場，使荷商的佔有率由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七十，降至三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十四。此一情況自使荷商要求對日商設定分配制定。一九三四年六月，日荷針對兩國商業展開會談，議題包括(一)輸入的限制；(二)日本須增加印尼糖的購買；(三)海運問題。兩方由於歧見過鉅，未能達成協議。因此自該年七月，荷蘭下令針對日本的五、六種產品輸入限制。此種情況至一九三六年以後，方有轉機。一方面，日本在海運方面讓步，與荷蘭締結海運協定；另一方面，日本同意購買印尼糖，以換得綿紡織輸入佔有比率（為一九三三年的輸入總額之五分之二）。最後作者總結，日本綿紡織業在此時期有二點特色：(一)綿織品代替綿紗輸出；(二)印度、荷屬東印度代替中國市場。在印度及荷屬東印度遭到限制後，日本轉而向埃及、美國、澳洲等國尋求市場。

第四章為小風秀雅之「日本荷蘭海運摩擦與日本荷蘭的會商」。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與東南亞各殖民母國的經濟摩擦，有許多是與航運摩擦有關的。尤其是日本與荷蘭之間，海運問題殊為重要，因此海運交涉實為貿易交涉之前提，後者之解決有賴於前者；二者實為一體之兩面。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對於航運界影響至鉅。一九三〇年世界海運大幅下降，以繫留船率做指標，一九三一～三三年繫船率超出百分之十。三二年～三三年達到百分之二十。然而日本之繫船率此時最高只有百分之五·二（一九三三年），最低百分之〇·五（一九三五年）。日本之所以能免於凋弊，據英國的觀察是：(一)調低匯率；(二)船員薪資低；(三)政府保護；(四)財閥支持。姑且不論正確與否，世界船運之保護主義抬頭，乃不爭之事實。因此日本之海運問題實成為世界的問題。

為解決世界航運界的凋弊，一九三三年倫敦國際經濟會議召開對於全球海運的問題討論。討論的第二項即是保護政策的問題，如此歐美與日本在太平洋及東洋海域的衝突，正式浮上檯面。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日本對荷蘭東印度的貿易由入超結構轉為出超結構。貿易的活絡，自然使日本在此地的配船量激增。由本章表四可見，日本的海運於此時已與荷蘭、英國相抗衡。基本上，日本與荷蘭之海運衝突有二條路線：(一)瓜哇——中國——日本（荷蘭海運 J D J L）；(二)荷蘭東印度各島間航路（K P M 控制）。在第一條航路上，日本之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南洋郵船與 J C J L 曾於一九二一年結成海運同盟，一直維持至一



九三一年，因石原產業的加入航業競爭才瓦解。海運同盟初原有意吸納石原產業，共定配額，為石原所拒。雖然由於日荷自由海運競爭，促使船運品質提高，兩國經濟界均表歡迎。然而，此種競爭對於J C J L卻形成嚴重打擊。因此一九三二年，經過協商，確定石原、J C J L、南洋、大阪、日本郵船之比率為百分之三十二，三十一，一八·五，一八·五，未定；以停止競爭。此協定後因荷蘭政府感於貿易摩擦激烈，有意保護J C J L，因此宣告動搖。至於蘭印各島之間的航運，原由K P M社（荷蘭）獨佔，然而南洋郵船加入競爭，亦使K P M收益大減。

一九三三年六月的荷蘭對日貨限令下達後，對兩線之日本商船影響頗大。日荷曾於一九三四年為此海運摩擦協商，然因J C J L要求佔海運百分之三十一，而宣告破裂。會談破裂致使日本運貨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十；因此日本決定以「事實上妥協政策」來處理，將石原、南洋、大阪、日本郵船合併成立「南洋海運株式會社」，並且制定航路管制法，約束石原航運的競爭行動。此一妥協獲得荷蘭的同意，因此達成日本荷蘭第二次海運交涉的成立，依本章表四~六所示，日本、荷蘭達成四比六的分配制度。

第五章「日本海軍與南進政策的展開」，波多野澄雄著。日本海軍的南進，萌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一九三〇年代方才正式形成。基本上，日本海軍的發展，時在日俄戰爭之後。原來日本的統帥部假想敵有二「露西第一、米國第二」，打敗俄國，確立南滿、韓國勢力之後，「海主陸從」論調大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英、日同盟，英方要求日本配合澳洲、紐西蘭，從海上包圍遠東的德國艦艇，使得日本海軍有機會南進，藉排德而擴張其對南洋諸島的佔領，一九一五年的「南洋協會」成立，即其表徵。一九三〇年代，由於滿洲事變，日本在國際益形孤立。日本軍部除再三申明滿洲為日本不可或缺的生命線外，對於英美的「現狀打破勢力」思想抬頭。一九三五年海軍成立「對南洋方策研究委員會」，以臺灣為基地，大舉調查南洋諸島。此一南進的轉急，作者認為是與海軍部注意到艦艇燃料（石油）之取得有關。因此，一九三六年的三菱石油、協和礦業出資調查荷屬東印度羣島、爪哇等地，實有其背景。

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不僅封鎖中國沿海，並且於一九三九年佔領海南島，以便截斷國民政府的對外接觸。海南島的佔領對於日本南進而論，意義非凡。一九三八年九月，亦即佔領海南島前半年，臺灣總督府已作成「海南島處理方針」，將東沙、西沙、新南羣島作為帝國南方政策的

前進基地。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後，英、法、荷集焦於歐洲，日本覬覦南洋更甚，惟考慮美國而遲未動手。文末作者分析一九四〇年冬，日本御前會議下令對南洋用武的原因有三：(一)美國對日本禁止鐵屑、石油，使得日本為取得足夠原料，而展開對荷蘭東印度羣島的攻擊；(二)德、俄的開戰對日本南進亦是一大重點。由於不須駐兵北防俄國，因此軍方釀成強硬的武力南進；(三)一九四〇年秋，日本對中國的桐工作（爭取汪精衛，成立政府瓦解重慶方面）失敗。「長期大持久戰化」態勢明瞭。為支持長期作戰，取得南洋豐富資源，成為解決中日戰爭的最後手段，蓋「東亞自給圈」和大東亞新秩序的建立實是無法分割。

第六章「日本經濟的進出與新加坡的英國資本」，作者（Ian G. Brown）。一九三〇年日本經濟對外膨脹，在新加坡方面產生二項變化：(一)日本產品數量、種類增加。綿紡織品、人造纖維、鋅板、水泥、腳踏車、火柴、鑄鐵管、陶瓷器等均十分明顯地漸入日人手上；(二)新加坡至美國的航運，亦為日本加入競爭而與英國衝突。此一航線係以生橡膠的最大消費國——美國為目的地。因此，英國特針對此作出回應。然而作者指出，此一限制日本貿易競爭，並非沒有反對聲浪。首先，紡織的輸入分配方面。一九三三年英國新加坡海峽殖民總督指出：其時馬來亞——歐洲之貿易，近年來日本已驅逐中國、印度，成為主要對手。因此，基於對北英格蘭綿紡織之保護，有意設立輸入分配制度。然而，此一提案，商人卻有不同看法：(一)認為日本根本不能打入馬來半島，原因是當地之貨物流通網為中國人及印度人掌握，足以形成強固的防護；(二)日本廉價商品進入東南亞，對當地亞洲人有好處。因此，總督在考慮可能對貧民利益有損的情況下，並未達成分配限制的設立。一九三四年二月，日、英商對交涉談判破裂，新加坡實行綿製品與人造纖維之分配制定。此一制度的設立，商人有反對的聲浪。蓋(一)新加坡為轉口港，限制分配實與自由貿易傳統有違，因此呼籲政府應以新加坡為中心考量；(二)限制廉價的日貨而保障英國產品，無異於拿亞洲農民及低收入戶的血汗來救濟蘭開夏綿紡織業。然而，民間代表雖在議會投反對票，但是殖民總督以分配制係國會通過之法案，而議會中英資本者又佔多數，因此仍通過實施。此案通過三年半後，在新加坡的纖維市場中，英國的佔有率遂告回復。

至於生橡膠的運輸方面。一九三四年末，由於日本加入對美之糖的運送，使新加坡至美國的海運競爭激烈。此一徵兆早已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三井物產船舶部及國際汽船會社申請加入新加坡至美國航運獲允時，即可見端

倪。由於日本為與英及美既存公司競爭，所以致力提供低價之服務，因此深受紐約方面歡迎。因此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月，日本即佔運輸的百分之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四月間，升為百分之十五；到了三五年六月攀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八月～九月為百分之三十四。如此自然對長期支配橡膠貿易之英商所不滿。因此一九三五年九月，新加坡及美國海運同盟代表至日，要求日本在生橡膠運輸僅能佔百分之十四，為日本所拒。直到一九三五年交涉方再起，日方同意每月五、五〇〇噸，佔生橡膠貿易的百分之二十六之配額。然而，此一締約實無成效，因此時新加坡反日風潮已起，日本船運之載貨已由百分之五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

第七章「日本的經濟進出與荷蘭的對應——兼論印度尼西亞的殖民地經濟政策」，Anne Booth 著。一九〇一年，荷蘭女王曾對荷領東印度羣島的惡化之生活狀態發表演說。此演說內容正可看出印尼的經濟結構，在當時實是典型的熱帶殖民地經濟。其輸出以原料類之砂糖、菸草、錫為主，而且主要操控於大規模農場手上，計約佔百分之八十。資金和輸入的佔有率，初由荷蘭控制，後則加入英國。一九二九年時期，由於德國、美國的資本輸入，方才打破此一局面。三〇年代則是日本抬頭，與德、美、英匹敵。作者分析日本之進入東印度羣島，而且在五年間佔有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迅速增加百分之三十之原因：(一)日本之技術落後北美及西歐，因此致力於綿織品、家庭用品、腳踏車生產。而此時正值印尼經濟由大農場轉為小農業輸出（一八九八年，小農地生產僅佔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二九年，則有三分之一出自小農地生產），因此民生用品之購買增強；(二)此時臺灣糖業的發展，使日本不須再進口印尼之糖，自然使出超、入超結構，形成逆轉。

由於荷蘭一向採取與殖民地雙邊自由貿易的原則，因此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改變，連帶去影響荷蘭。荷蘭當局認為日本產品的輸入增大，無疑是動搖東南亞與歐洲宗主國的長期政治戰略之一部分。因此自一九三四年初即與美國合力推動「荷屬印度尼西亞經濟六年計畫」，將農工業兩部門的輸出入和國內生產市場，置於政府的規制計畫之下。此一計畫雖曾有效地排除日本在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勢力，然在一九四二年日本軍的進攻下，便突然劃上休止符。

第八章「日美在菲律賓的通商摩擦」，Milagros C. Guerrero 著。菲日的貿易早期最非興盛，於一八九八年～一九一一年之期間，日本居非之外貿第七～九位，遠遜於美、英、法、德、西班牙、中國、荷蘭。然而第一次

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利用英、美勢力退卻之下，加強彼此往來，因此成爲輸入第二位、輸出第三位。此後，日本便自與菲貿易賺取大量利潤，從一九一七年的二〇〇萬披索以迄於一九三〇年的一、七〇〇萬披索。

除貿易額增加外，日本在非航運上亦顯露頭角。在一九〇三年，從事菲律賓之貿易船舶率是美國三七艘、英國一三三艘、日本九艘。然至一九一八年則美增加爲二五七艘、英二九〇艘、日本三七五艘，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圍繞著纖維市場的爭奪，日與美便產生了摩擦。

在一九〇九年時，菲律賓進口一、四〇〇萬披索之綿紡織品，大抵爲西歐製品，美國僅佔百分之十八。此後，由於美菲確立自由貿易，纖維市場全由美國掌握。此情況於一九二九年～三一年爲日本推翻。到了三二年，美佔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躍至百分之五十六。此一狀況，作者認爲：(一)與此時東南亞華僑停止排斥日貨有關；(二)此時美國正執行全國產業復興計畫。然時至一九三五年，美方已無法容忍日本的攘奪市場，打算以課稅、限制項目對付。經磋商，達成所謂的「紳士協定」，日本每年可輸出四、五〇〇萬平方碼爲限。而後，兩國每半年均可有二、六〇〇萬平方碼的配額，雙方對此均表滿意。

第九章爲「泰國之民族主義與對日關係的展開」，作者 Benjamin A. Batson。作者指出戰間期的東南亞，實是各國列強競爭的縮圖，唯一例外者爲泰國。泰國此一「獨立國」處於列強環視，實無法在政治、經濟上擺脫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因此一九二〇年代民族主義勃興，希望收回英、法的租借地；在經濟脫離中國及西歐的支配。當時泰國民族主義者對日本均有好感。作者分析此乃：(一)兩國政治上同屬君主立憲；(二)日本明治維新一舉成功（日清戰爭），不僅擊敗中國，而且廢除不平等條約。此時泰國重要的物產柚木、錫、橡膠掌握在英國及中國人手中，政治上又受英法顧問干涉。此一背景下，自然使泰國欲以日本爲效法對象。至於日本原即對南洋關心，加上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亞細亞主義」盛行，例如樽井藤吉即曾於一八九三年著作，主張日本、朝鮮成立「大東國」，結合中國，促使南洋、東南亞各國反抗「白人的宰制」。因此，對於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泰國，自然格外注意。

戰間期可說是泰國與日本接觸密切之時。此乃因爲日本：(一)自一九一四年以後，藉參戰攘奪歐美在東南亞市場，使得戰後，泰國成爲「日英兩國角逐的市場」；(二)世界經濟大恐慌時期，日本以廉價、低匯率，在三一年～三

三年將英國經濟優越地位推翻。在東南亞中，泰國為日本輸出之最大者，佔總日本對東南亞輸出的百分之十四；(三)中日戰爭爆發，日本須大量食品與原料，泰國成爲其主要供應國。

作者另外亦指出一九三二年泰國的體制變化（民族主義者取得政權）爲日本與泰國關係之分水嶺。泰國於此年之國聯制裁日本決議中，獨持反對態度，令日本十分感激。此一表現，終使日本、泰國基於反西歐、反中國上形成陣線，而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締結泰日同盟。

除以上九章正文之外，編者於總結語時，提及：(一)戰間期的法領中南半島（越南、寮國、高棉），在此回討論中未有專論，有待學界再補充；(二)本論文另有英文譯本，S. Sugiyama and M. C. Guerreo (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1919-194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然若干內容有異。

□臺灣師大史研究所博士班·王文裕□

---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TAIWAN CASE**, by Chien-Kuo Pang,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 318 pp.

### 壹、內容簡介

本書是龐建國（Chien-kuo Pang）先生就其 1987 年在美國 Brown 大學所完成之博士論文加以修飾而成的。龐氏就讀於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時（1978-79），因選修李國鼎「現代經濟發展與經濟政策」課程，對國民政府與臺灣經濟發展關係深感興趣，並對：何以國民政府在臺施政得以成功，在中國大陸卻失敗？又何以其它落後國家無法像臺灣一樣，締造高經濟成長？兩個問題深思不得其解。畢業後，前往美國 Brown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繼續進修，在 Peter Evans、Rueschemeyer 及 Ying-mao Kau 等人鼓勵與指導下，以「政府」爲探討重心，試圖解決上述兩個問題，並對國民黨領導下臺灣經濟成就，做一全面性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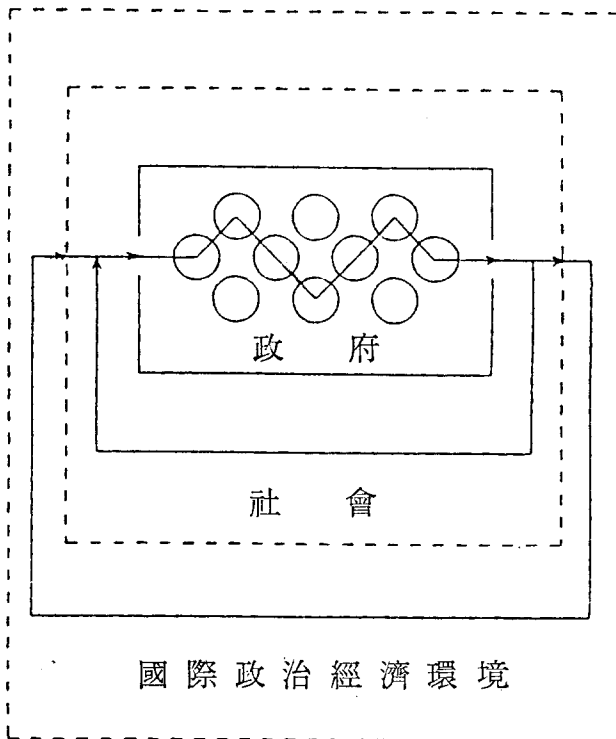
本文時間斷限於 1949-1986 年，內容則以國民政府在臺灣的經濟建設爲主，偏重於各階段經濟決策者、經濟部門、政策制定三者的關係，與經濟發展現況之敘述。其正文共包含八章：

### 第一章、理論與方法

學者在論及經濟發展時，多從經濟觀點或社會、政治經濟觀點著手。然而，Peter Evans 及 Rueschemeyer 則認為，在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時（尤其是公共政策之制定與社會變遷），必須將政府置於分析的中心位置。受此影響，本書作者即以政府為討論中心（state-centric approach），欲探究國民政府如何成功地提升臺灣經濟？

就方法論而言，本書採用歷史架構法，參考前人研究成果，運用政府檔案文獻、會議記錄、報紙、雜誌等資料，配合實地訪談相關人士，以強調歷史背景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以期對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型態之交互作用與國內外情勢，做一整體性、概論性的敘述分析。

#### 思想架構



本書中另製作了許多圖表與統計表格，藉以增進對經濟部門組織之了解，並對臺灣經濟發展的真相與研究，提出合理的解釋。下列圖表中之系統

模式，正可用以解說本書的思想架構以及臺灣經濟政策制定之過程。圖表中顯示，政府是由許多不同的部門與個人所組成，其外圍則被公民社會與國際政治經濟系統所環繞；而政府部門的組織特性與成員、社會階層結構、國際經濟或政治局勢，與其相互間的作用，皆對經濟政策制定構成影響。

## 第二章、臺灣經濟的鳥瞰

臺灣是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擁有持續性高成長、財富分配平均及穩定的經濟發展。但若無法兼顧其不利的發展條件，則其經濟發展將可能被視為是一個奇蹟。天然資源的不足、光復初期的嚴重通貨膨脹，與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政治的越感孤立，加以地狹、人口總數無法構成一個自足市場，是不利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因素；而繼承日本在臺的建設遺產，結合美援供應、傳統儒家思想，以及易於控制的小規模經貿，則皆為有利的發展因素。日本治臺期間，因應日本帝國主義的需要，在臺灣進行了多項改革與建設，使農產品生產大幅增加、工業從無到有，並從日本輸入大量資金與技術。這種種的建設與改變，對於日後臺灣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的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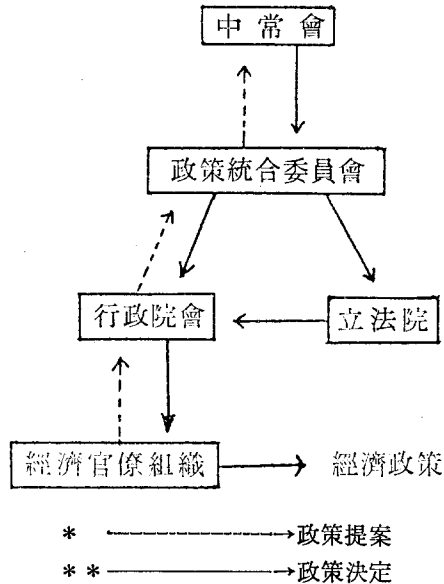
1945-1949年，陳儀奉派來臺，視臺民為殖民地人民，未給予應有之地位。受國共戰爭影響，國民政府非但無暇顧及臺灣，且須仰賴臺灣物資以抵抗中共，所以伴隨陳儀政權而來的是政治的不穩定與經濟的混亂。至於社會上則因二二八事件，引發臺籍人士對國民政府及外省人的憎惡，成為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及1949年國民政府抵臺後，中央採行總統制及五院制。國民黨在各級政府組織中握有支配權，並控制了兩個民選團體：立法院及監察院，形成了一黨獨大、黨國政治的官僚體制。但卻因國民政府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使政府與民間失去聯繫，造成臺灣社會中缺乏有力的社會領導階層。

以國民黨的治臺能力而言，因種種特殊歷史環境與政治地緣的結合，使其能擁有優勢的自主性與治臺能力，並積極主動地干預臺灣經濟轉型：(1)許多有經驗的專家及行政人員隨著國民黨抵臺，使能有效接掌日人所遺留下來的職缺。(2)透過政府機關人事的調整，使政府組織能更具凝聚力。(3)繼承日人的遺產，如良好的官僚體系、及一些有力的既有成就：歲收系統、銀行組織、大型企業及農會等等，有助於政治經濟之穩定。(4)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不僅可協助經濟發展，並補財政之不足。(5)採行孫文學說能符合需求，並富包容性與彈性。

## 第三章、經濟決策制定之組織結構

本章就經濟官僚組織、行政院、國民黨中常會、立法院等經濟決策部門

加以探討。各經濟決策制定之組織結構如下：



經濟官僚組織是指負責提出經濟決策的組織。主要可分為四大類：(1)針對美援而成立的機構：如美援運用委員會。(2)針對外匯與外貿而成立的機構：如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3)針對農業發展而成立的機構：如農復會。(4)針對經濟計畫而成立的機構：如經濟安定委員會、經濟設計委員會。廣義上，還包含了經濟部、財政部以及中央銀行。其本身擁有豐富財力，由一羣有技術的官員所組成，具有高度凝聚力與效率。但常因外在環境與內部人事改變，而有所變更，如美援斷絕、外匯存底過多、中美斷交與官員權限的重疊等。

行政院是全國最高行政機構，經濟官僚組織的決策須先送行政院會議審議。因行政院會議為跨部會會議，經濟官僚組織官員在會議中也有一些席次，且議案在送審前多已贏得許多挑戰者的贊同，所以行政院會議很少退回或大肆修改提案。

國民黨中常會反映出高層政治領導的特性，是經濟政策制定中最高的裁決機構。中常委之中，臺籍人士一直僅佔少數，後因國民黨領導者的臺灣化考量，才使臺籍委員人數大增，至1984年已達12人。以中常委背景而言，1969年以前，多來自政治及軍事界，經濟官員並未進入權力核心；及至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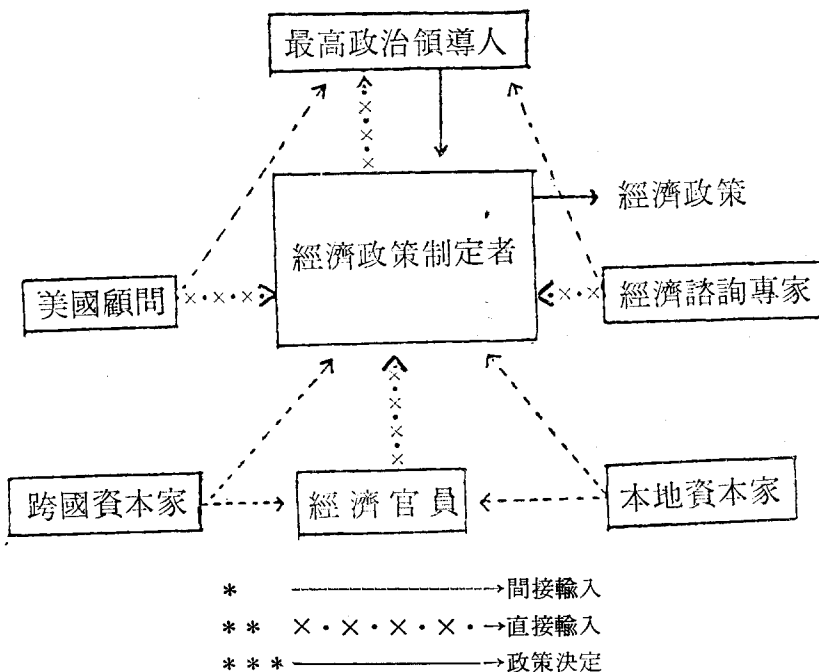


年，以經濟見長的中常委仍居少數。雖然中常委擁有裁決經濟政策與國家發展政策的權力，但實際上他們多處於被動型態，因為：(1)其權力高度集中於黨主席手中；(2)中常會的決定型態是解決問題與說服，為尊重專家，提案多依原案通過；(3)為了與國民政府、國民黨分工，中常會多只統合政策而非制定政策。

立法院是全國最高的立法機構。行政院有義務到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而立法院亦有權否決、更改行政院所提出之任何政策。因國共戰爭，立法院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未能改選，日後雖有增選，國民黨在立法院中仍佔多數。國民黨內部的政策調停委員會，負責協調立法院與行政院，運用立法院中的國民黨黨員力量，協助行政院提報之法案能順利通過。結果，立法院成為國民黨的立法院，而與社會脫節。

第四章、政策制定者與負責經濟政策制定之組織

本章就全國最高政治領導人、經濟政策制定者、經濟官員、經濟諮詢專家、美國顧問與本地資本家、跨國資本家等方面，以介紹影響經濟政策制定之組織。



全國最高政治領導人是臺灣經濟政策的真正決策者，而臺灣也一直有著強而有力的領導者。領導階層在經濟發展、人才選用上十分費心；他們對專家頗為尊重，並能穩固地控制政府機關，以獲得人民的支持。在領導階層的支持下，才使得一羣優秀的經濟政策制定者能發揮所能，協助臺灣經濟成功的轉型。

蔣介石的在臺政策，可由其光復大陸的意識型態與建設臺灣的實用主義兩者之間的矛盾中看出。Clough 指出：蔣介石初抵臺灣，堅持以光復大陸為要務；但時間一久，則傾向於建設臺灣的實用主義。實際上，蔣介石相當重視經濟發展，於1950年即指示：「我們要從臺灣開始，不僅只是自救，也要建設臺灣。」

1949年，陳誠奉派擔任臺灣省省主席，處理中央在臺事務。日後續任行政院院長、副總統。陳誠在臺負責經濟處理，是財經決策的重要人物。臺灣著名的土地改革，即是由他所主持的。

蔣經國則塑造了親民的政治領導風格。他對臺灣的貢獻，一如蔣介石與陳誠，主要是在政治上，但他同時也將經濟發展列為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

然而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才是政策的實際操控者。他們多受過高等教育，具有世界觀與自由意識；且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沒有自己的企業，故於政策制定中較能超然客觀。其中甚且有一些是具有工程與科學歷而沒有經濟背景的，有關工程建設，多從做中學，而非遵循一特定之經濟理論，因此能採行較實際與有彈性的態度。

尹仲容是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初期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劃者，強調須在現實環境中徹底有效的解決問題。他特別推崇日本的明治維新，認為：(1)經濟改革初期，政府應居於領導地位。(2)必須成立工商團體，政府與社會應予支持，使發揮改革功用。(3)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資金與人力應來自於國內，政府應加以規劃。(4)經濟發展應與文化、社會、政治相結合。(5)人民應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

李國鼎則是六〇年代中期臺灣經濟的主持者，他的座右銘是「從實際經驗中學習，並使用科學方法」。他認為：(1)發展中國家，政府應居於領導地位。(2)經濟發展應結合文化、政治改革。(3)臺灣的傳統社會與文化不利於企業發展。(4)政府與社會中，因有許多人對私人企業不懷好感，造成政府與地方資本案難以合作。(5)政府的官僚組織、不合時宜的法令、落後的思想與不團結的弊病，皆有礙經濟發展。相較於尹氏，尹氏具有理論長才，而李氏則

多從經驗與現實中學習；且尹氏較激進，曾以國家力量干預經濟發展，及至五〇年代後期才漸趨於自由經濟，而李氏則傾向於一步一步地依循較有利的因素。

嚴家淦來臺後歷任臺灣財政廳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總統等職。1949年主持新臺幣改制，穩固臺灣金融免受大陸崩潰的經濟所波及。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支持政策與解決問題，是一位傑出的仲裁者。

經濟決策者在國家經濟轉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多能受到政治最高領導人的支持。然而若沒有一個有能力的經濟官員幕僚，則仍無法制定出適當的經濟政策。經濟官員們雖無權決定應採行何種政策以發展經濟，但他們對經濟與工業發展的專門知識、對經濟現況所做的研究報告、對解決經濟問題所提出的建議，皆對經濟決策者產生相當的影響力。又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多與政治緊密結合，知識分子貢獻他們的智慧；政府則尊重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國民政府即一直受到許多非官方經濟學者的影響，其中尤以中研院的學者最具影響力。對經濟官員而言，經濟發展決策的制定，並非只是經濟本身的問題，也要考慮到政治、社會、文化的現狀；而非官方的經濟顧問則較易傾向於理想、忽略現實的因素。

美國派遣來臺的美援顧問團，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決策也具有強烈且持續性的影響力。美國顧問認為國民政府應以發展臺灣經濟為第一要務，並主張扶持私有企業以取代公營企業。在美國強大壓力下，國民政府乃將水泥、製紙、林業、礦業四個國營企業賣予私人，並改善私人的投資環境。相較於臺灣經濟顧問學者，美國顧問僅能在財政政策上發揮其影響力，但他們大都很熱心，並能對臺灣經濟政策提供正確的指導，只是在執上無法切合實際需求。

光復初期，日本技術與資金中斷，又逢戰爭破壞、通貨膨脹，加以日據時期臺灣人少有能掌控企業的，因此本地資本案力量很薄弱。這種情況直至國民政府抵臺才漸有轉機。首先，大批上海資金與企業家隨國民政府來臺，發展紡織與食品業，並在政府的鼓勵與保護下，運用美援進口棉花與小麥，擴展其企業規模。而本地資本案也在美援下，發展紡織業或塑膠業，並組織合股企業。因土地改革而獲得四家國營企業股份的地主，亦將其事業擴及工業部門之中；加上六〇年代又有跨國電子業在臺發展，更使臺灣私人中小企業急劇發展。至1985年，私人企業的生產額已達總生產量的83.9%了，成為

臺灣經濟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

外資對臺灣經濟也有很重要的影響。戰後臺灣因政局不穩、市場太小、國民政府的保護政策、以及美國經濟援助，以致孤立於世界市場之外，阻礙了外資的流入。後因國民政府積極拓展外銷吸引外資，六〇年代後期，才有大量的外資流入。臺灣的外資主要來自於美國、日本與華僑。美國資本家反對以低價生產方式進軍美國市場；而日本資本家則以投資臺灣作為調整國內結構的方式，所製造生產的產品，除回銷日本外，並在臺灣與世界各地銷售。至於華僑，他們認為臺灣較僑居地更適於投資，認同臺灣的國民政府政權，其貢獻與臺灣本地資本家相似。

#### 第五章、一九五〇後期以前經濟政策之制定與執行

五〇年代，臺灣在地緣政治、經濟上皆依附於美國。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為抵制蘇俄及其盟國，乃發展以美元為主的新經濟體制，派遣顧問團支助被破壞的國家，並以美軍派駐世界各地。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臺政策轉為積極，提供國民政府經濟、軍事、技術上的援助，長達20餘年之久。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國宣稱將給予國民政府經濟、軍事的援助；但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則受到限制，使國民政府得以大力發展經濟建設。中美雙方對大陸的觀念有很大的差距，美國希望國民政府固守臺灣，不要有任何軍事計畫，其它方面，國民政府則仍可有相當的自主性與選擇性。

國民政府抵臺後，一則繼承了日人在臺的遺產，一則又因許多傑出人士隨國民政府抵臺，加以美國第七艦隊的協防，才使得國民政府能在臺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實體。

但為應付突增的外來人口，極需發展農業以增產糧食，於是農復會乃應運而生。五〇年代，農復會致力於農業科技的研究以及美援的重新分配使用，對臺灣的農業發展貢獻良多。其組織上由中、美雙方共同負責，是一個自主的團體，既可脫離中央管制，亦可排除官員的壓力以行使職權；而在美援的支持下，更可做一長遠的規劃與執行。其影響力主要表現於強化水利會、農會、漁會之中，對臺灣農業與農村發展最大的貢獻即在於重組農業組織。國民政府接受農復會建議，於1949年開始改革農業組織：(1)將農會與合作社合併。(2)將農會成員單一化，僅接納現職農民。(3)由農會中選出農業代表。

日據時期，因土地利用偏重於殖民政府的經濟利益，使農民無法分享合

理的利潤。國民政府基於政治考量，於 1949-1953 年在臺灣推行系列土地改革，藉以收攏農民，以防中共滲透。主要包含降低農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項，使擁有土地的自耕農人數增加、大地主減少，也使得土地能更有效利用、農產大量增加，對於國民政府在臺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的安定具有實質的貢獻。論及臺灣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與下列因素有關：(1)較之於大陸時期的國民政府，臺灣的國民政府在政治軍事上，皆較以往更佔優勢，使政治與社會能緊密結合。(2)美國的經援，使國民政府有充裕的資金可資利用。(3)受到二二八事件與中共整肅地主的影響，使地主順從地接受政府政策。

農業政策中的田賦徵實與肥料換穀制，以制定貨幣／稻米與肥料／稻米的價格比率方式，強制徵收稻米，使國民政府掌控了農地稻米的生產。五、六〇年代，國民政府獨佔臺灣化學肥料，將 70%-80% 的肥料用於稻米的施肥上，藉以換取米穀；並將肥料價格訂得較其他鄰近國家平均高出 50%-200%，致使政府獲利良多。稻米的徵收主要是基於政治經濟考量，稻米可以出售賺取外匯；並可在政府的控制下，刻意壓低價格，以維持軍需、低薪支付公務人員。

工業化的過程中，五〇年代初期，臺灣的工業重心是輕工業，產品則以內銷的消費品為主。在進口結構方面，國民政府為保護剛起步的工業，採行嚴格的進口管制與保護關稅政策，以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並減少進口。至於私人企業也在美援的協助下漸漸地發展起來了。五〇年代後期，美國政府主張以美援促進受援國私人企業、對外貿易與投資的新政策，乃積極扶持臺灣私人企業，加速推動建立由本地資本與外國資本合作的私營部門。

#### 第六章、臺灣經濟發展的轉捩點：1958-61

自政府遷臺後，為兼顧財政穩固與經濟發展，一向採行複式匯率及與嚴格進口限制的外匯貿易政策。迨經濟情勢漸漸好轉後，則以改採單一匯率與自由貿易為目標。1958-61 年，國民政府採行多項政策以促進經濟轉型，主要包含下列三項：(1)外匯與外貿的改進。(2)十九點財經措施的推動。(3)獎勵投資條例的公布。

1958年以後的改進外匯貿易方案中，主要的特點是在匯率調整。1958年 4 月，美元與新臺幣的匯率約為 25:1，1958 年變為 36:1，1960 年 7 月則為 40:1，使之更接近新臺幣本身真正的價格。進而，經由放寬進口限制，使臺灣的外貿重心由進口管制轉變為出口貿易發展，帶動市場經濟自由化、拓展

## 外貿市場。

美援政策的改變與國民政府對臺灣經濟發展日益重視的態度，是促使十九點經濟改革措施提出的主要因素。臺灣在美援長期支持下，經濟日益繁榮，美國政府於是要求臺灣提出說明，何時能終止美援供應，以達經濟的自給自足？對國民政府而言，為達經濟發展目標，並積極爭取美援支持，經濟改革計畫的提出乃是必要的。1958年成立的行政院改革委員會，即針對當前臺灣行政作通盤研究與建議，以供採擇改進。歷經半年的研討，提出了改革稅制增加所得稅、建立銀行信用制度發行股票、要求政府各部門採購國產品、獎勵儲蓄、提升保險事業……等多項建議，已具備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的雛形。又1959年美國安全總署臺灣分署署長郝樂遜（Haraldson），就臺灣應儘速發展經濟，減低對外依賴，力求自給自足，提出八項建議，包括減少軍需、穩定物價、統一匯率、外匯管理自由化、進口貿易自由化、將公營企業出售給私人、鼓勵私人投資、開辦投資銀行業務等等，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即是就此八項建議加以擴充而成的。

六〇年代，為發展面向出口工業，乃於1960年9月頒布獎勵投資條例，以鼓勵外商投資，並振興投資意願低落的民間資本。此條例在租稅上，給予來臺投資工業的外商大幅優惠待遇，欲藉此吸引跨國資本流入臺灣。其在帶動外商投資與本地企業合作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用，並對臺灣工業化有促進之功，使臺灣經濟得以邁入國際整合的時代。

### 第七章、一九六〇年初期以後經濟政策之制定與執行

本章就六〇、七〇年代之國際情勢、臺灣國內環境及農業、工業、會計、財經、外貿政策加以探討，並論及國民政府對臺灣經濟之影響。

六〇年代，國際間合作強化、國際資源相互交流、石油增產提供廉價的能源，加上戰後高科技新產品投入經濟市場中，對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經濟發展十分有利。又美日各國有意將密集勞力工業出移至開發中國家及落後國家，而臺灣正可提供低廉的勞力、電力及便利的運輸網。如此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使臺灣在六〇～七〇的十年間，輕工業及對外貿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七〇年代以後的國際局勢，漸對臺灣不利。初期的石油危機，使臺灣經濟倍受打擊；而對美的貿易順差，更使美國採行保護政策，要求臺灣開放市場、降低進口稅以促使新臺幣升值。外交上，則因退出聯合國，越顯孤立。此時，中共又推展四個現代化，鼓勵外資、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並向臺灣市場大量傾銷商品，對臺灣構成嚴重的威脅。於是，

臺灣的主政者即欲藉經濟的發展來重振國民的自信心。

五〇年代，臺灣農業蓬勃發展；至六〇年代，則因提倡工業，使農村人口大量外移，農村建設為之停頓。有學者認為這是工業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現象，有學者則主張採行改革措施以補救之。國民政府傾向於保護農業，為拯救農村經濟，即使在經濟危機時，蔣經國仍堅持對農業進行一系列改革。到了李登輝總統時，更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但，臺灣農業卻面臨了美國要求開放農產市場的挑戰。

六〇年代的臺灣工業，以勞力密集工業為特色。當時，經濟決策者尹仲容主張發展重工業；而李國鼎則傾向於勞力密集工業。後因尹氏早逝，乃由李氏策劃推行勞力密集工業。於是，1966年在高雄設立加工出口區，以聯結高雄港，並免予徵收關稅及貨物稅。為鼓勵外商投資，政府也做了一些的努力，外商投資主要可分為三大階段：(1)1952-1959：由於政治未安定，投資很有限。(2)1960-1966：因政治經濟環境較穩定，加上美援改善投資環境、高雄加工出口區又於此期正式對外開放，所以外資增加。(3)1967以後：臺灣投資環境改善，加上美日國內工資提高，使外資大量流入。

然而，以出口為導向、勞力密集為特色的臺灣工業，很快的即因工資高漲，而無法與落後國家相抗衡。國民政府乃於1970年代初期，走向資本累積及高科技的工業，以因應困境。1973年11月推行的十大建設，即是最佳的例證。繼之而起的1979年的十二項建設、1985年的十四項建設，更說明了國民政府發展高科技的意圖。八〇年代，政府為致力於高科技的發展，乃於1980年成立基礎科學園區，以鼓勵高科技公司設立。

就財經政策而言，1960年以後，臺灣的經濟政策仍以「安定中求成長」、「成長中求安定」為追求目標。五、六〇年代，間接稅 (indirect tax) 佔總稅收的 80% 左右，因此，稅務改革乃成為六〇年代重要的課題。1967年在臺北舉行臺灣經濟發展會議，之後由蔣介石邀請留美學界劉大中與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央行總裁等政府官員共同商議稅務改革，以防止逃漏稅。共提出了25項改革建議與19項研究報告，並修訂進口稅、公布新稅率。

臺灣的金融系統，主要是由銀行與非銀行（信用合作社、保險公司等）兩財政組織所構成。政府幾乎控制所有銀行，非銀行組織雖開放給民間，但民間所佔的資本額很有限，到1980年僅佔全部金融系統資本額的 4.63%。誠如 Wade 所言，由國家來控制銀行，可以降低金融的不穩定性，並支持國家的建設，但也易流於無效率、僵硬無變化。於是要求開放私人自組銀行的

聲浪乃隨之而起。但政府唯恐銀行落入少數私人手中，遲遲不肯採取開放措施。

外貿方面，六〇年代的臺灣經濟以發展外貿為導向，在國際經濟繁榮的配合下，外貿持續擴大，促使經濟成長迅速。1960年，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FETCC）重新評估進口貨品，實施進口管制，對於當時的外貿構成不利影響。所幸，因臺灣外匯過多，加上執行未徹底，所以，六〇年代真正被管制進口的貨品很有限。整體而言，國民政府對臺灣的關稅政策有很高的自主權。及至八〇年代，美國為減少貿易逆差，要求臺灣保護智慧財產權、調整匯率，但無法收到成效，於是進一步要求臺灣降低關稅、開放農產品與服務業市場，並施以貿易制裁。因此，國民政府以調降關稅稅率來舒緩美國的壓力。

七〇年代，國民政府的政權受到了嚴重挑戰。因中共政權的威脅、國際外交的孤立、以及其他外商與落後地區國家貿易的挑戰，使得臺灣的外貿發展倍受打擊。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為拯救國內經濟危機，主張將臺灣經濟轉型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工業，並扶持本地資本案、輔助農業發展。

八〇年代的經濟發展，則又面臨著國內消費者、環保組織與工人團體制衡的挑戰。由私人所組成的消基會於1980年11月成立；環保團體則反對核四廠興建、並對美國杜邦公司設廠計畫提出抗議。至於勞資問題，早於七〇年代即已出現，到了八〇年代更顯熾熱化。初期，政府對勞工團體多採取壓抑政策，因此勞基法草案遲至1982年才送交立法院審核。然而勞基法的制定，卻象徵了勞工對本身權益的覺醒。在國內一片自覺聲中，政治上也出現了反對團體，如民進黨，對國民黨形成了衝擊。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採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因應新的局勢，於是在1987年宣布解嚴。

#### 第八章、結論

綜觀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是根植於日據時期既有之建設，在美援、有利的國際經濟時機、儒家思想、與國民政府有效的經濟政策等因素配合下所產生的成果。尤其是國民政府的有效經濟政策，使面臨天然資源匱乏、市場太小、人口密度太高、沉重國防負擔、外交孤立與早期嚴重通貨膨脹的臺灣，能締造傲人的經濟成就。回顧國民政府在臺的經濟改革，主要包含了土地改革、重組農會、發展勞力密集工業（1960後期以前）、制定紡織企業計畫、出口貿易政策、十大建設、獎勵投資、改革稅制、保護關稅、開



放市場與19項財經改革計畫……等等，不勝枚舉。

究竟臺灣能為落後國家提供一個什麼樣的學習經驗呢？臺灣有許多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地緣與文化特色是其他國家所無法仿效的。但是臺灣的經驗卻告訴我們，落後國家要提升經濟發展，強而有力且具有自主性的政府是必備的要件。此外，在臺灣的經驗中，落後國家仍有許多可以引為借鏡的有：(1)成立經濟高級部會組織，以協助經濟轉型並強化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2)成立類似臺灣農復會組織，以發展農業促進工業化。(3)要控制外匯匯率與奢侈品之進口，並發展對外貿易、平衡國內收支。(4)鼓勵鄉村工業與發展較優勢工業，將有助於經濟的均衡發展。(5)不可過度依賴外國。

最後作者仍再次地強調：在任何國家的發展歷史中，政府都扮演著重要且具決定性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

## 貳、內容評論

1967年，由臺大經濟系與行政官員合作完成的《臺灣經濟發展》出版，之後，日本學界又於1968年出版了《臺灣經濟綜合研究》，兩書同以二次大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作為分析的焦點，掀起了戰後臺灣經濟研究的浪潮<sup>①</sup>。使得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學者潛心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課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即是眾說紛紜的分期依據。綜觀學界所採行理論與方法，可將其歸類為三種：(1)政策分期(2)速度分期(3)綜合分期。所謂政策分期，主要是依據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變化來劃分的。速度分期是依戰後不同年份臺灣經濟的不同發展速度來劃分的。至於綜合分析則是在有關各項經濟指標和經濟發展各有關因素基礎上進行分期的。<sup>②</sup>本書因著重敘述國民政府與臺灣經濟政策制定、經濟發展的關係，開始即以兩章的篇幅來介紹負責經濟決策的組織與個人；繼而以轉折點進行綜合分期，對1949-1986年臺灣的經濟政策制定、執行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加以分析。由於1958-1961是臺灣經濟由進口替代工業轉型為以出口為導向的轉捩時期，於是以此為界限，將臺灣經濟發展分為(1)1958年以前(2)1958-1961年(3)1961年以後等三個階段。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就早為國際間所肯定，而政府也希望能以臺灣經驗做為開發中國家學習的模式。學者們極力要為臺灣經濟發展何以能成功提

<sup>①</sup>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1-2。

<sup>②</sup> 段承璞等：《臺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105-107。

出合理的解釋，因此，研究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即是探究促使臺灣經濟發展成功的因素。有人強調策略性因素，有人強調儒家思想因素，也有人強調人力資本的運用，而本書作者則將臺灣的經濟成就，主要歸功於國民政府的領導。<sup>③</sup>

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研究學者都一致肯定了美援對臺灣經濟、國防與社會的貢獻。經援使臺灣有充足的資金可以利用，又可彌補外匯的不足、協助經濟發展，而軍援則制衡了中共的軍事侵略，有助於國民政府在臺政權的穩固與社會安定的維繫。六〇年代，美日各國將密集勞力工業移轉到落後國家，強化了臺灣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對臺灣經濟長足進展亦有實質的助益。其中較受爭議的則是國民政府對臺灣經濟的貢獻與其自主性及政策作用的問題。本書作者認為，即使是在美國對臺灣深具影響力的美援時期，國民政府在對內及對外關係上，雖受美國影響，但仍有相當大的自主性與決策力量，可以針對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經濟政策。從早期的採行保護政策、複雜匯率、進口限制，到經濟漸入佳境後的獎勵投資、放寬限制、市場自由化，國民政府皆居於主導地位。因此，國民政府成功的角色扮演，是臺灣經濟發展卓越的主要因素。然而，亦有學者對於國民政府與臺灣經濟成就的關係，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段承璞所編《臺灣戰後經濟》一書中指出，政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一般而言，客觀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政策因素只是第二位。就臺灣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言，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不論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結構變化，包括經濟政策在內，始終受美援和國際市場外部強大因素的支配與制約，所以，臺灣當局經濟政策的作用是極其有限度的。<sup>④</sup>另外，劉進慶所著的《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則就1945-1965年期間臺灣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構加以分析，對國民政府持否定的看法。他認為戰後臺灣有嚴重的政治經濟屬性，國民黨公私混同，將國權黨化，公產家產化，致使官僚資本壟斷經濟命脈、政治權力成為攫取財富的手段；最後，民生主義中所謂的發展國家資本理論，成為掌權者官商勾結發展私人資本的藉口，而一般百姓即成為被掠奪、被魚肉的對象。<sup>⑤</sup>

③ 羊憶蓉：〈教育與國家發展：臺灣經驗的反省〉，賴澤涵、黃俊傑主編：《光復後臺灣地區發展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27)，1991，頁133。

④ 段承璞等：《臺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110。

⑤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VII。

經濟學者在討論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時，多著重各階段經濟發展的現況，如經濟指標、產業結構的改變、公民營企業的發展與資本的累積……等經濟層面的探討。而本書作者則為臺灣經濟發展探討提供了另一個視野，以國民政府因應各階段需求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做為縱軸聯貫全文。但是，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之間原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官僚組織弊病叢生、世界局勢多變的時期，理想的政策常可能因內外在因素的影響，致使執行不力。因此，政策的制定可反映時代的需求以及政府的努力，但卻須詳加評估其效能，不可過度依賴其功用。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作者指出，臺灣有許多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地緣因素與文化特色是其他國家所無法仿效的，因此無法為其他落後國家提供一個仿效的模式，只能提供一個學習的經驗，用此說明何以臺灣經濟發展能成功，而其他落後國家卻無法成功的原因所在。事實上，臺灣經濟發展之所以能成功，除了美援、國際局勢與國民政府領導等因素的相互配合外，中國人特殊的性格也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中國人富有殖心又勤奮耐勞，能以最堅強的韌性應對最艱困的環境，並於逆境之中力求改善現狀。加以中國人擅長儲蓄，能提供政府充裕的資金，促使經濟政策能更靈活運用，對於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實值得重視。

經由本書的介紹，國民政府對於臺灣經濟發展所做的種種努力與貢獻是值得肯定的。經濟發展的成功，解決了人民生計的首要問題，使其他的建設可以接踵而至。但是，經濟發展本身應是一種全面性的規劃與建設，所以，經濟政策必須具有高瞻遠矚、整體規劃的特性，要能與國家社會中的每一個環結緊密相結合。當我們在為卓越的經濟成就與富裕的生活感到自豪時，面對現今交通混亂、空氣污濁、治安不佳、社會福利不健全以及人民投機取巧、急功好利……等弊病時，又不禁感到矛盾與不滿。回首檢視臺灣的經濟發展，最大的缺失就是缺乏整體而長遠的規劃與政策的執行不力，以致於在高度工業化與經貿成長的同時，其他方面的建設非但無法齊頭並進，甚或被犧牲了，成為今日種種問題叢生的潛在因素。舉例說明如下：

(1)五〇年代，臺灣的工業背景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培養農業」的政策，但實際上只實施了前半部政策，而後半部則被忽略了。因為農業生產力的提升，能解決大量人口的糧食需求，並為工業化創造資本。但是，戰後為工業化所做長達二十年的農業價值轉移，促使農業資源不斷外移，農業生產感受到資本與勞力的缺乏，造成了六〇年代後期農業的衰退，農業間

題即成爲日後臺灣經濟增長的桎梏。之後，政府雖然宣布新農業政策力圖振興農業，但卻因受土地有限的限制以及七〇年代經濟市場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挑戰，農產品貿易成爲國際經濟摩擦的一環，使農業經營越來越困難。<sup>⑥</sup>

(2)當前社會的變遷十分劇烈，主要可歸納爲：政治趨於民主與自由，經濟走向富足與享樂，社會浮現功利與動蕩，而文化則淪於膚淺與茫然。<sup>⑦</sup>今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多與經濟太快而其他建設無法全面配合發揮功用有關。例如：由農業社會轉型爲工業社會時，社會的價值觀亦隨之轉變，使人與人之間日益疏離、家庭問題激增、罹患躁鬱症的人越來越多、並有許多人孤苦無依，但社會上可提供輔導協助的機構卻很有限。又因文化建設的貧乏、教育無法發揮它在社會上的教化功用，使得社會上出現以金錢爲導向的趨勢；結果，學校裏人文教育被輕忽，莘莘學子則對商學系趨之若鶩；社會上則賭博歪風盛行，人人夢想一夕致富。

(3)經濟的快速成長，也使得許多公共建設步伐遠遠落在其後，無法配合，最明顯的即是交通建設的落後。在國民生活富裕所得提高、大眾運輸系統不健全的同時，家家戶戶多以私人轎車代步，致使車滿爲患。然而，道路的設施、停車位的規劃卻又永遠跟不上汽車的成長速率，以致於交通嚴重阻塞。

從臺灣發展的經驗中，我們發現美日對臺灣經濟的影響很大，形成臺灣依附外國的經濟性格。由於臺灣自然資源匱乏，必須高度依賴外國供應生產要素，日本即善用此情勢，使臺灣中小企業嚴重依賴日本供應資本財、原料和技術；而美國則利用美援，亦使臺灣對美國經濟形成依附。<sup>⑧</sup>這種依附現象，對早期臺灣經濟發展確有其實質利益，然而，時日一久，即成爲一種社會與經濟依附的長期延續，是相當不利的。因此，本書的作者在對落後國家所做的建議中，特別提出不可過度依賴外國。亦即，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獎勵外國資本投資雖是必要的，但扶持本國資本案、培養民族工業仍是不可

⑥ 蒲谷孝雄等：《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33。  
陳希煌：〈經濟轉變與我國農業發展策略〉，《現代化的困境與調適——中華民國轉型期的經驗》，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頁303-304。

⑦ 傅佩榮：〈當前社會價值系統的定位問題〉，《現代化的困境與調適——中華民國轉型期的經驗》，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頁382。

⑧ 陳玉璽：《臺灣的依附型發展》，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89。

或缺的。同時，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且有能力的政府，則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本書因側重臺灣經濟發展中國民政府角色之扮演與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之影響的探討，所以對於全面性的經濟發展成就缺乏較深入的研究分析。近年來，人間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臺灣社會經濟叢書，也都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做了一些不同層面的介紹。例如劉進慶的《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著重以外來的資本主義體制與本地傳統經濟體制結合而成的雙重經濟理論，來討論光復後臺灣的公業、私業與官商資本的發展，並欲藉此以了解其掠奪與貧困的經濟構造。<sup>⑨</sup>段承璞等人所著的《臺灣戰後經濟》，則以專章討論臺灣戰後資本主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外資與華僑資本的發展，並分析臺灣的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的變貌。其他，如谷蒲孝雄等著《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臺灣的工業化》、陳玉璽著《臺灣的依附型發展》，以及隅谷三喜男等著《臺灣的經濟》，亦皆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能對本書有所補述。至於 Evan Peter B. 與本書作者合著的 *State Structure and Stat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Taiwanese Case for 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ies*，則與本書立論相近，仍多強調國民政府與臺灣經濟發展的關係。儘管每一本書所偏重敘述的方向不同，對臺灣發展研究所提出的論點也不盡相同，但若能廣泛閱讀，相互補證加強，必有助於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做更全面性的了解。

基本上，本書已對 1949-1986 年臺灣經濟發展中，有關經濟決策者、階段性經濟政策制定，以及種種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做了概括性的敘述；惟令人深感缺憾的是受到論文完成時間的限制，只能以 1986 年做為最後的斷限，無法對 1987 年以後的國內發展現狀以及重新修正後的國民黨與國家政策加以介紹。蓋因 1987 年是當代臺灣深具時代意義的年代，此時，在政治革新的論調下，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對於國民黨內部、國家政策制定以及日後發展方向有很重大的影響。本書既著重國民政府角色之扮演，如無法對解嚴後國民政府之改變加以介紹，總令人有不够周全的感覺。幸而，作者在前言中對此已有所體察，期盼在未來的時日中，能見到作者對本書繼續增強補述。

□臺灣師大史研所碩士班·陳秀珠□

<sup>⑨</sup>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 V。

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一九二五—一九三一）。李恩涵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8月，356頁。

本書雖然以一九二五——一九三一的革命外交為名，實際探討的時間範圍卻溯及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後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內容與特色，全書主旨在探討「革命外交」之其來有自，雖有違外交禮節，亦情有可原。本書的主要論點為：任何有違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或利益的條約協定，都在「革命外交」要求刪除或改正的對象，並以之訴諸國際輿論，要求中國群眾共同奮鬥的目標。但「革命外交」並非一味莽撞，「抗議之聲浪很大，行動卻不忘小心」，亦即激烈的對抗總是約束在不要戰爭的原則之下。全文分為八章，前面有「自序」交代撰寫此書之前的學術活動歷程。「前言」則對「革命外交」一辭有所界定，徵引周鯁生、王芸生、洪鈞培三人之說法加以綜合，並以陳友仁為激烈派的代表，伍朝樞、王正廷為溫和派的代表。本書即為對此二派的策略、執行步驟的綜合敘述與分析，亦即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間（北伐前後）歷屆建都於廣州、武漢、南京的國民政府對「革命外交」政策的規畫與執行。

第一章「革命外交的背景與其發軔」，陳述鴉片戰爭後所簽的南京條約，及其後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是因為中國缺乏歐洲式的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經驗與實踐，一時未察這些條約的桎梏性和壓迫性，雖然耆英等人在事後如何努力，都難逃出列國的聯手，而恭親王等人則認為要撥正這些條約需要中國自強之後，李鴻章則在其間以這些不平等條約為「樊籠」，抑制外人在華勢力暨特權的進一步擴張，雖曾經紀澤等人的建議改正，均未採行。甲午戰後，中國民間實行「文明排外」，以抵制外貨、收回路礦權等手段，作者認為此為中國近代經濟性的民族主義最具體的表現，但涉及全面撤廢不平等條約的體系，是要到孫中山從事革命才有膽識提起，而陳友仁在省港罷工之際所採行的七項手法，則為革命外交的最佳典範。

第二章「激烈型革命外交之收回漢口、九江租界」，討論北伐軍在攻下武漢及江西之後，鮑羅廷主導的武漢政府，在英國政府發表「耶誕聲明」之後，繼續營造民眾的反帝情緒，在示威群眾與英國軍隊發生衝突後，坐視群眾的強行先後收回漢口及九江英國租界之行動，其後的「南京事件」更為一反帝行動的高潮。作者分析此等事件之能化險為夷，固然是英國的政策「放

棄次要的利益點，保護頭等重要的利益點」，但陳友仁的手段如賠償英方損失、保證保護外人以及反對鮑羅廷、鄧演達的「片面地、全盤地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等等作法，亦有功勞。

第三章「溫和型革命外交之收回關稅自主權」，討論南京政府成立後，在伍朝樞、黃郛、王正廷的相繼主持下，採取與武漢政府不同的溫和型革命外交，以自強為主的「傳統」外交與半威迫、半說理的政策重疊互用，雖然也歷經困難，但實際收穫卻不遜於激烈型的外交成就，其主要表現為收回關稅自主權。作者指出，雖然伍朝樞也曾效法陳友仁的片面宣告收回主權行動，但其目的在表示南京政府的作法與北京政府在關稅會議上所表現的漸進和緩政策不同，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意思，關稅自主的交涉因受到日本的阻撓而一時中斷，但在若干地區實行華盛頓條約的增稅政策，卻得到美國及英國的支持，後來英國亦出面與日本溝通細節，使得國民政府爭取關稅自主的願望得以達成。

第四章「溫和型革命外交與英國就撤廢領事裁判權的談判」，論述外人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根源，並交代中國政府在庚子事變後致力於改良本國的法律與司法制度，以為取消治外法權之根源。一九〇二年所訂的中英商約（馬凱條約）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從此至辛亥革命間的法制改革大有成就，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提出廢除領裁權之要求，卻被英、法以「與大戰無關」為由而拒絕討論。至華盛頓會議，中國兩度提出，雖未符所望，但列強允設立一特別委員會研究，而此項允諾，又因法國藉口「金法郎案」及英藉口臨城劫車案，無限拖延。直至北伐成功後，再度提出，亦不見功，原因有四：(一)中國政局不穩，(二)中國尚未訂出妥善的管轄外人之法規，(三)中國的獄政不良，監獄設施不合人道；(四)英國以相關問題，切割成多項細節，逐一詳談，破解「革命外交」的氣勢。國民政府雖然幾度宣布要斷然實施新法，都不見效，及九一八事變發生，是項談判自然中止。

第五章「溫和型革命外交與美國就撤廢領事裁判權的交涉」，言北伐之際的美國國務卿開洛格雖然同情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惟在討論此事時（民國十八年）已經下台，新任者史汀生則強調「逐漸廢除」，中國則寄望美國能率先廢除，立一榜樣，以為其他列強效法，但美國不願「使自身陷於較諸他國不利的地位。中國的希望，遂告落空，問題所在，則在上述之前三項。

第六章「溫和型革命外交與日本就撤廢領事裁判權的非正式談判」，論述中東路事件已使中國的外交受挫，中國提出此項要求，日本則以先解決東

北問題為先決條件，並提出以英國的條件為基礎，且間接警告中國不可運用宣傳與威脅手法，及九一八事變發生，是項談判已經無法進展。

第七章「收回威海衛租借地與鎮江、廈門、天津等租界的談判」，言當初英國租借威海衛是以二十五年為期，但拖延三十二年之久，關鍵之處，在於中國內部之動亂，為人乘機勒索。作者回溯威海衛作為租借地之原委，及在華盛頓會議對此事交涉之經緯，此為臺灣坊間盛行的外交史著作所未詳細披露的。至於向英要求收回鎮江、廈門租界、向比利時收回天津租界的談判方面，則較順利。

作者在「結論」中言，革命外交實為一九二五——三一中國國民黨所建立的國民政府所賡續執行的一種解決中外不平等條約關係的新策略，這也是當時東方弱小民族如土耳其、暹羅等在約略同時所努力奮鬥的一項世界性的新趨勢，儘管客觀上，當時的中國的國力有所不逮，但也「運用盡可能的對抗手段，於鐵拳之外罩上一層橡皮，一方面也以國際公法為後盾」，雖於領事裁判權方面是功虧一簣，但因政府鏗而不捨，終了贏得英、美二國主動答允在一九四三年與中國簽訂了平等新約，所以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在此時期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在出版本書前，已經寫過「曾紀澤的外交」、「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以及以英文著作的「清末的收回鐵路權運動」等外交史論著，即本書的內容，也大多已在學術會議宣讀過，接受了批評，再重新思考而釐定出版，顯見李教授對學術研究的執著與忠誠，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之研究，史料繁多，又涉及多種語文之了解與詮釋之紛歧，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史學界，對此時期的外交史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作者以他難得的條件及環境與鏗而不捨的精神，作出輝煌的呈現，令人欣喜與欽佩！然而，所謂的革命外交，應該是尚未執政的革命團體或在野黨的政見或主張。一個政黨一旦執政，即不該用「革命的」手段，尤其是當時的中國是弱國。所以，執政前的中國國民黨，對於五卅慘案、沙基慘案，發起省港大罷工的抵制行動，以及在北伐過程中的強行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可以說是利用情勢的革命外交的傑出表現。至於收回關稅自主權，是在華盛頓會議時所定下的條件（裁釐）之履行而已。領事裁判權撤廢的交涉過程，國民政府雖一再宣布「自明年元月起，斷然實行撤廢……」，但是項聲明之不能實施，毋寧是中國政府不能遂行華盛頓會議的約定（法律規章的改善與獄政的人道精神之賦予），加上中國內政的不穩，所以無革命外交的成就可言。而民國十八年的中東路



事件及九一八事變的發生，部分原因卻是革命外交的濫用，作者也承認此點（頁一七六～八）。當然，這不足遮蓋國民黨的革命性，更不能使本書失去作為研究此段外交史不可或缺之著作的必然性。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王綱領□

---

**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麥禮謙著。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1月，544頁。

本書是美國華僑史專家麥禮謙教授著，1992年1月三聯書店（香港）刊行。三十開，連序文、照片、附錄參考文獻目錄共544頁。現在居住在中國以外的中國人分為兩種，持中國政府（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者為華僑，入外國籍者稱華人。美國華僑變成美國華人是二十世紀的事，故書名如此。

本書是探討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發展史，所以除大陸美國以外，也將1898年被美國滅亡吞併的夏威夷包括在內，有時也涉及加拿大。討論的時間上限主要為十九世紀中葉，下限至1980年代。因為是華人社會發展史，所以有關19世紀下葉華工赴美，美國排華，及中美的交涉諸端自然全部省略，不過有關華人社會史事，均自這半個世紀開始著筆。

本書將美華社會發展分為下列三個時段。一、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二、二次大戰至1960年代，三、1970至80年代。二次大戰前美華社會雖也有變化，但沒有二次大戰時美華與白人一起投入戰爭，1943年美國廢除排華法，1965年美國修改移民法引起的影響深遠。1965年修法的影響到70年代方顯現出來，但70年代也是中共進入聯合國，與美國建交，第三世界華人向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美、加、澳、紐再移民，及美軍撤出越南，越共進攻柬、寮，迫害越柬寮華人，導致東南亞華人大批移美的時期。這說明二戰後因交通工具發達，國際影響迅速頻繁，以致重大歷史事件的波距縮短，歷史分期難，界限易重疊模糊。

第一章交代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華人在美西，向美南、美東、美中的散佈及就業，及夏威夷華人的經濟情況。第二章「美華社會體系的確立」，指出華僑社會男多於女，且差額懸殊，以商人為主體的特性，說明華人社團——

邑界、姓界、堂界（幫會）、行會、中華會館的成立與發展，以及華文報業、教育的興起。這些特性，及僑團的特性，與僑報、僑教等，乃是全球各華人社會普遍現象，惟所述留學美國一項，乃其他各國華僑史罕見者。由於作者自己的勤墾蒐研，廣泛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無論第二章的美華報業教育，及第二章所析華人經濟——洗衣、餐館、零售雜貨，大企業、銀行、運輸業，及農業等，均極周詳，許多乃以前中文美華史著所未道，而第四章「土生華裔社羣的出現」尤為引人。在本章內，作者檢討了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及基督教——新教、青年會、天主教，甚至教會自立運動發生的作用。他注意到若干美華透過教會而學好英文，求得專業知識，及好的職業。土生美華模仿美國的生活習慣而成立社交組織，並打入主流社會的專業工作領域。十九、二十世紀華人移住的地區幾全屬西方殖民地，而這些西方國家的教會在社會、教育工作方面頗有功能，與華人移民有關係、影響力，研究海外華人史，應予相當注意。土生華人是介於當地人及華人之間的族羣，其心態、文化及與當地人和華人之間的關係，在印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均引起極大的研究興趣。同樣，第七章「工人運動的發展」也是其他美華史罕見的。

第五、六章討論美國人與中國政治的相互影響或行動關係，具體說是保皇、革命黨在美華社會的活動，及民國時期國內政爭，政治發展對美華的影響，美華財經力量及人才對中國的貢獻——華僑子弟回國服務，僑匯、僑資企業在中國。第八章研討美華自甲午戰爭至二次大戰的支援祖國抗日事蹟，及因中美聯手抗日美國取消排華法律。支援中國抗日乃全球華僑一致的行動，而在支援抗日中青年們參加組織歌咏、話劇、辦報活動，實為華青中華文藝運動。這事同樣發生在南洋華僑青年羣中。

第九章是關於大戰結束至六十年代中國政局對美華社的影響——左派勢力的消沉，親國民黨勢力的一枝獨秀，土生美華積極向美國主流社會邁進，積極參政，而由於中國城的中國生華僑人口減少，土生華人中文程度低，大陸臺灣去的知識分子新客均不居中國城，中國城趨向衰落，中國文化影響走向低潮。第十章探討同一時期美華的社會與經濟變化。大致是華人職業走向科技專業、文職公務人員等腦力勞動的行業，華人的經濟活動領域中，洗衣及農漁業衰，餐飲業發達，雜貨店走上超級市場之途，進出口、航運、成衣業、及金融業開始活躍。

七十年代，美華除餐飲、超市業繼續擴展外，在電子等科技領域，地產業、金融業有長足的發展。由於從臺港大陸移入人口大增，華文報業、文

學、教育更盛，廣播、電視出現，組成形形色色社會團體。作者所描述的美國亞裔運動、保釣運動是我們耳聞目睹的。臺海兩岸的較勁，大陸的異議分子及臺獨分子活動均出現於美國。八十年代美華已達一百六十萬，許多新華人區出現，華人子弟在學校優秀的成績，華人學者的重大貢獻，華人高所得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高於其他亞裔等，均是昨日新聞，而被作者寫成他著作的第十二、三章，但作者也告訴我們，華人受初等教育及低所得的人口比例，也幾乎高於其他亞裔美人。

這本工程師出身如今是著名美華史家寫的著作，的確內容豐富。除上面介紹的以外，讓我再舉幾個例。作者指出，舊金山華埠少壯分子在六十年代之前已加入美國共產黨（頁 369），這是因作者對左派華人研究有素，著有「美國華人左派組織歷史概論」之故。國人素知第一次大戰後中國有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而本書說，一九一四年美國歐柏林有留美學生勤學會，一九一六年改名留美中國學生工讀會，其目的在半工半讀助成留美學生之學業（頁 62）。閱海關貿易資料可知，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出產的日用百貨已銷往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諸島國。其實那些貨物是那裏的華僑消費的。本書指出這一點，從而可以想到，華人外移除賺外地金錢外，也可開拓中國貨物的外銷。

移民史不易治，不僅要瞭解華僑及其所在國之情形，也須掌握中國史研究的發展。如本書謂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在「中國方面，除了張治中將軍率領第五軍自動參加外，南京方面始終沒有發一兵一卒來援助。」（頁 289）然而據近年研究，除第五軍外，憲兵第一、第六兩團，中央陸軍官校教導總隊，上海救國義勇軍第三大隊，吳淞要塞守軍，均編入十九陸軍戰鬥序列，此外尚有空軍第六、七中隊。〔劉鳳翰：抗日戰爭史論集（臺北，大東圖書公司，1987），頁 49, 51, 61-62。〕其時政府軍正在江西剿共，無法抽調，故將警衛國府之八十七、八十八師臨時編組為第五軍參戰。將憲兵、陸軍官校教導總隊派赴戰場，固然顯示當時無兵可調之困境，然同時也證明南京並非未派一兵一卒，而且軍隊調動必奉上級命令，否則張治中不可能自動參戰。

寫書難，讀書也不易。本書第 305 頁提到「華人左派進步團體」，「到三十年代，華人進步分子已經先後在華人社會成立反帝大同盟」，該盟與 1938 年成立的華僑青年救國會「跟主流進步力量又保持密切聯繫」，而 1940 年美洲華僑日報出版後，成了「美洲華人第一家以進步立場出現的日報」（頁 306）舊金山「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成立新文學研究會，成為美西華人「

進步力量」抗日救亡活動的核心，他們與「美東華人進步團體」相呼應。此外頁 311，也有「進步思想」的語詞。連繫前後文可知，所謂進步分子、進步團體乃指左派人士，左派團體，進步思想乃左傾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對左傾的思想、人士認為是進步，尚可原諒，因為當時對他們還認識不清，但在中共執政四十年，政治獨裁，社會封閉，經濟停滯，箝制言論思想，六千萬人被鬪死，弄得中國成今天的落後樣子的時候，還認為這些左傾的人及思想為進步，就難以讓人心服並理解了。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存武□

**Key Ray Chong, Cannibalism in China, Wakefield, New Hampshire: Longwood Academic, 1990. 200pp.**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這段「膾炙人口」有關「吃人」歷史的文字是魯迅在1918年所發表《狂人日記》中的一節。但是綜觀全文側重的還是「禮教吃人」的精神層次，對於實際以人為食物的「食人歷史」總不甚清楚。所幸，終是有些「有心人」去研究中國的食人歷史，讓一般人對於小說《水滸傳》中的「人肉包子」與「心肝醒酒湯」的描述在認知上能夠有所超越，對中國的食人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美國德州科技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 Key Ray Chong 教授所著的《食人在中國》一書即對此一方面的研究作出貢獻。

本書除引言及結論外，共有七章，並分兩部分討論。引言部分為作者對人類學及世界各地所存在之食人歷史文化作一般性的介紹，使讀者能有通盤性的基礎知識，了解食人現象曾經普遍存在，而非中國所固有。有此心理準備，讀者在閱讀正文時，方才不會對中國淵遠流長的食人歷史遽爾難以適應。當然，更好奇的讀者可以直接尋找人類學有關此方面的著作閱讀。

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章，探討中國上古至清代的食人現象。其首章內容為上古時期中國的食人記載。第二章為漢代至明代的「求生型」食人例證。第三章為漢代至明代的「學習型」食人史實。第四章為清代的食人記載。作

者將食人現象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求生型」(survival cannibalism)，一為「學習型」(learned cannibalism)。所謂「求生型」食人即是在危難狀態下為求生存，不得不以人肉為食，以求續命。自古以來因戰亂、旱澇、蝗災等因素導致饑荒，終至以人為食，史不絕書。第二種「學習型」的食人，其動機通常源自忠、孝、義、愛、恨、醫藥、宗教、迷信等等之作用。依作者之見，「學習型」的食人行為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其主要論據為歷代因忠、孝而食人或被食之行為履見不鮮，甚至為朝廷褒揚，成為公眾景仰之模範。此點似乎不脫五四時期「禮教吃人」之控訴，頗值深入探討。

本書第二部分計有三章。第五章內容為中國文學中的食人描述。第六章則專門探討人肉的烹調方式。第七章對歷代食人記載加以統計和分析。本書結論之重點認為古代中國的「學習型」食人現象與宗教、迷信甚少關聯，此點與世界各地存在的食人文化頗為不同。

當然，中國的歷史悠久，地幅廣大，人口眾多，此一食人的特異文化也存在差異性，但是對於作者的結論，我們也可舉出充分的反證。例如商代之世，商王祭祖除用牛、馬、羊之外，也大量使用人牲，其數量動輒數百，甚至達千人之多，這些都可在甲骨卜辭中找到例證。敬神尊鬼之後的犧牲即被食用，此點可由考古學在大量人獸殘骨得到證實。此外，歷代多有獻俘祭廟之舉，此皆與宗教儀式有關。即使進入民國以後，尚存在以饅頭蘸人血，炙後食之可治肺癆的迷信。這些都可以動搖作者的結論。除了宗教、迷信原因之外，口腹之慾也是食人之因。顯然作者所蒐集的資料不足，方才將此一特異行為歸在文學類描述。宋代趙與時在其《賓退錄》即記當時「知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另外，唐初時朱粲以人為糧，謂「啖醉人如食糟豚」；唐代節鎮張茂昭「頻吃人肉」；五代之萇從簡「好食人肉，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吳將高澄「嗜殺人飲其血」；宋太宗時國舅王繼勳亦因好食人肉而坐斬。這些均與忠、孝、義、烈無關。

同類相殘，人且惡之，何況出現人吃人的慘劇？然而血腥的史實又不能不面對。食人行為在治世可能遭受懲罰，而災亂之時禮崩樂壞也無暇計之矣。唐、宋之時大約是中國食人史上最堪稱慘烈者。最著名者以安祿山之亂時，張巡、許遠守睢陽城被圍，「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至城破時已幾無噍類。而宋之靖康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大饑，「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不僅如此，甚且公然上市販售。據莊綽《鷄肋篇》所

記，「人肉之價，賤於犬豚」，「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爲『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同書並稱宣和年間，「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大食人肉之餘，其腦尚可煉油，供應四方之食，可見其數量之多。至於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亂亦甚慘酷。據《明史》所載，兵災加蝗害，導致洛陽附近「歲大歉，人相食」。官軍傅宗龍部在項城附近被圍絕糧，「殺賊取屍分噉之」，吃了七、八日終被擒。官兵食盜賊，盜賊亦食官兵，福王朱常洵被殺，賊兵「灼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明史》卷三百九對李自成、張獻忠之殘酷止稱「自成……日殺人斫足、剖心爲戲」、「剖人腹爲馬槽以飼馬」，「獻忠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創生剝皮法……」聊聊數語，不及其食人記載。而清人筆記則稱其軍中鹽車以隨，沿途以人爲糧，這是生產系統大破壞之後的慘況。

本書作者之研究主要依據所謂官修正史，因此存在資料不足的情形。因災亂食人之事「慘不忍言」，一般官修史多半一筆帶過，所以眾多的時人筆記成爲值得重視之資料來源。如唐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唐國史補》，宋孫光憲《北夢瑣言》，類書《太平廣記》等均可查到相關記載。此外，地方志之資料亦有待耙梳。事實上，資料的不足是此一研究的缺憾。本書體例的不統一正反映出這一點。將全書分爲兩部分討論似乎並無必要，即第五、六兩章完全可以在其各相關年代中討論。而漢代至明代之食人史既然區分兩種類型分由兩章討論，則清代之食人史似乎沒有理由將此二類合併探討。何況，清代之所以能獨立成章是因作者認爲在《清史稿》中得到更多資料之故。相信如果作者能利用宮中檔案，應能找出更多材料可供研究。

由於歷代典籍多有散佚毀禁，資料搜尋不易，對於研究形成一大障礙，若再對作者多作要求，不免失之於苛。總而言之，本書是研究中國食人史的一部入門好書。讀者似乎可以從中明瞭，爲何天津教案發生時中國人堅信洋人殺嬰食人？爲何徐錫麟刺恩銘，爲其親兵剖心食肝？等等事件背後的文化根源。當然，讀者也希望知道作者在開頭所指出的，食人行爲如何轉化爲中國文化中的一部分，這種由形而下至形而上的轉變是否可能拋棄？如果以部分存在的歷史擴大爲文化中的原罪，未免過於以偏概全。無論如何，單純的吃人其數量終究有限，而在一個不以人爲人，缺乏尊重生命的文化下，所殘

害的肉體生命和精神，其規模和數量都是極其驚人，毋寧更值得我們深入探討與反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許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輯**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贊助**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一期 300頁 平裝300元

**發刊詞**

**論 著**

王奇生：民國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  
 黃嫣梨：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  
 李又寧：曾昭燏（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  
 梁雙蓮·朱法源：從溫室到自立——臺灣女性省議員當選因素初探：（1951~1989）  
 Bao-Hua Hsieh: The Acquisition of Concubines in China, 14~17<sup>th</sup> Centuries

**學術討論**

鄭培凱：晚明衷中道的婦女觀  
 成令方：女性主義歷史的挑戰：概念和理論  
 ——二十年來英美女性歷史學者關注的議題  
 Susan Mann: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 S.

**研究動態**

鄭雲山·陳德和：1949年以來大陸學術界的秋瑾研究綜述  
 石川照子：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中國女性史研究の狀況  
 Lucie Cheng: Women in China II: A New Bibliography of Availabl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Progress Report

**書 評**

吳文星：評介小野著《五四時期家族論的背景》  
 盧蕙馨：A Thrice 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by Margery Wolf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史料介紹

#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

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公佈

蘇雲峯\* 撰介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下簡稱「臨時約法」）是二十年代聯省自治運動下，「鄂人治鄂」運動的產物。它是湖北人要求軍民分治，以本省人為省長失敗後，發動湘軍援鄂戰爭，企圖推翻湖北督軍王占元，建立湖北省自治政權時所實行的一部約法。

這部「臨時約法」是由湖北自治軍在湖南所制訂的。湖北自治軍的領導人是蔣作賓、李書城和孔庚等人，他們制訂此部約法的過程不甚清楚，顯然受當時湖南討論省憲問題的影響。但又和湖南省憲法不盡相同。於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公佈，一個禮拜後就發動戰爭，由於吳佩孚之介入，援鄂軍失利，而於九月一日停戰議和。本「臨時約法」就登載於同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順天時報第四版上。湖北自治軍原計畫依據此部「臨時約法」在成立湖北省臨時政府後四個月內制訂出一部「湖北省憲」來，再依照這部憲法，舉行省總監和省縣市議會議員的選舉，行完全的自治。但因為湘軍援鄂戰爭失敗，沒有實行。

但我們從這部「臨時約法」中，可以看到湖北省憲法的基本精神，所以在這裏有簡單介紹的必要。約法全文共有十四章一百二十條，各章總目如下：一，總綱，二，人民之權利和義務，三，省之事權，四，臨時省議會，五，臨時省總監及臨時省務院，六，臨時省法院，七，臨時審計院，八，省金庫，九，臨時清理財產委員會，十，省政大綱，十一，縣制大綱，十二，市鄉自治大綱，十三，省憲法之制定，十四，附則。整個來說是一個過渡政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府的設計，從其主要內容和特色，可以預見未來的湖北省憲法，是一部具有現代民主精神的憲法。

這部「臨時約法」至少有八點特色：一是各政府機構間的互相制衡，如省議會有彈劾省總監和省務院院長及廳長之權，總監可以任命院長及由院長推薦之省務員（兼廳長），惟須經省議會同意。但省總監亦可以解散議會，法院對違法及賄賂之官員和議員，均有獨立審判權。二是採取「內閣制」的精神，省總監（相當於一國之總統）雖掌軍政大權於一身，但省務院院長（相當於中央之行政院院長）負有實責，凡總監之命令及有關政務之文書，須經院長及各有關廳長副署後，始能生效。因此，總監有如虛位元首。三是除縣知事外，省總監、一等市市長和各級議會之議員，均由公民投票選舉產生。四是權力下放，設有全省公民總投票公決的機制，使人民對省憲、省議會認為重要的財政及預算案、省議會之違法行為等均擁有公投多數表決的權力。五司法獨立，法院可以依據檢察官對官員和議員的彈劾案，進行獨立的審判。六議員在開會期間有言論自由和人身保障，七人民不分性別、宗教和階級，一律平等，均受法律之保障，享有身體、居住、營業、言論、著作、集會、結社和秘密通訊之自由，此外，還享有生存權和工作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請願權、訴願權、訴訟權和陪審權等。八為消除長期以來外省軍隊對湖北的傷害，規定「省軍以本省人民充之，有保障本省及中華民國之義務」（第七十九條）。省軍得冠國軍編號。外省軍隊非經許可，不得駐紮或通過本省境內（第八十條）等等。

這部「臨時約法」和湖南的憲法相比較，有相同處，如省長下均設政務院和各級議會，省長掌有軍政大權，省長和人民均有解散議會之權力，人民有公投權等等。但亦有不同處，如湖南稱省長，省長當選後得受中央政府之任命，而湖北人不稱省長而稱省總監，其臨時省總監係由湖北自治軍及其支持者選出，將來的省總監由湖北全體人民選舉產生，似不需中央任命；湖南為內閣制或總統制爭議不休，湖北則確定為內閣制等等。雖然這部「臨時約法」在實際運作時，將出現許多困難，諸如湖南和四川軍隊的撤離問題，湖北人民的素質是否足以正確表達官員和議員選舉及全省公投的自主意識等問題，但因為湘軍援鄂戰爭失敗，未經一試即置諸高閣，未免可惜。<sup>①</sup>

茲將這部「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全文刊登於下：

<sup>①</sup> 蘇雲峯著，省籍意識與地方自治：以一九二〇年代之鄂人治鄂運動為例，「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民國83年1月。

##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

湖北自治軍制訂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公佈

### 第一章 總 綱

- 第 一 條 湖北爲中華民國之自治省。  
第 二 條 湖北省以現有六十九縣爲區域。  
第 三 條 省自治權屬於全省人民。

### 第二章 人 民

- 第 四 條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繼續居住本省滿二年以上者，皆爲本省人民。  
第 五 條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均，無男女宗教階級之區別。  
第 六 條 本省人民有左列之權利：  
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如有侵害其自由時，得向所在地法院請求出庭狀，立即審判之。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四、人民有財產權及營業之自由，但因公益上必要之處分，得依法律之所定。  
五、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之自由。  
六、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  
七、人民有從事於地方公務之權。  
八、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九、人民有最低限度之生存權。  
十、人民有要求相當職工之權。  
十一、人民有享受其勞動所生純利相當分配之權。  
十二、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十三、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及陪審之權。  
十四、人民有訴願於行政官廳之權。

十五、其他法律賦與之權利。

第七條 本省人民有左列之義務：

- 一、人民有納租稅服兵役之義務。
- 二、人民有受強迫教育之義務。
- 三、人民有警衛地方之義務。
- 四、人民有效力相當職業之義務。
- 五、人民有互助社會公益之義務。

第八條 外省人之居住營業於本省者，與本省人受同等之保護。外國人依條約居住營業於本省者亦同。

第九條 關於人民權利義務各種法律另定之。

### 第三章 省之事權

第十條 關於左列各事項省有議決執行權。

- 一、省憲法及省單行法之制定。
- 二、省以下之地方制度及各級地方自治之監督。
- 三、省官制官規。
- 四、省法院之編制、監獄，與感化院之設立，司法行政之監督。
- 五、各種職業團體之組織法規。
- 六、制定本省稅則草案省公債及訂結省政府有負擔之契約。
- 七、省公產及營造物之處分。
- 八、各級學校學制及與教育相聯屬之事項。
- 九、鑛業森林水產畜牧及各工廠之保護及發展。
- 十、各種公共實業及關於實業之法規。
- 十一、省以內之河川道路土地整理，及其他土木工程事項。
- 十二、省以內之鐵道電話電報支線之建設。
- 十三、省內之軍政軍令事項。
- 十四、省警察行政之事項。
- 十五、省民生計及勞工生活之改善事項。
- 十六、衛生及各種公益福利事項。
- 十七、其他國家法令賦與及省自治一切事項。

第十一條 執行前條各事權，如為謀交通行政之統一，聯絡省際商業之發

達，及應國防上之急需等類，國政府之法令得容受之。

第十二條 省政府受國政府之委託，得執行國政府行政事項，但因執行所需之費用，應由國政府負擔。

#### 第四章 臨時省議會

第十三條 臨時省議會，以全省各縣有選舉權之人民直接投票，選出議員組織之。選舉法及組織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每縣選舉臨時省議員一人，但錢糧額數在二萬兩以上之縣，得選舉二人。

第十五條 人民年滿二十歲以上，除精神病者，吸食鴉片煙者，褫奪或停止公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撤銷者外，皆得選舉議員。

第十六條 人民滿二十五歲以上者，皆得被選為議員。但各學校肄業生與不識文字人，停止其被選舉權。現任本省官吏及在職軍人，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七條 臨時省議員任期，以省憲法制定正式省議會成立之日為限。

第十八條 臨時省議會，設議長一人，副議長二人，由省議員互選之議長須常駐議會。

第十九條 臨時省議會在自治政府成立兩個月以內召集。每年常會會期以三個月為限，但得延長一個月。

第二十條 由自治政府動議或議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動議時，得開臨時會，但會期不得超過常會期。

第二十一條 臨時省議會之職權如左：

- 一、除省憲外，議決關於第十條列舉各項之法規契約。
- 二、議決省預算決算。
- 三、質問或建議於自治政府。
- 四、答覆自治政府之諮詢。
- 五、受理本省人民之請願。
- 六、提出彈劾及查辦官吏案。
- 七、通過省務員及高等審檢廳長審計院長官錢局長。
- 八、其他法律賦與事項。

第二十二條 全省教育農工商各總會及律師公會，得提出關於教育生計之法規案，送由臨時省議會議決。

- 第二十三條 各縣議會及一等市議會，有三議會以上之全體議員連署動議，得提出法規案，送由臨時省議會議決。  
本條與前條提案者，須派代表出席說明理由，但不得加入表決數。
- 第二十四條 前二條所提出法規案，臨時省議會若擱置不理，或議而否決時，各該動議者得經二十縣議會或（一等市）以上之連署提付省民公決。
- 第二十五條 省議會議決之事件，省總監須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公布之。  
省議會議決之事件，省總監如否認時，得於公布期內，將否認之理由，移咨省議會覆議。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省總監即須公布之。未咨省議會覆議之事件，逾公布期限，即成爲法律，但公布期滿在省議會閉會或解散後者，不在此限。  
省議會議決之事件，於將近閉會期咨送省總監者，省總監認爲同意時，至遲須於閉會後三十日內公布之。
- 第二十六條 臨時省議會，對於自治政府提出之財政法預算案，有認爲重大者，得提付省民公決。
- 第二十七條 臨時省議會有違法行爲，經自治政府或公民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解散案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可決時即行解散。但於三個月內須召集之。  
凡省公民投票公決之方法，另以法律定之。
- 第二十八條 臨時省議員有受賄及瀆職情事，得由原選縣撤回，或宣告下屆不得當選。  
前項撤回及宣告之動議，應由原選縣公民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以全縣公民投票過半數決之。
- 第二十九條 省議員在會內所發之言論，對於會外不負責任。
- 第三十條 省議員在開會期內，除現行犯外，非經省議會之許可，不受逮捕審問及監獄，省議員在開會期內，被逮捕監禁時，逮捕監禁之機關，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將逮捕監禁理由通告省議會。
- 第三十一條 臨時省議員無歲費，並不得兼任有給公職。但於開會期內，每人月薪洋二百元，閉會期內，議長月薪二百元，副議長月薪一百五十元。

## 第五章 臨時省總監及臨時省務院

### 一、省總監

- 第三十二條 省行政權由臨時省總監以省務員之贊襄行之。
- 第三十三條 臨時省總監由湖北自治軍及志願加入湖北自治軍之本省人民公舉之。
- 第三十四條 臨時省總監就任時，須為左列之宣誓：「某某誓以至誠，遵守約法，執行省總監之職權，謹誓」。
- 第三十五條 臨時省總監之任期，以省憲制定，正式省總監選出就任之日為止。
- 第三十六條 臨時省總監遇事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由省務院長代行其職權。如缺位時，即由臨時省議會另選之。
- 第三十七條 臨時省總監如有謀叛、賄賂及其他重大犯罪行為，臨時省議會得以臨時省議員總額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三以上之可決彈劾之，臨時省總監被彈劾時，須即辭退。辭退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訴。
- 第三十八條 臨時省總監之職權如左：
- 一、公布法律及發布執行法律之命令。
  - 二、管理全省軍民政務統率全省軍隊。
  - 三、任免全省文武官吏，但本法及他種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 四、遇內亂外患時，經臨時省議會之同意，得宣告戒嚴。如在省議會閉會期內，須由省議會追認之。  
戒嚴期內，本法第六條之二三五六四項之權利，得暫受限制，但經臨時省議會認為無戒嚴之必要時，應即宣告解嚴。
  - 五、遇必要時召集省議會臨時會。
- 第三十九條 臨時省總監執行前列各項之職權，須由省務院長及主管之省務員副署負責。
- 第四十條 臨時省總監歲費為一萬二千元，但變更時須得省議會之同意。

### 二、省務院

- 第四十一條 省設省務院及行政各廳。  
省務院以省務院長及各廳廳長組織之，皆爲省務員。省務院長須兼一廳長。
- 第四十二條 省務院長及由省務院長所推薦之各省務員，皆由省總監任免。但臨時省議會成立後，省總監任命省務院長及各省務員時，須得省議會之同意。
- 第四十三條 省設左列之各廳：  
一、內務廳。  
二、外交廳。  
三、財政廳。  
四、軍務廳。  
五、教育廳。  
六、實業廳。  
七、交通廳。  
八、司法廳。  
九、勞動廳。  
各廳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 第四十四條 省務院設政務會議，以省務院長爲議長。各省務員皆列席，議決施行方針及關涉各廳權限爭議之事件。對於省議會負連帶責任。省務員各任其所主管之政務，對於省議會負單獨責任。
- 第四十五條 政務會議議決之結果，須由省務院長報告省總監。遇有特別重大事件，得由省總監主席，於省務院開特別聯席會議。但此種聯席會議，省總監不得以省務員不能負責之議案，強制其議決執行。
- 第四十六條 省總監所發之命令，及其他關於政務之文書，非經省務院長及該主管廳長之副署，不生效力。
- 第四十七條 省務院長或省務員全體有違法賄賂行爲時，經省議員總額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可決彈劾，咨請省總監免職。免職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訴。如省務員單獨有違法賄賂行爲時，適用前項之規定，咨請省總監單獨免職。免職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訴。

## 第六章 臨時省法院

- 第四十八條 省設高等審判廳，爲一省審判最高機關，對於本省之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訴訟之判決，爲最終之判決。高等審判廳之下，設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
- 第四十九條 省設高等檢察廳，爲一省最高之檢察機關。高等檢察廳之下，設地方檢察廳，初級檢察廳，受高等檢察廳之指揮監督。
- 第五十條 高等審判廳長，及高等檢察廳長，由省總監任命之，但臨時省議會成立後，省總監任命高等審檢廳長時，須得省議會之同意。高等審判廳及高等檢察廳以下之各法官，均由省總監任命之。
- 第五十一條 高等審判廳長及高等檢察廳長，有違法賄賂行爲時，經省議員總額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可決彈劾，咨請省總監免職，免職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訴。
- 第五十二條 司法區域之劃分，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俸給，法官之懲戒處分，均以法律定之。

## 第七章 臨時審計院

- 第五十三條 省設審計院，審計院長由省總監任命之，但臨時省議會成立後，省總監任命審計院長時，須得省議會之同意。審計院之組織法另定之。
- 第五十四條 審計院長有違法賄賂行爲時，經省議員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可決彈劾，咨請省總監免職，免職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訴。
- 第五十五條 省經費之收入，各徵收機關須於繳納省庫時報告審計院。省經費之支出須經審計院長按照預算案，或臨時支出之法案核准籤印。支出與原案不符時得拒絕之。
- 第五十六條 審計院得隨時調查各機關之收入簿據。
- 第五十七條 審計院對於全省各機關收支簿據之登記法，及報告程式，有釐訂劃一之權。此項釐訂劃一辦法，由審計院長呈請省總監行



之。

## 第八章 省金庫

- 第五十八條 全省財政之收支，由省金庫或代理省金庫之銀行商號執掌之，領款書據須由審計院長之蓋印，省金庫方得支付。  
省金庫組織法另定之。
- 第五十九條 省金庫暫以現有之湖北官錢局任其事務。官錢局長由省總監命之，但臨時省議會成立後，省總監任命官錢局長時，須得省議會之同意。
- 第六十條 省金庫應負私訴上之責任。
- 第六十一條 官錢局長有違法賄賂行爲時，經省議員總額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可決彈劾，咨請省總監免職，免職後由檢察廳提起公诉。

## 第九章 臨時清理財產委員會

- 第六十二條 清理財產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除武漢兩商會各舉二人外，餘由十府一州各舉一人組織之，組織法另定之。
- 第六十三條 清理財產委員會以清理全省國有省有之一切財產，及以前各機關之出納款項爲其職權。
- 第六十四條 清理財產委員會，每屆月終，應將清理情形咨達省政府公告於武漢各報，清理終結時，應具總報告書，公告全省人民，限六個月清理完畢。

## 第十章 省政大綱

### 一、財政

- 第六十五條 省租稅之徵收，須依省法律之規定。
- 第六十六條 省會計年度，以每年七月一日爲始，至次年六月三十日爲止。
- 第六十七條 自治政府，須於臨時省議會開會後兩個月內，將次年度之預算案提交省議會議決。  
自治政府得提出追加預算案，交省議會議決。  
省議會對於預算案得修正之，但不得增加歲出或增加新項目。

預算案經省議會議決後，各種款項有指定用途者，自治政府不得移作別用。

第六十八條 自治政府須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將前年度之決算案提交省議會議決。

第六十九條 省之財產須公開之，凡省之財務行政狀況及省議會之預算決算案，自自治政府須詳細公布之。

## 二、教育

第七十條 全省人民無分男女，自滿七歲至十四歲止，皆有繼續受教育之義務，自治政府為達前項之目的，得強制各地方自治團體，就地籌集義務教育經費，開辦應有之國民學校。

第七十一條 每年教育經費至少須佔全省預算案歲出百分之十。每年提出教育基金至少須佔全省預算案歲出百分之一。其保管方法及用途，以省法律定之。

第七十二條 自治政府及各自治團體，須設備特別基金資助貧戶男女學生之適於受中等以上教育者，此種資助之方法以省法律定之。

第七十三條 無論公私學校不得駐屯軍隊，或據為軍人住宅。

## 三、實業

第七十四條 省有財產，非經省議會議決，不得抵押或變賣之。省內天然富源，無論公有私有，不得變賣於無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七十五條 省以內之私人營業，自治政府認為公益必要時，經省議會之議決，得以相當之代價收歸省有。

第七十六條 自治政府依法律之規定，對於私有營業之勞工保護、勞工賠償、勞工衛生等件，得取締監督之。

第七十七條 自治政府依法律之規定，對於私有之營業之不正當競爭與不公允者率得取締裁制之。

## 四、軍事

第七十八條 全省軍務為省行政之一部，無論平時戰時，其管理統率依本法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之規定，屬於省總監。

第七十九條 省軍須以本省人民充之，有保護本省及中華民國之義務。

- 省軍得冠以國軍之編號。本省境內，不得於省軍外，另編國軍，省軍之編制、教育、給與、服裝、營舍，得適用國政府之規定，並得受其檢閱與糾正。
- 中華民國對外宣戰或保衛京畿分任國防時。省軍得依國憲受國政府之指揮。但出動至旋師期間之用費，由國庫支出之。
- 第八十條 平時常備軍額，以適合本省自衛力為度，其軍費不得超過省歲入額三分之一。
- 第八十一條 省內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軍隊非經省政府許可，不得駐紮，或通過本省境內，但在臨時省議會成立後，須得其同意。
- 第八十二條 省軍除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外，非經省議會通過，不得擅調出省，但依他省人民或團體之請求，得出境援助其自治。
- 第八十三條 整理民團商團，增進人民之自衛力，省政府得依確實之保證，由人民備價請購必要之槍械，民團商團組織法另定之。
- 第八十四條 確定義務民兵制，提交省議會通過施行。

### 第十一章 縣制大綱

- 第八十五條 縣為省之地方行政區域並為自治團體。
- 第八十六條 縣設知事一人，受省總監之指揮監督，執行省之地方行政及縣之自治行政，並同時監督縣以下之各自治機關，縣行政機關組織法另定之。
- 第八十七條 縣知事，不分省縣籍，由省總監任命之。但縣議會成立後須得其同意。
- 第八十八條 縣知事任期三年，但在任期內得由省總監免職。縣知事違法或失職時，由縣議會或全縣公民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彈劾之，省總監接收彈劾時，應即撤換。
- 第八十九條 縣置縣議會，議員人數依縣之大小酌定之。但不得少於十二人，至多亦不得過二十四人。
- 縣議會於臨時省議會成立四個月後招集之。
- 縣議員由全體公民直接投票選出之。選舉及組織法另定之。縣議員得適用本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之規定。
- 第九十條 在不抵觸省法令之範圍內，縣有左列各事之自治權：
- 一、縣以內之教育及與教育相聯屬之事項。

- 二、縣以內之道路水利及其他土木工程事項。
  - 三、縣以內之實業及公共營業。
  - 四、縣以內之警察衛生及各種公益慈善事項。
  - 五、縣公產及營造物之處分。
  - 六、其他依省法令賦與縣自治處理之事項。
- 前列各事有涉及兩縣以上者，得協議處理之。

第九十一條 在不抵觸省法令之範圍內，縣得制定縣稅及附於省稅之附加稅，並他種公共收入，以充縣自治事項之經費，但須受省政府監督。

第九十二條 縣之收入支出，每年須得詳細公佈之。

## 第十二章 市鄉自治大綱

第九十三條 省以內之都會商埠人口滿二十萬以上者，爲一等市。人口滿五萬以上不及二十萬者，爲二等市。人口滿五千人以上不及五萬人者，爲三等市。不及五千人者，屬於鄉。凡市鎮皆爲自治團體。市鄉自治團體於臨時省議會成立四個月後組織之。

第九十四條 一等市直接受省政府之監督。

第九十五條 一等市設市長一人，由全市公民直接投票選出，任期二年。

第九十六條 一等市設市議會，由全市公民直接投票選出之議員組織之，其選舉及組織法另定之。

市議會議員得適用本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之規定。

第九十七條 一等市設市委員會以市長爲委員會長。凡市之行政方針，須由委員會議決施行。委員會之半數，由市議會選出。其他之半數，由市長從職業團體中擇任之。

第九十八條 一等市市政公所之專務職員，由市長經委員會之同意聘任之。

第九十九條 一等市之公民，對於市之重要立法，有直接提案及總投票之複決權。其方法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條 在不抵觸省法令之範圍內，一等市有左列各事項之自治權：

- 一、市以內之教育與教育相聯屬之事項。
- 二、市以內之街道水溝及其土木工程事項。
- 三、市以內之電燈、煤氣、自來水、電車，及其他關於公益之營業。

四、市以內之警察、衛生、及各種公益慈善事項。

五、其他依省法令賦與或由省政府委託市執行處理之事項。

- 第一百零一條 一等市受省政府之監督，得制定左列各種市稅。  
(一)房屋稅(二)車馬稅(三)戲院及其他各種遊藝場稅(四)屠宰稅(五)酒館稅(六)附於省稅之附加稅(七)其他稅則得省政府之許可者。
- 第一百零二條 一等市受省政府之監督得募集市債。
- 第一百零三條 二等市之組織得適用本約法自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之規定，但受縣政府之監督。
- 第一百零四條 二等市之自治權，得適用本約法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條之規定，但以不抵觸省及縣之法令為範圍。
- 第一百零五條 一二等市之制度以法律定之，但在不背本約法之範圍內，一二等市可自定其制度，經省議會認可施行。
- 第一百零六條 三等市及鎮之組織，以法律定之，但得斟酌各地方情形，自定其組織，經省議會認可施行。
- 第一百零七條 凡市鄉之收入支出，每年須詳細公布之。

#### 第十四章 省憲法之制定

- 第一百零八條 「自治政府」成立後，應於四個月內設立制憲籌備處，組織省憲法起草委員會，延聘省內外精通法學者十人，「草訂省憲法」，限一個月內起草完竣。
- 第一百零九條 「省憲草案」訂成即召集省憲審查會。  
省憲審查員，每縣直接選舉一人。但錢糧額數在二萬兩以上者，得選舉二人，選舉法另定之。省憲審查期間，自審查會成立之日起，不得過三個月。
- 第一百一十條 省憲審查完竣後，提付全省公民總投票，以過半數之可決，公布施行。但總投票之期，以三個月為限。
- 第一百一十一條 制憲程序法另定之。

#### 第十四章 附 則

- 第一百十二條 省憲法及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華民國現行法律及基於法律之命令，與本約法不相抵觸者仍得適用於本省。
- 第一百十三條 因本約法所發生之爭議，由高等審判廳解釋之。

- 第一百十四條 「聯省政府」未成立以前，本省應歸於國之事權，得由本省議決執行之。
- 第一百十五條 「聯省政府」未成立以前，本省應歸於國政府之國稅，得由省政府徵收之。但徵收額數，與其用途，仍須編入省預算案內，經省議會議決。
- 第一百十六條 依本約法所定之地方初級審檢廳，至遲須於「自治政府」成立後二年內設置完備。
- 第一百十七條 「臨時省議會」未成立以前，一切法規，暫由自治政府制定施行。
- 第一百十八條 本約法由「湖北自治軍」及志願加入湖北自治軍之本省人民，於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議決公布施行。
- 第一百十九條 本約法施行期間，以「省憲法」制定公布施行之日爲止。
- 第一百二十條 本約法由臨時省議會議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或臨時省總監之提議，經臨時省議會議員總額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三之可決，得增修之。

資料來源：順天時報，民國十年八月十六至二十四日，第四版。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二)本通訊暫定爲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爲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騰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七)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度藏中國檔案之介紹<一>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林 瓊 柔\*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即 Archives Diplomatiques)位於巴黎塞納河畔(Quai d'Orsay), 度藏可觀的法國政治外交文件, 和其所屬二大檔案館, ①為歐洲最重要的談判、協約檔案收藏所在。法國史學家 L. Febvre 說過:「檔案館為歷史的糧倉」, 歷史研究者無法離開檔案, 相對搜集與保存檔案亦為一大工程。1680年創立至今, 它不僅成為研究法國外交問題的重鎮, 更為法國歷史、文化、藝術研究者的寶庫。

該館所藏關於中國檔案涵蓋之時間, 上起1793年, 下迄1955年, 其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檔案最為豐富, 但因1949年起兩岸政治關係微妙, 法國在整理公開此時期檔案時, 採取保留態度。

本文主要將該館所彙編之檔案, 分為清末和民國兩時期, 依年代逐類作一簡介, 為讓讀者對該館資料有一概略印象, 亦將各檔案內容簡列於下。

壹、清末時期(主要為1840年起至1902年止)之檔案, 主要為法國駐華各地領事報告, 依其性質整理分屬於六大類。

A. 商務及領事報告(1824-1902), 多為五口通商口岸開放後之中法商約交涉過程, 及對清朝貿易條件的評估報告; 計有廣州、臺灣、福州、香港、龍州、蒙自、寧波、北海、北京、上海、煙臺、重慶、天津卷, 其中以北京(1858-1901, 共9冊)和上海(1847-1901共16冊)兩案卷最為豐富, 保存大量法國租界地時期的重要資料。

---

\* 作者為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

① 此二檔案館為: Nantes (南特) 的 Archives rapatriées (早期法國保護領地及駐外單位所有遣返案卷); Colmar (科爾馬) 的 Archives de 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L'Allemagne et en Autriche (法國佔領德、奧檔案)。

- B. 外交通訊 (1840-1896) , 爲法國派華各使節與法政府往返信件, 依任職時間, 將各人書信整理分冊。
- C. 領事報告 (1848-1918) , 此檔分爲中國與上海兩案卷, 上海一卷上起1848年, 下迄1895年, 計有15冊; 中國一卷上起1858年, 下迄1895年, 爲上海除外之在華各地領事報告, 計有11冊; 由於1897年至1918年間的領事報告 (C. P. C. ) , 範圍廣泛, 內容分類詳細, 所以其相關案卷, 已併入 *Nouvelle Serie* (新檔案) 內。
- D. 回憶錄及 (亞洲) 文件, 內含1724年起至1888年間的私人手札, 對中國當時文化背景有多方面的調查和看法, 外交文件偏重於中國與列強的早期關係, 儘管內容瑣碎, 卻是使用價值相當高的史料。
- E. 雜項檔 (1840-1895) , 涵蓋大量法租界地時期的文化、教育各層面及保教問題案卷, 尤其早期學習外國兵法, 籌購外洋船砲, 設立西式學堂與軍火走私的資料, 甚爲可觀。
- F. 商務雜項檔, 主要爲1902年以前法國與各國貿易概況, 關於中國部分, 整理於 328-345 函號內; 1902年以後商務檔已併入新檔案內 (*Nouvelle Serie*) 。
- I. 檔別 (*Serie*) : *Correspondance Consulaire et Commerciale (de 1793 à 1901.)*  
商務及領事報告 (簡稱C. C. C. ) 。

分目名稱(Sous-Serie)	冊 號	起 訖 年 月
CANTON (廣州)	1	1824~1844
	2	1845~1865
	2-bis	1847~1849
	3	1866~1877
	4	1878~1889
	5	1890~1901
FORMOSE (臺灣)	1 港、不分冊號	1897~1899



<b>FOU-TCHEOU</b> (福州)	1 與 Ning-Po 同一卷 2 3 4	1865~1874 1875~1883 1884~1892 1893~1901
<b>HANKEOU</b> (漢口)	1 2	1863~1875 1883~1901
<b>HONG-KONG</b> (香港)	1 2 3 4 5 6	1858~1869 1870~1877 1878~1888 1889~1892 1893~1896 1897~1901
<b>LONGTCHÉOU</b> (龍州)	1 2	1889~1894、6月 1894、7月~1901
<b>MONGTSE</b> (蒙自)	不分冊號	1889~1901
<b>NING-PO et FOUTCHÉOU</b> (寧波、福州)	1 與福州1.同	1865~1874
<b>PAK-HOI</b> (北海)	1 2	1888~1895 1896~1901
<b>PÉKIN</b> (北京)	1 2	1858~1863 1864~1866

	3	1867~1868
	4	1869~1877
	5	1878~1886、3月
	6	1886、4月~1889
	7	1890~1896、9月
	8	1896、10月-1898、9月
	9	1898、10月~1901
SHANGHAI (上海)	1	1847~1851
	2	1852~1856
	3	1856~1860
	4	1861~1864、2月
	5	1864、3月~1866、4月
	6	1866、5月~1867、9月
	7	1867、10月~1868、4月
	8	1868、9月~1869、6月
	9	1869、7月~1873、6月
	10	1873、7月~1875、6月
	11	1875、7月~1877
	12	1878~1883、7月
	13	1883、4月~1885、3月
	14	1885、4月~1892
	15	1893~1897
	16	1898~1901
TCHÊ-FOU (芝罘、煙臺)	不分冊	1897~1901

TCHONG-KING (重慶)	不分冊	1896~1901
TIEN-TSIN (天津)	1	1863~1876
	2	1877~1901

II. 檔別 (SERIE) :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l'origine à 1896.)  
(1896年前) 外交通訊 (簡稱 C. P)

分目名稱 (Sous-serie)	冊 號	起 訖 年 月	內 容	
Chine (中國)	1	1840~1844、9月	法駐華總領事 Barrot, 及 Challaye, Le febvre de Bécourt 等資料及書信	
	2	1884、10月~1847、9月	領事 De Bécourt, 商業代表 Le b <sup>on</sup> Forth Rouen (陸音) 之書信	
	3	1847、9月~12月	"	
	4~9	1848~1850、4月	Fouth-Rouen (陸音)	
	10	1850、4月~12月	Forth-Rouen 和商務代表 Codrika	
	11	1851	Codrika 和全權公使 Bourboulon (布爾布隆)	
	12	1852	Bourboulon (布爾布隆)	
	13~16	1853、1月	Bourboulon 和上海領事報告	
			1855~9月	Bourboulon 和上海領事報告

17~19	1855、10月~ 1856、12月	商務代表 Le c <sup>o</sup> De Courcy (看頁思)
20	1857	Courcy, Bourboulon
21	1857	特派員 Le b <sup>on</sup> Gros (葛羅)
22	1858	全權公使 Bourboulon
23~26	1858	特派員 Gros
27~28	1859	全權公使 Bourboulon
29	1859	特派員 Gros
30~32	1860	全權公使 Bourboulon
33~34	1860~1861、3月	特使 Gros
35~36	1861	Bourboulon
37	1862	Bourboulon 和商務代表(哥士著) Kleczkowski
38	1863、1~4月	Kleczkowski 和全權公使 Le b <sup>on</sup> Berthemy (柏爾德密)
39~40	1863、1864	Berthemy
41	1865~1866、7月	Berthemy 和商務代表 De Bellonnet (柏洛內)
42	1866、8月~1867、7月	Bellonnet 和全權公使 Le c <sup>o</sup> de Lallemand (蘭盟)
43	1867、8~12月	Lallemand
44	1868	Lallemand 和商務代表 Le c <sup>o</sup> de Rochechouart
45~49	1869~1871、7月	Rochechouart (羅淑亞)

50~51	1871~1872	一等秘書 Rochechouart
52~53	1873~74	全權公使兼特使 F. de Geoffroy, (熱福禮)
54	1875	Rochechouart
55	1876	全權公使兼特使 Le v <sup>o</sup> Brenier de Montmorand (白羅尼) 和秘書 de Roquette
56~57	1877~1879	Le v <sup>o</sup> Brenier de Montmorand
58	1880	一等秘書 Patenôtre (巴特納)
59~61	1881~1883、6月	全權公使兼特使 Bourée (寶海)
62~63	1883、7月~12月	法國政府臨時代表兼特使 Tricou (德理固)
64	1884、1月~6月	秘書 Le v <sup>o</sup> de Sémallé (謝滿祿)
65~68	1884、7月~1885	全權公使兼特使 Patenôtre
69	1886、1月~7月	上海總領事 Cogordan (戈可當), Kraetzer
70	1886	Kraetzer
71	1887	全權公使兼特使 Constans (恭斯當)
72~76	1888~1890	全權公使兼特使 Lemaire (李梅) 一等秘書: Souhart

77~78	1891、1月~7月	總領事兼使團 商務代書 Ristelhueber (林春)
79	1891、8月~12月	Lemaure, Ristelhueber
80~83	1892~1893	Lemaire
84	1894、1~5月	全權公使兼特使 Gérard (施阿蘭) 和 Lemaie
85~96	1894、6月~1896	Gérard

III. 檔別 (Serie) :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s consuls (1848-1918.)  
領事報告 (簡稱 C. P. C.)

分目名稱	冊 號	起 訖 年 月	內 容
Chine (中國)	1	1858~1869	Canton (廣州)
		1863~1869	Hankéou (漢口)
		1863~1869	Hong-Kong (香港)
		1867~1869	Ning-Po (寧波)
		1863~1869	Tien-tsin (天津)
Chang-hai (上海)	1 2 3 4 5 6	1848~1851、3月	
		1851~1854、11月	
		1855~1859	
		1860~1864	
		1865~1867	
		1868~1870	
Chine (中國)	2	1870~1876	Canton, Hang - Kéou Hong-Kong Foutchéou

	3	1877~1881	Tien-Tsin
	4	1882~1886	Canton, Foutchéou
	5	1882~1892	Canton
	6	1884~1892	Foutchéou
	7	1889~1892	Tien-Tsin (1877~1883 年間無任何報告)
	8	1887~1889	Long-Tchéou
	9	1890~1892	Canton
	10	1889~1892	Canton
	11	1883~1893	Mong-Tsé
	12	1893	Hang-Kéou 1883~1893 Pak-Hoi 1887~1893
	13	1894	Canton, Long-Tchéou Mong-Tsé, Tien-Tsin
	14	1895	除上海之外所有領事館
	15	1895	Canton, Fou-Tchéou, Hang-Kéou
			Long-Tchéou, Mong-Tsé Pak-Hoi, Tien-Tsin Tong-King
Shanghai (上海)	7	1871~1875	
	8	1876~1881	
	9	1882~1883、4月	
	10	1883、5~12月	
	11	1884	
	12	1885	
	13	1886~1890	

14	1891~1892
15	1893~1895

1897-1918年間的領事報告 (C. P. C.)，範圍廣泛、分類詳細，所以其資料，已歸併在 Nouvelle Serie (新檔案) 下，請閱此檔 1-612 部份及補充檔案 613-620 冊。

IV. 檔別 (Serie) :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回憶錄及 (亞洲) 文件

分目名稱 (Sous-serie) : Chine (中國)

冊號	起訖年月	內 容
4	1840~1845	a. 鴉片貿易報告 (1840年) b. 英國貿易在中國調查報告 (1843年) c. 1843年12月12日前，關於法國使團在中國之簡報。 d. 簡報從 Guizot 到 Le Roi 駐華時期，法國與清廷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e. 給全權公使兼特使 M. de. Lagrené (刺蓐尼) 的指示及密談紀錄 (1843年) f. de Lagrené 給 Guizot 的信：特別指示 1843~1844 年清廷與法國談判問題 (關於中法黃埔條約) 計有 321份重要原稿。
5~9	1843~1846	全權公使兼特使 Théodore de Lagrené 和其使團的通信文件 第 5 冊共有 282份文件 第 6 冊共有 403份文件 第 7 冊共有 421份文件 第 8 冊共有 455份文件



		第9册共有 459份文件
10	1872~1873	關於天津條約中賠款問題之記錄
11	1862	關於天津條約中，計有92份文件。
12	1724~1886	宗教問題，計有 492份文件。
13	1843~1846	Lagrené 使團之通信文件，計有 479份文件。
14	1844	Lagrené 使團；關於通商問題共有 448份文件
15	1843~1846	Lagrené 使團；商業代表通信文件及清廷與列強所簽訂之條約等。計有 387份文件。
16	1794~1886	a. 外交及領事編制 b. 租借地及外交禮節問題等，計有 527份禮節問題等
17	1793~1855	a. 中國與英國所簽訂之條約； b. 歐洲代表(1850)； c. 中國、韓國、日本三國調查報告。中俄關係(1852~1853) 等計有 426份文件
18	1857~1869	a. 中國的回教簡介 b. 1840年後中國政府的導向摘要(1857) c. 1858年天津條約之摘錄 d. 中國海關的外籍人員職位 (1863) e. 保護法僑問題 f. E. Simon 四川之旅報告 (1863) g. 中國的慈善機構 (1865) h. 剿治海盜問題 i. 修訂各條約 (1869)
19	1870~1883	a. 修訂各條約之相關文件 (1870) b. 天津大屠殺 (1873) 中國糾紛問題 (1874)，海盜問題 (1876)。 c. 煙臺條約

20	1884~18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d. 中國調查報告 (1880)</li> <li>e. 廣西官員密呈清廷內容 (1882)</li> <li>f. 法僑在中國；中法談判摘要 (1883)</li> <li>a. FERRY 與中法談判</li> <li>b. 履行中法天津條約 (1884)</li> <li>c. 中法上海會談；中國賠款</li> <li>d. 海軍司令 Courbet 和 Déjardin 的通信文件(1884~1885)</li> <li>e. 中法條約草案</li> <li>f. 赫德(Hart) 與金登干 (Campbell) 通信編號(1855)</li> </ul>
21	1814~1846	商務、海關和中國外貿
22	1861~18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a. 商務和農業</li> <li>b. 中商務談判</li> <li>c. 中法通商條約草案 (1883)</li> </ul>
23	1836~188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a. 中國海關條文</li> <li>b. 廣州；基隆</li> <li>c. 法使團與蒙自 (Mong-tsé) 地理報告</li> <li>d. 穿鼻草約 (Règlement de Hong-Kong) (1842)</li> <li>e. 中英條約中關於外國人居住廣州問題，及英人撤離舟山島 (1846)</li> <li>f. 英人在中、日兩國領事裁判權 (1869)</li> <li>g. 中國的宗教設施 (1869)</li> <li>h. Frandon 對中國兵力調查報告 (1883)</li> <li>i. 中法和議 (1885)</li> <li>j. 英占巨文島 (l'archipel Hamilton) (1885)</li> <li>k. 1885年、7月18日中英煙臺續約</li> <li>l. 比利時在華工業計畫 (1886)</li> </ul>

24	1841~1846	m. 煙臺的法租界地 (1886) n. Cogordan 使團在中國 (1886) 此案卷置於本檔、韓國分目下第55冊 o. 兩廣總督致駐廣州領事函 (1886) p. 中國開放通商口岸所在地簡介 q. 中越關係 (1886) r. 廣西兵備 s. 保護各國傳教士 (1888) Dubois-Jancigny 在中國沿海調查報告
----	-----------	--

V. 檔別 (Serie) : Affaires divers 雜項檔

分目名稱 (Sous-serie) : Chine (中國)

冊號	起訖年月	內容
1	1840~1843 1843~1844 1849 1849 1850 1850~51 1851 1851 1854~1855 1855 1856 1857~1858	Bellé 請求外交、經濟、工業使團至中國 Lagrene 使團之行 新加坡法領事答覆書 關於出征中國 英國傳教士 Grutzlaff 法船 Albert 號被劫，船長被殺案 各國傳教士的請願書 法傳教士的請願書 上海關；上海貿易 中國移民問題 (華工問題) 清廷撥一萬兩給中法軍克上海有關法兵 廣東貿易；M. Celtibère 的建議書

	1857	荷人對中國貿易的建議
	1857~58	封鎖廣州
	1858~59	分配戰利品
2	1861	a. 收集並歸還戰役中所獲的中國重要文件資料 b. 教務案 c. 經俄路傳送通信文件至北京 d. 賠款
	1862	a. 英對中國態度 b. 通州教案賠款 2000 兩 c. 清廷希雇用一法人教授兵法
	1863	a. 大沽租借地 b. 1857年英船“Surprise”在廣州河岸襲奪事件 c. 法軍在印度支那的兵力
	1863~64	提供中國軍備設施
	1863~67	法人 Le Génissel 在法採購軍備設施
	1864	外國使團
	1864	招聘警務人員至法國租借地
	1864~67	遣使會會士請求歸還所購地案
	1865	a. Le Buthon 賠款案 b. Mme Kenney 給中國皇帝請願書 c. Pépin-Bulter 事件
	1866	上海法租界地，市議會章程記錄
	1866-67	日意格 (Gicquel) 和參將德克碑 (d' Aiguebelle)：與左宗棠訂約設立海軍學校和製造局
	1859~1860	科技代表：d' Escayrac de Lauture

	1864	煙臺案； 上海法國警察
3	1874 1875 1874 1873 1872 1873 1873  1872-73	天主教教士被襲案 海軍准將 Krantz 的報告書 上海中法衝突案 派遣修女前往北京； 東方應用語言學校 摘錄當地報紙新聞 中國苦力；古巴調查案 a. 崇厚 b. “Times”報載與中國通商問題 c. 覲見問題 d. 天津賠款 e. 撤銷駐北京武官 a. 瑞僑保護案 b. 福州船廠 c. 駐北京武官 M. de Contenson d. 北京的天主教堂 e. 奧、匈使團 f. 清皇帝接見外國代表 g. 英國出征中國 h. 臺灣
4	1883  1881 1877	前任駐上海德國領事 暨德國商會總秘書 Anneck 報告書 中國政治外交問題 日意格 (Gicquel) 與福州船政學生

	1870	天津賠款
	1865~1880	耶穌教教士 M. Pitor 要求駐北京使館，簽發護照
	1880	福州人民聲明土地不得轉讓
	1878~1881	允許印度支那諸國貨幣在中國流通
	1880	崇厚定斬案
	1881~1882	M. Gauvain 調查報告
	1883	a. 中國海關 b. 重整駐北京法領事館 c. 駐守北京 d. 通商口岸之海關
	1880	駐香港教皇使節佔廣州土地案
	1878	傳教士 Le R. P. Jean Coursières 被擊斃案
	1878	安南與中國外交報告
	1882	上海法文報紙創立案
	1879	中俄交涉兩國邊界問題
	1877	海軍上將 Véron 在中國海峽傳捷報
5	1884	a. 中國所需之軍備 b. 中國實業公司 (China Merchant Cie) c. 廣州糾紛案 d. 中國借款
	1885	a. 傳教士在中國 b. 中國海關 c. 戰時走私品：米及鉛彈 d. 前往中國之炮艦 e. 阿古柏案 (Hakinbey) f. 廣西、雲南、貴州三省人口概計

		g. 韓國
	1884	a. 海軍中校 Fournier 返回馬賽 b. 中英兩國條約：舟山島特務報告 c. Conraux 神父在滿州被襲案 d. 韓國
	1885	a. 戰時前往中國軍火走私品 b. 法蒙文字典 c. 贈光緒皇帝之書籍
	1884	兩廣內地之法國傳教士
	1883~84	a. 中國軍力 b. 給 M. Ouang-Fou-Tchoung 到 Sevrav-Livry 火藥廠實習同意書
	1883	a. 法使團代表與天津協議 b. 法兵在中國被囚案 c. Montigny 陳情書 d. 義大利政府對保教案的態度 e. 遣中國士兵至北圻邊境
	1885	a. 中國人請求簽發安全通行證 b. 堅持法國軍駐紮天津 c. 對中國鐵甲船“Le Pingon”的認知 d. Glasgow 會議與中國西南鐵路 e. 臺灣海關與礦產 f. 1876年中英協議與鴉片問題 g. 英人佔巨文島
6	1885	a. 西貢翻譯學校 b. 慈禧太后對設立海軍衙門的看法

1886

- c. 駐北京武官的回訊
- d. 俟教案
- e. 裝訂「外交領事報告」關於中國金融、貿易部份
- a. Le Creuzot 出讓大口徑槍給中國；
- b. 訂購裝甲板
- c. 兩廣總督對立的態度
- d. 柏林東方語言學校
- e. 法國屬地商業調查團
- f. 前任使英大臣曾紀澤巴黎之行
- g. 中國政府訂購軍艦及挖泥船
- h. 英俄兩國對西藏的野心
- i. 上海公費法國學校
- j. 遠東海軍艦隊
- k. 國際教師協會開中文課程
- l. 煙臺租借土地給方濟會教會
- m. 兩廣間開闢鐵路計畫
- n. 運送地圖至北京使館
- o. Constans 使團時期的特派員
- p. 法韓條約
- q. 重慶傳教士陳情書
- r. 中英兩國的續約
- s. 中國創立海軍衙門
- t. 狼山 (Langson) 電線計畫
- u. 中葡兩國通商交涉
- v. 出版中國字典
- w. 北京設立教廷使館計畫
- x. 德國工程師在中國



7	1889	a. 法國工業使團成員錄 b. 蘆漢鐵路對法借款 c. 法國的中國留學生 d. 中國政府對英藏衝突的態度
	1888	a. 傳教士護照風波 b. 治外法權 c. 海南島排華暴動與派遣軍隊
	1887	a. 兩廣總督對中越邊境問題的態度 b. 在北京建造天主教教堂 c. 中國駐巴黎使館人員被辱案 d. 德軍計畫圍攻舟山羣島 e. 法國學校招收的中國學生 f. 廣西糾紛案 g. 煙臺保教問題 h. 1881年2月12日之中俄伊犁條約 i. 上海法國學校 j. 保教案 k. 長江的英輪業務
	1888	a. 反對「中國實業公司」的陳情書 b. 總理衙門
8~12b	1890~1895	雜項檔補充資料

VI. 檔別 (Serie) : Affaires diverses commerciales (Antérieures à 1902)  
(1902年前) 商務雜項檔

分目名稱。(Sous-serie) : Chine (中國)

此檔關於中國部分，藏於 328-345 函號內，為1887至1902年間通商細目；1902年以後之商務檔已歸併於新檔案內 (Nouvelle Serie)。

# 俄羅斯檔案館中保存的 有關中國的材料

A. M. Grigoriev\*

## 緒 言

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國發生的政治變革導致了主要的檔案資料管理的巨大變化，為國內外的研究人員研究和使用的檔案文獻及材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那些涉及中國的文獻資料，以前大部分是不公開，作為祕密文件保存的。

1991-1992年俄羅斯檔案管理機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一，大多極其重要，曾經隸屬於各政府機關，按規定對研究人員封閉的檔案庫如今被納入統一的國家檔案管理體系，該體系在全國範圍內歸屬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管理處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Archival Service) 管轄，(1991-1992年該檔案管理處的名稱是國家檔案文件管理委員會)。其二，這一點更其重要，為適應現有的國際實踐作出了有關決定，其目的在於使俄羅斯及國外的研究人員更廣泛地接觸那些從前不公開的館藏資料，這意味着在實際工作中依據新的檔案管理法公開大量文獻資料（既包括那些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資料，也包括至今仍保留在各政府機關檔案庫中的文件）。

1993年開始實行的《關於俄聯邦檔案館館藏及檔案館庫管理的基本法》規定大部分檔案資料的保密期限為30年。以下資料例外：涉及國家機密的文獻，其公開有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損害；需要特殊對待的還有那些私人性質的資料。後者的保密期限為75年，其使用需徵得當事人，其親屬或委託人

---

\* 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

的許可。

時至今日這些措施為更廣泛地利用那些從前保密的文獻資料並付諸發表開闢了道路。與此同時，應該指出的一點是，在公開檔案資料的過程中邁出的還僅僅是第一步。其中存在着一些障礙，包括技術性的困難。首先，公開祕密的過程本身即需要一定的時間，譬如，需要把私人性質的文獻與其它文獻區別開來，而在許多檔案館中這樣的文獻常常保存在同一份卷宗之中。其次，大部分如今公開的，而曾經隸屬於政府機關的檔案館並不準備向大量的研究人員提供服務。這些檔案館中的大多文件為孤本，紙張陳舊，沒有作成縮微件，在不小心或是經常使用的情況下有可能被徹底毀掉。另有一些館藏，因為不允許閱讀，所以至今未經整理，沒有詳細歸檔。目前我國各文化機構，包括檔案館，所面臨的財政困境阻礙了吸收新的研究人員，獲取整理館藏所必需的技術設備，無法擴大貯藏空間及讀者閱覽室。

由於各檔案館中有關中國的資料極其豐富，況且我的報告的容量和時間有限，所以我只能最概括地介紹一下莫斯科市各檔案館的主要館藏的內容，無疑，這些館藏資料最為重要，也最能引起我們的注意。

此外，我想集中地敘述莫斯科市各檔案館中保存的20至40年代的文獻資料，由於我的職業的興趣，這個時期的資料更為我所熟悉。當然，我將盡我所知回答與其它時期有關的問題。

涉及中國各個方面的資料，有關其對外政策，俄中、蘇中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關係的資料，按規定，可以在各檔案館中查閱到，因此只有在研究所有主要檔案館館藏資料以後，才可以對有關同一時期、同一問題的已有文獻構成一個完整的印象。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談談各主要檔案館的專業方向及其館藏資料的特色。

據此，我想採用敘述我所知道的莫斯科市主要檔案館館藏資料的形式來建構這篇有關中國的檔案文獻的綜述報告。我認為，此篇報告採用這種結構，同時提供的各個檔案館工作規章的信息會對你們的實際工作有所幫助。

保存着有關中國的資料的莫斯科市主要檔案館（歸屬國家檔案管理處）有以下幾個：

-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Archive)；
- 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 (Russian National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
- 現代史文獻保存研究中心（簡稱：現代史文獻中心）；(Russia

Center of Conservation & Study of Records for Modern History)

——當代文獻保存中心（簡稱：當代文獻中心）；（Storag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ation）

——歷史文獻收藏中心；

——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Archive）。

除此以外，有關中國局勢問題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首先是關於俄羅斯與蘇聯對中國關係問題的文獻，有關俄中關係、蘇中關係問題的文獻保存在俄聯邦外交部的兩個檔案館中，它們是：

俄羅斯或俄羅斯帝國對外政策檔案館（Russian Foreign Policy Archive）（1917年以前）；

俄聯邦外交部檔案館（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其直接歸屬俄聯邦外交部歷史文獻局領導。

在俄羅斯各機關檔案館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還有總統檔案館，其中保存着一些高層次的重要資料，如蘇共中央政治局議定書及決議的真本，史大林的檔案文件，他的通信，留有他批示的文件，等等。該檔案館只對總統的行政機構開放，按規定，對其它研究人員保密。

在其它開放的，也擁有中國方面資料的部門檔案館中，應當提及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chive）。

現在我們來談談這些擁有中國方面資料的檔案館的主要館藏情況。

對於研究蘇共及蘇維埃政府對中關係政策，研究對此類問題作出決議的過程的專家而言，以下兩個檔案館的資料會讓您滿意：現代史保存研究中心以及當代文獻保存中心。前者即是原來的（1991年前）蘇共中央馬列研究所中央檔案館（Central Party's Archive）。根據國家檔案委員會的決定，該檔案館中應當存貯以下文獻資料：蘇共中央機關文件，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組織局、蘇共中央全會及黨的代表大會的文獻資料，以及中央委員會各部的材料，存貯文獻的期限從建黨初期開始至1952年（包括1952年）。

1917年以後由於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爲最高決策機構，因此，一切國家權力機構，前蘇聯各局各部以及共產國際的活動都取決於政治局的決定，自然，蘇共中央政治局和全會有關中國的文件（記錄及決議）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材料，它們對於研究俄共及蘇聯國家政策、研究領導層內對中國政策、對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論爭很有價值。

許多決議，其中包括關於中國的決議，當時屬於機密文件，需要特殊保管。所以時至今日政治局的記錄文件中常可見到「特別卷宗」的記號，這說明此類決議目前保存在總統檔案館中。某些決議是依據什麼制定出來的，有關這方面的參考資料大多數情況下沒有，參考資料指電報、信函及文件草案等。尋找到這些資料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務之一。與此同時，這些材料以及20年代蘇共中央全會上作出的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今天正在不斷揭開許多謎，有助於理解蘇聯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譬如，在列寧祕書處檔案文件中我們發現了以前未發表的越飛（Adolf. A. Joffe）1922-1923年由中國和日本發回的政治函件，在同時期的政治局檔案文件中找到了最早的蘇共對華政策的決議。

該檔案館近年來對研究者公開的資料中可以找到1924年至1934年史大林寫給莫洛托夫的信函，其中有幾封（1926、1927及1929年）反映了史大林對中國發生的事件立場，他對於1927年夏季，即國共兩黨分裂之際中國共產黨前途的看法。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有關中國的檔案文獻為我國及國外學者所關注，其原因恰恰在於此處保存着共產國際的檔案文獻，其中包括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

共產國際檔案文獻中與中國有關的資料可以區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共產國際領導機構，首先是其代表大會及全會的文件，如記錄，速記筆記及決議。在代表大會及全會上對中國問題開展討論而留下的文獻資料的大部分當時（20-30年代）曾用俄語發表，一部分用英語及其它西方語言發表。因此，曾經出版的文獻資料有第二、三、四次代表大會的文獻，第五、六次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第六、七、十、十一、十二及十三中全會的速記記錄，在這些會議上重點討論的是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問題。

與此同時，至今尚未出版並且僅有部分使用的資料有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獻（1935年），在此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了向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立場；沒發表的還有第八、九中全會的文獻，在這兩次全會上中心議題是關於中國政策的問題。還有一些文獻資料研究得也很少，如籌備召開代表大會及全會的資料及所謂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問題委員會的資料，這些委員會的建立是為對中國政策諸多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另一類文獻資料指共產國際執委會各個領導機構的文獻，如主席團的文獻資料（1920至1934年），政務書記處文件（1926至1935年），共產國際執

委會書記處文件（1935至1943年）。以上各領導機構在不召開代表大會與全會的時間空檔裏討論並通過了一系列重要決議與黨的指示。以上種種文獻資料中包括（儘管不總是這樣）討論有關問題的備忘錄，會議籌備資料和參考資料，以及各項決議的原件。

共產國際執委會檔案文獻中還包含有如下文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1920-1926年）與東方書記部（1926-1935年）文獻，這兩個處的工作重點放在研究中國政策問題上；東方部遠東局的文獻資料（遠東局創建於1923年1月，192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辦公，之後，即1925至1927年辦公地點在中國）；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的代表們的文獻資料（1928年以前），這些代表是馬林（Maring），吳廷康（Voytinsky），鮑羅廷（Borodin），羅易（Roy），羅明納茲（Lominadze），洛蜀·莫娃（Razumova）；遠東局與其在中國的代表（1929至1935年工作於上海的代表們）之間的通信及其它材料。在這些檔案文獻中還有代表們從中國寫回的報告書，政治及軍事顧問通告的各種消息，如關於中國生活的各個層面，關於各個團體與政治力量的活動情況，最主要的是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活動情況。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東方處與東方書記處為共產國際和蘇共的領導機構、中國問題專門委員會提供建議並準備決議草案。中國問題專門委員會是由蘇共、共產國際、蘇聯軍事與經濟部門領導機構的代表組成的。

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材料集中存放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檔案中。這些材料包括黨的中央機構、其地方組織及個別活動家的文件、決策和工作報告，還有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就各種問題進行交流的書信。正是在該檔案文獻中保存着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材料，材料包括委員會籌備資料，代表大會各例會速記記錄，各項決議草案方案，此外尚存有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之後於莫斯科召開的中國代表團會議的速記記錄。

1956-1957年根據中共與蘇共兩黨的協議，中國代表團與中共的大部分文獻資料（尤其是中文資料）被轉交給中國方面，目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檔案館中保管。其中部分已經公開發表，儘管，一般地說，沒有引文。

應當指出，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實際上處於蘇共領導之下）工作人員與蘇聯其他各部門的關係極其密切（這些部門中包括蘇聯外交部與國防部），在共產國際檔案文獻中同樣擁有外交部與國防部的許多重要文獻資料，同樣，在外交部與國防部檔案文獻中也可碰到共產國際的文件。

保管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的共產國際文獻資料中還應分出兩種資料來，一種是共產國際俄羅斯代表團文件匯編（因為俄羅斯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並與蘇共有直接聯繫，故此，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中國代表常常與俄羅斯代表團交往）；另一種資料是共產國際個別領導人書記處的檔案文獻，這些領導人是比亞特尼茨基（Piatnitsky），馬奴依爾斯基（Manuylsky），1935年以後是季米特洛夫（Dimitrov），他本人受共產國際書記處委派監護中國共產黨活動。

在季米特洛夫檔案文獻中能引起特別興趣的是他寫給史大林的信件，這些信件與制定各項中國問題決議密切相關，還有他提出的關於審核這些決議草案、審核回覆中共中央的信函（包括毛澤東的信函）的書信草稿的請求。

我曾經有幸發表了西安事變時期季米特洛夫發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文。我僅想補充一點，實際上，那些最為重要的電報季米特洛夫事先與史大林或是莫洛托夫取得了一致意見。檔案館工作人員正與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合作以共同出版發行 1934-1943 年季米特洛夫與史大林的通信集，集子中將收入一部分涉及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的信件。該集子應於 1995 年問世，有英文與俄文兩個版本。

目前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的收藏正在得到補充，其中包括有關中國的文獻資料，因為創建於共產國際解散以後（1943 年）的蘇共中央國際部的文件轉到了該中心，這些文件中有關於 1944 至 1949 年蘇共中央與中共中央關係的材料及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與書記處的材料。

眾所周知，1945 至 1949 年這段時期在現有研究文章及出版物中以文件形式得以證明的很少，故引起各國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我不期望從政治局與書記處的文獻中得到許多收穫，因為當時，尤其是史大林在世的最後幾年，政治局會議很少時候是全體成員參加，大多問題沒有經過討論。大多有意義的材料，如向史大林本人通報的關於中國的信息，他的批示、書信等，多半集中在總統檔案館中。

在構成共產國際檔案文獻一部分的青年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文件中也有有關中國的材料，保存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與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後稱共產主義）青年聯盟活動的材料同時存在的還有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材料。此外還有有關中國工人運動與工會活動的文獻資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青年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材料中包括一些有關中國共產黨活動的補充材料。

對於研究中共黨史與國民黨史及兩黨與蘇共和共產國際關係的人員而言，能引起很大興趣的還有蘇共與共產國際各科研機構的檔案館藏，這些機構在20至30年代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培養幹部，對中國進行研究。

在中山大學（1928年起改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特別檔案館藏中，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館藏中，在馬列黨校館藏中至今仍有一些材料研究甚少，這些材料是有關在蘇聯培訓的中國人的材料。個別館藏可以提供有關1927至1930年在蘇聯進行軍訓的中國人的信息資料。

有關中國的材料在「反帝同盟」檔案文獻中也可找到。參加「反帝同盟」一系列活動的不僅有中國的共產黨員，還有其他的中國政治活動家，如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擁有關於中國的材料檔案館藏還有以下幾個：革命者國際援助組織館藏，革命作家國際組織館藏，國際工人援助組織館藏，以上各組織的代表曾在中國從事活動。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現有並向研究者發放主要館藏的目錄，目前該中心正準備出版簡明手冊，其中有關於館藏內容的介紹。

如上所述，曾保管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及其國際部檔案館中的有關蘇共與中共兩黨關係及蘇共1952年前對中國政策的文獻資料應當轉交（部分已經轉交）給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但是，迄今為止，一部分屬於1944至1952年這段時期的資料，自然，還有那些有關1952年之後蘇共政治局、書記處及國際部活動的文獻仍保管在當代文獻中心。當代文獻中心是一個新的檔案館，以蘇共中央綜合部檔案館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綜合部檔案館以前保管蘇共中央現今活動的資料。從蘇共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中轉入該檔案館（當代文獻中心）的部分文件（涉及蘇聯與中國兩國及兩黨關係）已被公開，為研究人員所利用。這些文獻中有：提交給蘇共中央，於50年代簽定的各項關於經濟與文化合作的協議草案，各部門駐中國代表的報告記錄，與駐蘇聯與中國的中共代表的談話記錄，關於蘇聯與中國代表團旅行的工作報告，等等。但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蘇共中央國際部各種文件的公開才僅僅剛開始。

有時很難區分，哪些文獻資料是黨的文件，哪些是國家的，因此很自然會產生種種擔憂，擔心一系列有關蘇中關係問題的文獻資料的公開化有可能在目前導致不良後果。與此同時，當代文獻中心也存在一些技術與經濟困難。

該檔案館有一種工作人員卡片，不發給研究者。為預訂所需文獻資料研



究者應制定題目，指出所需文獻的年代等。由檔案館工作人員對文獻進行選擇提供閱覽。

一些對研究者有價值的關於蘇聯的中國政策的材料及關於中國各方面生活的材料，特別是那些關於20至40年代中國政治與軍事政治情況的文獻資料如今保管在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中。該檔案館原名是蘇聯軍事中央國家檔案館。

在紅軍及海軍領導機構檔案文獻中也收藏着有關中國的材料，如俄聯邦及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檔案文獻，軍事司令部及指揮部的檔案文獻，它們20至40年代駐紮在遠東。

在屬於20年代的文獻資料中包含有關於中東鐵路衝突的材料，30年代的文獻中有關於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的記載。

檔案館中最為典型的文獻是最高前線及軍隊指揮部指令，戰報及通報，其中也有諜報性質的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報告，這些材料中特別注意收集的自然是那些關於各個集團軍事力量狀況的資料。

由於在蘇共及蘇聯對華政策中對20至40年代中國各方力量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蘇軍領導層的代表進駐（尤其在20至40年代）各個委員會以解決各種軍事政治問題。看來，恰是為此在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中收藏着20年代中期存在的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或曰蘇共中央中國委員會）的文獻（記錄），這些文獻至今未曾在別的檔案館發現。屬於1925年4月至9月的該委員會的最早十個備忘錄去年發表在《第一集俄羅斯軍事檔案》上。眾所周知，在此之前只發表了該委員會的一份1926年8月4日的記錄，這份記錄夾雜在1927年4月6日襲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時被截走的文件當中。無疑，進一步研究該檔案館的材料不僅會有新的發現，而且將充滿樂趣。

這個檔案館的大部分材料進行了縮微處理，有工作目錄。1992年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出版了檔案館指南，其中對主要開放的館藏資料作了簡要介紹。

在俄聯邦國家檔案館（原稱國家十月革命，國家政權最高機關及國家管理機構中央檔案館）的文獻資料中收藏的有關中國的資料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關於在蘇聯的中國人的活動情況及自願參加蘇聯歐洲地區及遠東地區國內戰爭的中國人的材料，這類材料的一部分50至60年代曾在我國發表；二，全蘇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的文獻，其中有一些相當少見的關於發展中蘇文

化交流（開始於30年代中期，當時莫斯科與南京之間的聯繫很活躍）的材料，還有關於互派文藝活動家代表團，互辦展覽等的材料，在交流的過程中常常討論政治問題。這個檔案館中還有關於50至60年代蘇中與中蘇友協聯絡的資料。

在蘇聯科學院（現名稱為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中收藏有對研究俄羅斯漢學有興趣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關於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蘇聯各科研機構歷史的，還有在科學院及共產主義研究院各機構中就20至30年代中國問題而開展的一系列辯論的文獻資料，如關於中國土地政策，關於孫中山學說的定性等等問題的論爭。檔案館對所有研究人員開放，有館藏目錄及卡片目錄。

最為齊全的關於俄中、蘇中關係的文獻資料，並且迄今為止研究甚少，更不用說納入科學軌道的文獻資料收藏在屬外交部管理的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和蘇聯（現在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

在這些檔案館館藏中有外交文件，如協議、協定，簽訂協議協定之前，俄中20至30年代中央政府及地方政權代表們的談判與談話記錄，駐中國的外交機構及其他蘇維埃機構的工作人員與人民外交委員會及駐北京全權代表處的通信，大使信件及報告，蘇中外交人員談話記錄。

儘管大多數官方文件（協議等）及俄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聯使團領導人與當時中國政治及軍事領袖的通信（20年代）已經發表（個別文件全部，個別文件部分發表），但直到今天仍舊沒有全面、系統地發表諸如孫中山與越飛、加拉罕（Leo Karakhan）通信，越飛與吳佩孚通信的重要文獻。

在闡明鮑羅廷與莫斯科方面函件往來的問題上存在很大漏洞。一般而言，這些函件往來通過1925-1927年駐在北京的蘇聯全權代表處。1932年底莫斯科方面與南京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以前，雙方交往的文件鮮為人知，有關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莫斯科與蔣介石政府聯絡的材料也知之甚少。在現有出版物中對這些事件及雙方立場的闡述很不全面，並且，我們認為，這種闡述帶有明顯的雙方政治立場（及書刊作者政治立場）的印痕。

目前外交部檔案館決定公開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其中包括電訊往來。我們期待將有新的、有趣的發現。目前外交部檔案館尚沒有對讀者開放的目錄或卡片目錄（只有內部卡片目錄），但近年來部分材料作了縮微片，配備了先進技術。

有關蘇中關係的文獻資料，如經濟關係的資料，集中在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中，該檔案館原稱是蘇聯國民經濟中央檔案館。這個檔案館中有國家

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文獻資料。通過該委員會和其由主要經濟顧問帶隊的設在中國的專門代表處，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經濟交往，對經濟、科學與文化各部門提供援助（50至60年代）。

除這些材料以外（這些材料確定援助貿易的規模、期限與具體內容，顧問與專家團組的人員配備等），檔案館中還藏有能引起很大興趣的資料，如蘇聯顧問專家書寫的關於中國經濟及其他國民經濟各部門情況的報告和信息，關於成就及解決各種問題時所遇到的困難的報告。該檔案館中有工作卡片目錄。

在歷史文獻收藏中心（以前稱特別檔案館）存有1945年德國占領期間蘇聯紅軍獲得的資料。這些文獻中有一部分蓋世太保的檔案文獻，其中有蓋世太保在中國の間諜（30年代）收集的部分情報。此外，這個檔案館中有關中國的材料裡有德國人在巴黎獲取的法國諜報工作檔案文件，其中有一些法文材料，是20至30年代由中國發回的諜報。

檔案館有工作目錄卡片。

在各檔案館的工作實踐中現有以下新的改進：一，大部分檔案館設置了學者專家學術機構，聘請各科研中心與俄羅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學者討論工作計劃，參與公開文件的工作，等等；二，各檔案館與俄羅斯科學院下屬研究所簽訂長期合作協議（總體協議與具體協議），以共同制定檔案文獻出版計劃。通過這種合作各檔案館有可能保證文件選擇與整理的必需水平，保證高質量地出版文獻資料。

我們遠東所與俄聯邦外交部檔案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中心、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和當代文獻收藏中心簽有協議。所裏的著名學者加入了這些檔案館的科學委員會。對於我們來說擁有這些關係是重要的條件，它們可以保障我們在新的文獻資料基礎上研究中國問題，研究俄中關係。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學術演講、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 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 1918-1937

丘古耶夫斯基\* (L. I. Chuguevsky) 著

余敏玲\*\*譯

《東方學問題》(Problemy Vostokovedenia)

1959年第四期，頁 71-76

十月革命之前，居住在俄國境內的中國人爲數眾多。他們是來自東北、華北省份打零工的農民、幹粗活的工人，以及一次大戰期間應募擔任後勤的華工和商人等等。①十月革命之後，北洋政府自蘇俄召回了中國公使，同時在西伯利亞與遠東開始了內戰。蘇俄與中國政府的聯繫因而中斷，使大多數的中國公民無法回國。

蘇俄政府爲勞動者——來自東方國家的移民，設立代表機構，以保護他們的權益。在1918年下半年，在莫斯科、彼爾姆(Perm)、彼得格勒、凱薩琳堡(Ekaterinburg)及其他城市紛紛出現了中國工人的工會組織。②1918年12月初在彼得格勒召開俄境內中國工人組織的會議，成爲第一個工人工會大會。③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即座落於從前中國使節團的房舍。蘇俄政府表明支持工會，承認工會有權保護在蘇俄境內中國公民的利益。④

工會的第一屆大會宣告書，以下面的話作爲結論：「由於命運的支配，

---

\* 俄國科學院東方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

\*\* 美國紐約大學博士候選人

- ① 在俄國的中國人口數字，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約有十萬人（見「第三屆全俄羅斯中國工人大會文件」，*Sovietskoe Kitaevdenie*, 1958, No. 1, 頁140）至三十萬人（見 N. A. Popov, 「內戰期間中國國際份子參與保衛蘇維埃共和國，1918-1920」, *Voprosy Istorii*, 1957, No. 10, 頁 110.
- ② *Izvestiya VTsIK*, 1918年10月10日與12月15日。
- ③ *Izvestiya VTsIK*, 1918年12月15日。
- ④ *Pravda* 和 *Izvestiya VTsIK*, 1918年12月15日。

今日在俄國的中國工人處於世界革命的先鋒地位。他們應該記住：中國革命的前途和俄國工人的革命命運生死與共，只有密切地與俄國工人階級聯合，中國被壓迫者的革命才有勝利的希望。」<sup>⑤</sup>

1918年在紅軍中成立了人數眾多的紅軍中國隊。他們在紅軍中負責的一般任務是宣傳。中國紅軍對時事興趣濃厚，因而迫切需要以其母語出版刊物。但當時政治機關所能提供的，只有1918年1月出版的「關於和平法令」的翻譯。<sup>⑥</sup>

在蘇聯出版的第一份普羅中文報紙是石印雙週刊「華工報」。<sup>⑦</sup>「華工報」於1918年上半創刊，由中國工人北方省份工會執行委員會出版，在彼得堡的瓦西里島（第九大街18號）茲洛尼可夫（F. Zlotnikov）印刷廠印刷。編輯是張成海（譯音，Chang Cheng-khai）。<sup>⑧</sup>1918年12月中國各組織合併，使該報成為中國工人工會的機關報。

遺憾的是，就目前所知，只找到一份「華工報」。這是在蘇聯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東方學者檔案史米卡洛夫（G.F. Smykalov）教授檔案中找到的。<sup>⑨</sup>以這一期來判斷，報紙共發行二張，版面大小為74×50.5公分。第一版刊登的專欄有：國際新聞、國內新聞、告勞動者書、廣告啟事、小故事、政府與人民。第二版類似「無盡智囊」篇：內容有關於中國與蘇聯各式各樣的統計與參考新聞等。

稍後，「華工報」易名為「大同報」。改名（1920年初）的理由是因為該報在1919年底之前，已在紅軍中國部隊內廣為流傳。<sup>⑩</sup>

蘇聯外交部對外政策檔案館仍存有一份「大同報」（1920.4.1., No. 27 (3)）。倘若括號裏的「3」是報紙易名之後出版的期數次序，那麼在1920年的前三個月已經出版了二十四期的華工報。<sup>⑪</sup>由此可見，由原來的每週出刊一期，變成每週出刊兩期。這應是讀者對報紙的興趣提高，使得出刊次數跟著增加。

⑤ 同上。

⑥ *Izvestiya VTsIK*, 1918年10月10日。

⑦ *Izvestiya VTsIK*, 1918年10月17日。從所藏的二期合刊（No. 8-9）來看，令人懷疑出版不定期。

⑧ 報紙上印的是 Dzhan Dzhen-khai。

⑨ LO IV AN SSSR 的東方學者檔案。f. 97, op. 2, ed. khr. 74.

⑩ *Izvestiya VTsIK*, 1919年11月19日。

⑪ 參見 G. Novogrudsky 與 A. Dunaevsky 「Pau Ti-san 及其同志」*Novyi mir*, 1959, No. 4, 頁129。

按時間順序，「華工報」之後的報紙是「華工醒時報」；由在赤塔的遠東蘇維埃工會印行。報紙每月十五、三十日各出刊一次。由現存於列寧圖書館的「華工醒時報」推斷，第一期應該是出刊於1922年3月15日。<sup>⑫</sup>報紙是在國家證券發行所印刷廠印刷。形式是四張，25×34.5公分。「華工醒時報」沒有經常性的專欄，但可將其內容大致分為幾類：(1)國際時事，(2)中國時事，(3)工人運動，(4)蘇聯社會主義建設，(5)中國僑民在赤塔、西伯利亞、遠東各城市生活的大事記。其中大半篇幅側重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政府的政策。例如，該報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總稱，刊登一系列文章介紹給讀者蘇俄生活的各個層面。

工會發行的機關報「華工醒時報」，目的在吸收勞動者加入工會。<sup>⑬</sup>1922年9月底赤塔中國分部工會組織共有160人（其中13個韓國人）。工會內的主要成員是菜農、鞋匠、木匠和幹粗活的。<sup>⑭</sup>由於考慮到基層工會會員的文化程度，報紙在啟蒙的政治術語上，廣泛運用簡單、通俗易懂的問答方式。

1925年年底旅俄華僑協會籌備會（復興中國會）成立。<sup>⑮</sup>1925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出版了該會第一期週刊性的機關報——「前進報」，<sup>⑯</sup>編輯是玉倫。第一期發行量是1,500份，其後發行量達6,000份。「前進報」是曾在蘇俄境內發行的中文報紙之中最重要的（共4頁，70×54公分）。

大部分居住在蘇聯境內的中國人的俄文程度並不好，不能閱讀俄文報紙。「前進報」提供大量篇幅，報導當時在中國的各種消息。該報竭力促進離鄉背井的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同時拉近蘇俄人民與中國人民的關係。其宗旨是在正確地啟蒙讀者，介紹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宣傳的理論與實際。

「前進報」在蘇俄境外亦有讀者。例如，第十二期刊登了一位來自比利時讀者宗錫鈞的投書，贊揚「前進報」是國外獨一無二以中文出版的革命刊

<sup>⑫</sup> 列寧圖書館藏有十三期的華工醒時報(No. No. 6-8, 10-19)。第16期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五週年紀念，按照中國節慶的傳統，用紅色字體印刷。

<sup>⑬</sup> 例如，華工醒時報，No. 13, 1922年9月15日。

<sup>⑭</sup> 華工醒時報，No. 16, 1922年10月30日。

<sup>⑮</sup> 根據籌備會資料，1925年12月之前在蘇聯的華僑確定有十六萬人。前進報，No. 1, 1925年12月18日。

<sup>⑯</sup> *Izvestiya VTsIK*, 1925年12月18日，1926年1月5日——國立沙提科夫——謝德林(Saltykov-Shchedrin)公共圖書館(在聖彼得堡，譯按)保存有二十期。

物。同一信中亦希望多多刊登有關蘇俄的詳細報導。<sup>⑰</sup>

上述三份石印報紙在蘇俄境內對中國勞動者宣傳馬列主義，真實地用文字鼓舞激勵他們支持革命，也因此間接參與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其後數年，特別是1920年代後期與1930年初，在蘇俄也出版了其他中文報紙。除了上述三報之外，其餘已用鉛印印刷。我們一共找到了22種（1918-1937出版）報紙。其中21種是由蘇維埃黨組織與工會所出版，只有一種是在革命之前就已經發行的——「中華商報」（海參崴商務局機關報）。該報刊登的僅限於商業問題。由僅擁有200份發行量及其內容，且使用文言文看來，此報不可能在中國工人之間廣為流傳。

大多數中文報紙都是在中國人口集中的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發行。其中有二份專業報紙「礦工」與「碼頭工人」，在中國工人之中積極從事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第一期「礦工」出版於1927年，該報是阿爾基穆（Artemov）煤礦工人及職員的機關報。而自1931年9月10日起則成為蘇聯共產黨阿爾基穆區委員會、地方蘇維埃、城市蘇維埃的機關報。在有1,800中國工人與職員的煤礦區，<sup>⑱</sup>其發行量達1,000份。「碼頭工人」是蘇聯共產黨海參崴委員會所出版。每五天出刊一期，發行量是2,000至2,500份。

1931年9月26日至28日在海參崴舉行第一屆中文拉丁化會議。著名的中國專家卓古諾夫（A. A. Dragunov）亦參加。中國社區對這個會議的興趣很大。除了100名正式代表之外，還有1,000名以上來自伯力、赤塔、海蘭泡等其他城市的人出席。會議所成立的遠東邊區新文字委員會，立刻著手進行實際工作，用新文字教育中國勞動者識字，並為不大識字的中國人成立小組學習新文字。新文字的宣傳主要是透過「工人之路」、「東方工人」及其他報紙。各報皆有一小篇幅用拉丁字母印刷。從1932年中期開始，「碼頭工人」全部四個版面都用已拉丁化的中文。<sup>⑲</sup>

自1932年起，新文字委員會開始出版十天一期的特別報紙「擁護新文字」，由史密特（P. P. Shimidt）、馬提諾夫（A. A. Martynov）、劉師林（譯音，Lyu Shi-lin）等任編輯。而帶有插圖的副刊「兩個世界」，其發行量亦可觀。

在布爾什維克印刷機關中的中國同志，連多少具有新聞經驗的也沒有。

<sup>⑰</sup> 前進報，No. 12，1926年3月5日。

<sup>⑱</sup> 「礦工」，No. 2(60)，1929年5月17日。

<sup>⑲</sup> 「碼頭工人」，No. 4，1931年9月30日。

這些缺點自然也反映在這些報紙上。例如，「華工報」、「華工醒時報」出版多年，卻找不到有關中國部隊拿著武器參加各種革命活動的簡短報導。報紙的編輯稍後開始吸引讀者的參與，版面中逐漸出現許多工人通訊。伯力「工人之路」編輯部與遠東新文字委員會，甚至一起為工人通訊員組織短期速成課程，以便訓練編輯出版工作人員。<sup>②</sup>

如果說第一份中文普羅刊物「華工報」，沒有完全達到正確傳播與有系統地發佈消息的任務（甚至沒編頁碼）；稍後的報紙，自「華工醒時報」開始，則含有各種具對比性的不同範疇、不同文類的報導（關於地方生活、國外生活的消息、一般文章等等），經常為翻譯與固定題目設有專欄，體裁更具多樣性。因此，「前進報」更出現了尖銳的政治漫畫。

1918年至1937年在蘇俄出版的中文期刊，也曾引起語言學家的興趣。十月革命之前，中文並無馬克思主義術語的對等語翻譯。由現存的中文報紙期數，可以看出若干術語的演變。例如，“Trudyashchisya”這個字剛開始譯為「勞力人」。1920年代初，則用日本人的翻譯「勞働者」，其後又改譯為「勞動者」。甚至連這樣的字：“internatsional”在「華工醒時報」（No. 6刊出國際歌全部譯文）被譯成「英建利及齊奧及兒」，加上旁註，意為「國際」、「偉大的團結」。

現將所知在蘇俄境內出版的中文報紙開列如下：

名稱 <sup>②</sup>	週期性	出版年 <sup>②</sup>	發行量 <sup>③</sup>
彼得堡			
1. 華工報 <sup>④</sup> (Kitaiskii rabochii)	週刊	1918-1920	?
2. 大同報 (Velikoe ravenstvo)	一週二期	1920-?	?
赤塔			
3. 華工醒時報 (Rabochii put)	半月刊	1922	?
4. 工人生活 <sup>⑤</sup> (Rabochaya zhizn)	一月三期	1930	1,000
海參崴			

② 參見「工人之路」，No. 887，1932年9月20日。

③ 各報名稱均用二種語文印刷（中文、俄文），一如表內出現的標題。

④ 因缺乏整套期刊，不易判定出刊的連續性。第一個數字絕大多數符合首期出版年，右邊數字是所存最後期數的日期。

⑤ 若干期刊的發行量不穩，表內所示是每種報紙的最大發行量（由所存期數得知）。

⑥ 依據報紙問世的短文，其名為「中國工作者」(Kitaiskii rabotnik)，Izvestiya VTsIK，1918年10月17日。

⑦ 「外貝加爾湖工人」（蘇聯共產黨赤塔州機關報）編輯部出版。



5. 工人之路 (Rabochii put)	週刊	1923-1934	2,000
6. 中國工人 (Kitaiskii raborchii)	一月三期	1932-1933	3,000
7. 紅旗 (Krasnoe znamya)	每五天一期 <sup>㉞</sup>	1931	3,000
8. 碼頭工人 (Portovik)	同上	1931-1932	2,500
9. 中華商報 (Chzhunkhua Shanbao)	?	?-1926	200
莫斯科			
10. 前進報 (Vpered)	週刊	1925-1926	6,000
11. 十月 (Oktyabr) <sup>㉞</sup>	日報	1933	12,000
黑 河			
12. 東方公社 (Vostochnaya kommuna) ?		1933	?
13. 東方工人 (Vostochnyi rabochii)	五天一期	1930-1932	1,000
14. —— (Kommuniciticheskaya zvezda) <sup>㉞</sup>	半月刊	?-1920	5,000
伯 力			
15. 工人之路 (Rabochii Put)	雙日刊	1924-1937	10,000
16. 擁護蘇聯 (Za Sovetskii Soyuz)	?	1929-1930	5,000
17. Yngxu Sin Wenz (Za novyi alfavit)	旬刊	1932-1934	2,000
18. 兩個世界 (Lianggo Shgie, Dva mira)	同上	1932-1934	2,500
19. 黨課 (Partucheba)	半月刊	1932-1933	3,200
伊爾庫次克			
20. 突擊隊員 (Udarnik)	月刊	1932-1937	2,000
阿爾基穆 (Artem)			
21. 礦工 (Shakhter)	半月刊	1929-1932	1,000
基 輔			
22. 華工報 (Kitaiskii rabochii) <sup>㉞</sup>	?	1926	?

㉞ 一共出刊13期 (1931年6月21日至8月25日)。

㉞ 蘇聯外僑出版社發行的日報，只為特別重要的革命日子出刊，頁數是4至6頁 (62×47公分)。

㉞ I. Babichev 指出，「自1920年5月5日至11月1日……出版了11期」(參見I. Babichev 「中國與韓國勞動者參加對抗蘇聯遠東的武裝干涉者與白軍」，「遠東四十年的蘇維埃政權」，(阿姆河畔) 共青城，1958，頁170)。報紙是由蘇聯共產黨阿姆河省委員會中國支部發行。並沒有用中文印出報紙名稱，亦沒有標明出版地點。

㉞ 可惜的是沒有找到基輔版的華工報。關於其問世的消息，是來自前進報通訊欄 (No. 7, 1926年1月29日)。第10期也刊登了該報編輯答謝基輔版華工報的致意。

我們距離完全找出在蘇俄的全部中文期刊的目標尚遠。在這篇短文裏，只希望讓讀者熟悉在我們國內所保存的一些中文期刊，為鞏固兩國人民的友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來自編輯部

《東方學問題》1960年第三期，頁336-337。

1959年第四期《東方學問題》有一篇丘古耶夫斯基寫的文章「蘇聯出版的中文期刊，1917-1937」。編輯部認為刊登此文是研究十月革命之後，在蘇聯的中國勞動者革命行動與重要生活的第一個嘗試。並且希望能引起專家的注意，增補指正作者所引用的資料。以下刊登的是徐匹林金（A. G. Shprintsiny）（列寧格勒）寫給編輯部的：

1. 丘古耶夫斯基文章中指出報紙「工人之路」是以同一名稱，同時在兩地出刊的不同中文報紙：一是在海參崴出版的週刊（1923-1934）；另一種是在伯力的雙日刊（1924-1927）（參見頁75-76）。事實上，談到的應該是同一種報紙，於1922年海參崴創刊，並非如丘文所言為1923年，並且搬到遠東邊區的中心伯力（譯註）\*，其後多年繼續以此名稱發行，作為遠東邊區黨部與遠東邊區工會理事會的機關報。這許多年間報紙的第一欄總印著「創刊於1922年3月」。

2. 中文拉丁化報紙「擁護新文」不是創刊於1932年，而是1933年。第一期的日期是1933年2月5至15日。並且也不是出刊至1934年，而是至少出刊至1937上半年；因為我所知道的最後一期（No. 175），日期是1937年5月31日。

3. 丘文指出以中文拉丁化的新文字出版的插圖報紙「兩個世界」發行為期二年（1932-1934）的旬刊（頁76）。這份出版物是為教學與政治的攝影報導刊物。照片下面附有短文，俾同時達到教學目的。那些年因印刷困難，

\* 譯註：根據「工人之路」第一百期紀念號「本報短史」一文（1925年7月15日，頁1～2），該報「產生於1922年3月1日，在從前遠東共和國的京都赤塔，由全俄中央職工蘇維埃遠東部出版，定名為「華工醒時報」……從1923年8月間，本報由赤塔移到海參崴出版……自從移到海參崴辦理後，……本報名稱也由「華工醒時報」改為「工人之路」。因為本報的俄文名稱本為「工人之路」的意思，而中文名稱却為「華工醒時報」，中俄文名稱太不符合，因此改為現在的名稱」。

不可能定期出刊。就我所知，報紙出版第一期後沒多久，即中止發行。

4.「擁護蘇聯」一報沒有定期出刊。該報是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期間，為戰敗的中國士兵所辦，由遠東特別軍政治署出版（1929-1930）。

5.報紙「黨課」不是出版於1932至33年，而是僅在1932年出版，時間很短。是蘇聯共產黨遠東邊區宣傳部為黨校預備學校所辦。此乃因當時缺乏專門為這些學校準備的教科書。

6.文中提到的一些人名（P. P. Shmidt, A. A. Martynov, 頁74）易予人錯誤印象，以為這些人都是俄國人，而事實上他們都是中國同志。尚有其他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另有俄文名字（例如，瞿秋白是 Strakhov）。因此 Martynov（其名是 S. S.，而不是 A. A.）是 Wang Te-chiang 或 Wang Chan-si, P. P. Shmidt 叫 Su Zhi-zhen。S. S. Martynov (Wang) 曾任遠東新文字委員會中國分會主席數年。而丘文談及的第一次文字拉丁化大會出席代表人數（1,000人）也不對。按照資格審查委員會報告上登記的（參見「革命與文字」雜誌，1932, No. 1-2, 頁125），實際上出席大會的代表有87人，其中有73名中國人；而出席開幕與閉幕典禮的，才是1,000人甚至1,500人。

7.關於蘇聯境內中國出版物的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丘古耶夫斯基以“internatsional”這個字為例。按照丘氏的看法，這個字在國際歌譯文中採取音譯是因為在1920年代仍缺乏「國際」這個字的中文對等語。現在當然難以推斷當時音譯的理由，可能是當時譯者的確不熟悉這個字。但是應該注意到這個字當時在中文裏是存在的。例如，1920年上海出版的「社會學」一書便有這個字。同時，“internatsional”的音譯也以其特有的「國際形式」堂堂進入中文語彙；它被寫成“英特爾納雄爾納”。在1920年代翻譯國際歌的人是有名的中國詩人蕭三。字數多的“internatsional”容易放入歌曲的旋律，比二個字的中文要好。對內容豐富的丘文之具體更正，即如上述。

編輯部請求所有同志，對這一問題提供資料，寄來本刊，俾便發表。

## 研究機構介紹

#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陳 謙 平\*

### 一、緣 起

大陸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自1970年代初開展以來，經過各地學者的辛勤耕耘，可以說是碩果累累。但是，爲了進一步推動民國史研究的深入，協調大陸各地民國史的發展，尤其是加強同臺灣、香港地區以及歐美、日本等國學者的學術交流，在大陸地區建立一個民國史學術研究中心已成爲當務之急。從1992年起，在大陸民國史著名學者、多卷本《中華民國史》主編李新教授的倡議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民國史學者頻繁接觸，希望在南京建立民國史學術研究中心。

鑒於南京曾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國民政府的首都，有重要的地位；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著較爲完整的民國政府檔案，南京地區的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收藏著頗爲豐富的民國時期的期刊、圖書、檔案和文物；南京地區的民國史學術研究力量較強，已出版了一批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術論著和史料；近年來大陸、臺港和外國民國史學者在南京的學術交流活動也十分活躍、頻繁；爲此，學者們建議南京大學設立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這一建議得到南京大學校長的積極贊同和支持。

### 二、資金來源

一所研究中心需要大筆資金來維持日常開支以及開展各類學術活動，但由於中心剛剛發起，目前還沒有從官方獲得資助，資金的缺乏會使中心半途夭折。所幸的是，在南京投資設廠的臺灣實業家陳清坤先生得悉建立中心的計畫後，主動提出承擔中心的成立以及今後開展一切學術活動的費用，遂使中心得以迅速建立。

---

\* 本文作者係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 三、中心成立及其宗旨

1993年6月18日，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杭州、蘇州、濟南和南京等地的學者40餘人出席了成立會議。因故無法來寧的李新、彭明、孫思白、魏宏運、來新夏等教授均來函祝賀。陳清坤先生亦從臺中市趕來南京參加會議。

與會者一致認為，中心的宗旨，在於廣泛開展海內外民國史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增強友誼，共同促進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繁榮與發展。

### 四、中心組織機構

中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新教授擔任名譽主任；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擔任主任；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任王學莊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黃美真教授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萬仁元研究員擔任副主任。

陳清坤先生應聘擔任中心顧問。

中心由張憲文、茅家琦、崔之清、楊振亞、史全生等擔任專任教授，還有一批專任副教授、講師和助教。中心下面有一批攻讀中華民國史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

中心由陳謙平副教授、陳紅民副教授、顧寧講師擔任主任助理。

中心在大陸史學界聘請了一批著名民國史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他們是：

李 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 侃（中華書局）

孫思白（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魏宏運（天津南開大學）

龔書鐸（北京師範大學）

彭 明（中國人民大學）

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

來新夏（天津南開大學）

王檉林（北京師範大學）

王維禮（東北師範大學）

張 磊（廣東省社科院）

王學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鐵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耿雲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姜義華（上海復旦大學）  
 黃美真（上海復旦大學）  
 黃 彥（廣東省社科院）  
 金普森（杭州大學）  
 蔡德金（北京師範大學）  
 張同新（中國人民大學）  
 林家有（廣州中山大學）  
 萬仁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方慶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陳興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張圻福（蘇州大學）  
 楊光彥（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楊樹標（杭州大學）  
 謝本書（雲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  
 楊立強（上海復旦大學）  
 毛 磊（武漢中南財經大學）  
 郭緒印（上海師範大學）  
 靳德行（開封河南大學）  
 陳榮華（江西社科院）  
 曾業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呂偉俊（山東大學）

中心也在臺灣、香港地區和國外聘請了一批著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他們是：

張玉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三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蔣永敬（政治大學）  
 李國祁（臺灣師範大學）  
 胡春惠（政治大學）  
 魏 芻（中山大學）

王廣武（香港大學）  
齊錫生（香港科技大學）  
唐德剛（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陳志讓（加拿大約克大學）  
于子橋（美國伊利諾大學）  
李又寧（美國聖若望大學）  
閔斗基（韓國漢城大學）  
野澤豐（日本駿河臺大學）  
池田誠（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  
衛藤沈吉（日本亞細亞大學）  
山田辰雄（日本東京慶應大學）  
姬田光義（日本中央大學）  
中村哲夫（日本神戶學院大學）  
橫山宏章（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西村成雄（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 美國哈佛大學）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費路（ROLAND FELBER,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 五、中心活動及其計畫

中心成立以來，工作計畫有如下五項：

(1) 出版一本高水準的中華民國史學術研究刊物——《民國學刊》（每年兩期），使之成為國內外學者發表民國史研究成果的園地。該刊物的編輯委員會已經成立，徵稿工作也已開始，祈盼史學界各位同仁不吝賜稿。來稿請寄：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漢口路／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陳謙平、陳紅民先生收／郵政編碼：210008

(2) 設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專項獎助金，開展學術交流活動，每年資助若干名海內外學者來南京大學進行短期訪問。中心將設立學術研究委員會。

(3) 設立中華民國史學術著作出版基金。中心計畫在今後若干年內，同出版部門及海內外學者密切合作，分期出版一批高水平的民國史學術專著。中心將設立出版編輯委員會。

(4) 設立中華民國史獎學金。該項獎學金的發放對象為南京大學民國史專業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中的品學兼優者，每年設一等獎 1—2 名，二等獎 2—4 名，三等獎 4—6 名，目的在於獎掖後學。首批獎學金已於 1993 年 11 月發放，有六名研究生分獲一、二、三等獎。

(5) 定期召開中華民國史學術研討會，以促進交流，繁榮學術。該項工作的進行情況如下：

(1) 中華民國史青年學者研討會：

由本中心主辦，已於 1993 年 11 月 25—26 日在南京大學召開。來自中國大陸以及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的四十餘位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基本上是 1949 年以後出生的）參加了會議。研討會的主題是：a) 新時期以來民國史研究的回顧；b) 民國史研究新領域的拓展；c) 民國史研究史料的發掘；d) 民國史研究的視野與方法論。

會議收到論文三十餘篇，內容涉及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對外關係、社會、思想文化、軍事、宗教、人物以及民國史研究方法論等全方位的問題。與會者從宏觀分析入手，對前一階段的研究加以總結，著重提出了將民國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幾個必要手段：發掘史料、尋找突破口；更新觀念、建立新體系；放寬視野、開拓新領域；引用新方法、與國際研究接軌。

三、四十歲左右的青年學者是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兩天的研討會，充分顯示了民國史學界年輕一代的實力和抱負，增強了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促進了相互間的團結與友誼，這正是此次學術研討會所要達到的預期目的。中心打算延聘部分卓有成就的青年學者參與中心的工作，並在國內外邀請若干名青年學者擔任中心的特約通訊員。

(2) 「振興中華一百年——第三次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1984 年和 1987 年南京大學先後參與主辦了在南京召開的兩次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對於推動海內外（尤其是大陸地區）民國史研究的發展，增強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友誼，均起了積極的作用。

1994 年是興中會成立一百周年，為了弘揚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革命精神，團結海內外華人共同奮鬥，實現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的宏偉目標，本中心擬以「振興中華一百年」為主題，召開第三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其主要議題為：興中會成立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中國人民的愛國傳統與對外關係；對外開放與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等等。會議定於 1994 年秋後在南京大學召開，計畫邀請海內外學者九十人左右參加。



#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簡介

曾 碧 霞\*

南洋研究所成立於1956年10月，是中國最早建立的一所研究東南亞問題和華僑問題的專門研究機構，也是中國最早設立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之一。廈大南洋研究所大樓座落在廈門大學校園南面綠樹成蔭的白城山上，依山傍海，風光旖旎，是進行學術研究工作的理想所在。

## 一

在建所的最初十年中，研究方向側重於東南亞政治、經濟、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和華僑等領域，尤其是華僑問題研究取得顯著的成果。除了上述方向外，研究所還進行文化、教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以及開展海外華僑函授教育。十年中進行了大量的僑情、僑鄉調查。每年兩次對歸國華僑進行採訪；1956年至1960年組織進行了晉江地區僑鄉調查；1963年，與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室聯合進行了契約華工的調查；1958年至1961年，先後派出20餘人分赴廣東、福建、上海等地進行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歷史的調查，整理出《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匯編》一百多萬字和《契約華工訪問錄》二十多萬字。

「文化大革命」期間南洋研究所被迫中斷研究工作，並於1970年停辦。至1972年才復辦。

## 二

復辦以後的南洋研究所設經濟、歷史、華僑三個研究室以及編譯室、資料室、行政辦公室，下設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新馬、印支等研究

\*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圖書館館員

組。科研方向是：東南亞政治、經濟、歷史和華僑華人問題。經濟研究室研究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道路，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亞太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歷史研究室研究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東南亞古代史和近代史，中國南海疆域沿革史。華僑研究室研究東南亞華僑華人史，華僑經濟史，戰後華人問題。

目前，全所編制45人，其中研究員6人，副研究員20人，5人已具有博士學歷，另有4名攻讀在職博士學位。

該研究所經過近四十年的創建和發展，取得一批較重要的科研成果，學科設置也趨向合理。

在學術研究方面，迄今已出版專著、譯著、論文和譯文等共計五千多萬字。1976年以來，出版的專著計34部，譯著13部（見附錄）。研究所還承擔了一批國家和省級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並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民間提供諮詢服務，為全國許多省市的僑務、外事工作者舉辦培訓班與學術講座。

在學科建設方面，研究所自1980年開始進行研究生的培養工作。目前設有博士點一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碩士點六個：東盟國家經濟、發展中國家經濟、亞太經濟、東南亞歷史、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和華僑華人問題研究。至今已培養出博士7名，碩士26名，現在學的研究生8人。其中不少成為蜚聲中外的專家、學者。

在東南亞研究和華僑華人研究領域，南洋所已建立了廣泛的學術交流網絡。前來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的專家學者日增，先後有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蘇聯、法國、德國、荷蘭等十多個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的專家和學者來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與美國康奈爾大學、柏克利加州大學、英國肯特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萊頓大學，日本亞洲研究所、長崎大學經濟學院，菲律賓阿典躍大學、菲律賓大學，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國立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意大利那不勒東方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近十年來，研究所有20人次到國外同類研究機構進行為期1-2年進修、合作研究，並有30多人次出境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有8人次赴國外學術機構講學。1989年4月，南洋研究所主辦了在鼓浪嶼召開有四十多位外國專家和國內一百多位專家學者的《戰後華人經濟發展變化》國際學術討論會。

南洋研究所圖書館以收藏東南亞和華僑問題的圖書報刊為特點。1956年剛成立時有 1600 多冊藏書和 27 種外文報刊。目前有關東南亞和華僑華人問題的藏書三萬四千多冊、專題資料一萬冊、雜誌合訂本一萬一千多冊、報紙合訂本二萬一千多冊，其中，30-40 年代的一批雜誌與圖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每年訂購海外報刊近百種。所藏資料文種有印尼文、馬來文、泰文、緬文、越南文、英文、法文、荷蘭文、俄文、日文等十幾種。本所是大陸同類研究所中資料最為豐富的機構之一。

在研究所創辦初期，整理出版目錄索引有《南洋問題圖書總目》、《華僑問題圖書總目》以及《南洋問題報刊資料索引》等 8 本。復辦以來，整理出《南洋研究所庫存期刊目錄索引》、《南洋問題資料》（不定期）已出版 40 期、《東南亞情報資料信息》（不定期）、《福建省收藏華僑華人問題圖書聯合目錄》，編纂出版國內外有關東南亞研究的論文索引。1993 年南洋研究所圖書館加入「國家教委廈門大學文科文獻信息中心」。

研究所出版兩種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季刊：《南洋問題研究》和《南洋資料譯叢》。《南洋問題研究》1973 年創刊，至今已出版 76 期，主要刊登本所科研成果，已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南洋資料譯叢》迄今已出版 112 期。主要譯載國外刊物中有關東南亞、亞太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等有較參考價值的學術論文和系統資料。南洋所編纂《亞太經貿快訊》周刊，現已出 62 期，主要為實際部門提供經濟諮詢。

### 三

南洋所今後的發展目標是現代化與國際化，爭取在 5 年時間將南洋研究所建成可與歐美同類研究所水平相當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

首先是完善學科建設，鞏固已初具規模的合研究、教學、諮詢為一體的發展方向。繼續和增設發展經濟學、世界經濟、國際關係、民族學、歷史社會學、移民學等學位課程，建立現代理論框架，強調理論與專門研究的結合，突出多學科綜合研究所優勢，追蹤世界最新學科。

改善科研人員素質，提高研究人員學歷結構，到本世紀末，爭取博士學歷比例占研究人員的 60% 以上，加強外語訓練，三分之二研究人員能熟練使用一種以上外語，在近三年內使大部分研究人員與全部資料人員用電腦進行業務工作，到 1996 年，實現圖書資料管理電腦化，爭取與國外研究機構實現

電腦聯網。

進一步擴大對外交流，爭取與國外同類與相關領域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每年派出兩名左右研究人員在國外研究機構進行一年以上的進修或進行合作研究，數人參加有關重要的國際會議，掌握最新研究動態與相關資料，追蹤最新研究成果。

當代的社會是競爭的社會，南洋研究所將以謹慎、進取的精神面向未來。

### 附錄：南洋所出版的主要專著和譯著

#### 一、主要專著：

- 東南亞五國經濟概況 經濟研究室編著 人民出版社 1976.3  
 馬來西亞土地關係史簡述 林克明編著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出版 1979.9  
 東南亞五國經濟 經濟研究室編著 人民出版社 1981.5  
 戰後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吳志生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世界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 汪慕恒等合著 中國對外經貿出版社  
 1984.9  
 菲律賓（各國手冊叢書） 沈紅芳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  
 世界各地的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 汪慕恒 黃漢生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亞太經濟新格局 趙文騷 王勤著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2.9  
 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變化與外資的作用 趙文騷 吳崇伯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12  
 東盟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形態 廖少廉 王勤 吳崇伯著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3  
 「豬仔」華工訪問錄 桂光華 吳鳳斌等編著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出版  
 1979  
 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城華僑人口分析 黃文騰 陳曾維 陳安妮 南洋研究所出版 1981.3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 林金枝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印度尼西亞華僑史 蔡仁龍等著 海洋出版社 1984

- 華僑抗日戰爭史料選輯 蔡仁龍 李國梁編 福州 1987
- 契約華工史 吳鳳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建、廣東卷） 林金枝 莊為璣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1989
-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況 林金枝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 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 莊國土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 戰後海外華人變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國梁主編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89
- 東南亞華人經濟 汪慕恒主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 東南亞著名華僑華人傳 蔡仁龍主編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
- 華僑歷史論叢（1-7 輯） 蔡仁龍主編 福建省華僑歷史學會出版 1985-  
1990
- 華僑對祖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 林金枝 李國梁 蔡仁龍著 福建人民出版  
社 1992
- 東南亞華僑通史 吳鳳斌 莊國土 林金枝 李國梁 蔡仁龍合著 福建人  
民出版社 1994
- 新加坡簡史 何啟拔主編 黃漢生等編著 商務印書館 1978
- 馬來西亞簡史 林伍光 錢文寶編著 商務印書館 1981
- 南洋諸島史地考證論集 韓振華主編 中華書局 1981
- 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韓振華主編 人民出版社  
1981
- 祖國的南疆——南海諸島 林金枝 吳鳳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 莊國土 包樂史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 明代海外貿易史 李金明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 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 陳希育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1
- 南海諸島研究 韓振華 林金枝 吳鳳斌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 二、主要譯著：

- 微笑的將軍 編譯室譯 商務印書館 1979.1
- 開發援助中的伙伴關係 編譯室譯 商務印書館 1975.7
- 石油與世界霸權 編譯室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 華人在東南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汪慕恒 薛學了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 亞洲美元市場——國際離岸金融業務 葉森玉譯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5  
 華僑資本的形成與發展 李國梁合譯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6  
 東南亞華僑經濟簡論 李國梁 劉曉民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5  
 中荷交往史 (荷)包樂史著 莊國土譯 荷蘭 Otto 出版社 1989  
 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莊國土譯 1992年臺北版  
 中國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地位 編譯室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華僑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李國梁 金永勛譯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中荷交往史 (荷)包樂史著 莊國土譯 荷蘭 Otto 出版社 1989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 The International Tea Trade and  
 Wester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to China in 1740-1840 Zhuang  
 Guotu (莊國土)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論文集

- |                       |        |        |
|-----------------------|--------|--------|
| ①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 精 500元 | 平 450元 |
| ②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精 700元 | 平 600元 |
| ③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④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300元 | 平1100元 |
| ⑤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⑥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⑦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500元 | 平1300元 |
| ⑧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500元 | 平1300元 |
| 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 精1100元 | 平1000元 |
| ⑩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 精1200元 | 平1100元 |
| ⑪近代中國科技史論文集           | 精 450元 | 平 400元 |
| ⑫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二冊)   | 精1600元 | 平1400元 |
| ⑬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          | 精1400元 | 平13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2年10月~1994年3月)

江淑玲\* 輯

(1992) 10.23 「東亞民間社會研討會」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大學舉行，由歐洲與美洲之美亞研究合作委員會主辦，會期三天（至25日），共發表論文50多篇，出席學者包括來自加拿大、美東等地。會議主題較集中在討論十九、二十世紀的問題，而且廣泛地涉及中國、日本、韓國及越南四個地區。

10月 山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成立，由經濟史專家孔令仁擔任主任。該中心充分利用山東與韓國的歷史淵源與地理優勢，系統地研究韓國的政治、經濟、思想、社會、文化等領域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

11.5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舉行第三屆「中國與世界：歷史、現代與前途」國際學術研討會，會期三天（至7日），計有俄羅斯遠東研究所、莫斯科大學、東方研究所、科學院新西伯利亞分院、義大利、大陸及越南學者多人參加，討論主題為當代大陸的各種問題、俄國與中國關係史及臺灣問題等。

11.23 香港中文大學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及國際教育交流會合辦「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香港1997研討會」，會期五天（至27日），會中有翁松燃、宋思榮、李南雄、Michael Palmer、John Kamm、W. K. Quon、劉兆佳、陳文、蔡寶瓊等發表論文。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1993) 2. 17 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十四屆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於2月17日至19日在莫斯科該所舉行，會中宣讀論文25篇，而會議開幕前出版的上下二冊報告集，收錄94篇提要及論文，其中多篇涉及中國近代史。

3. 10 由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人文研究所及中國時報基金會聯合主辦之「文化中國展望：理念與實際學術研討會」，於3月10日至12日在中文大學舉行，會中宣讀論文18篇。

3. 25 美國亞洲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3年年會於3月25日至28日在美國洛杉磯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舉行，會中按區域分爲中國與中亞、日本、韓國、南亞、東南亞、綜合地區；圖書館；教育等六個組，召開141個場次會議，其中有關中國研究即有50個場次之多。

4. 18 由福建省考古博物館、漳州市文化局等單位聯合主辦「天地會史學研討會」，在天地會故鄉——福建雲霄舉行，與會代表圍繞天地會起源時間、地點、創始人、性質等問題展開討論。

5. 7 「顧頡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於蘇州大學召開，會期三天（至5.9），與會學者來自海內外各地，近150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論文近90篇。與會學者對顧頡剛一生的學術成就、學術思想和方法等問題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5. 18 爲紀念抗日將領劉湘將軍誕辰 103 周年，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委員會等聯合主辦「抗日愛國將領劉湘研討會」，在四川省大邑縣召開，會期三天（至5.20），有學者專家100人出席，提交論文20篇。

5. 22 爲紀念毛澤東誕辰 100 周年，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南區）、廣東省社科聯等15個單位，聯合主辦「毛澤東思想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於5月22日至26日在廣東省東莞市委黨校舉行，來自北京和中南6省近80位專家和學者出席會議。

6. 1 「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6月1日至3日在南京舉行。本次會議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中國第二檔案館等單位發起，南京大學主辦。來自海內外學者98人出席，發表論文60餘篇，涉及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各個層面問題。有關民國時代秘密社會論文有：〈青幫的起源及其在上海的崛起〉、〈論舊上海青幫大亨崛起的原因〉、〈民國時期青紅幫發展的特點〉、〈民國時期青幫與國共兩黨關係〉、〈中國二十年代的勞工運動與秘密社會〉等。



6.18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學者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於1993年6月18日成立，中心由民國史專家李新研究員擔任名譽主任，張憲文教授為主任。中心建立後將計劃出版每年兩期的《民國學刊》。

6月 「中日關係150年：相互依存、競爭、敵對」中日學術討論會，由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地域研究中心、松阪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聯合主辦，出席討論會的中方學者8人，日方學者150多人。會議按一、明治初期與清末的中日交流，二、辛亥革命至國民革命間的中日關係，三、中日戰爭，四、現代中日關係等議題討論。

8.17 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美國康奈爾大學聯合主辦「城市進步、企業發展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於8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近一百位學者參加會議。討論的議題主要有：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城市進步與社會文化變遷、經濟發展與城市進步、企業家素質與企業發展、影響城市近代化的各種因素等。

8.23 香港大學假香港演藝學院舉辦「第三十四屆亞洲及北非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會期六天（至28日），共分四百多個小組，總計一千三百餘篇論文，其中有十個大型的專題研討會，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為：中國踏進二十一世紀的門檻、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東亞公民社會發展或停滯不前的因素。

9.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洪秋芬小姐報告：「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保甲制度和社會運動關係初探」。

9.19 由山西省歷史學會、北京大學歷史系、西安事變研究會等單位聯合籌辦的「中國近現代名人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太原市山西大學舉行，出席學者專家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與美國、日本、韓國等85人，發表論文92篇。會議對閻錫山、張學良、楊虎城三個歷史人物的研究進行學術交流。

9.21 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仲禮先生應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上海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0.5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章開沅先生應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大陸辛亥革命研究情況介紹」。

10.20 「中國重慶抗戰陪都史學術研討會」在四川省重慶市舉行，來自海峽兩岸70餘名學者出席會議，會期5天（至24日），提交論文50餘篇。

會議研討的內容為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到1946年5月還都南京，這段時間內重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活動的歷史。

10.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陶英惠先生報告：「蔡元培與胡適——幾件共同經歷真象的探討」。

10.21 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會期兩天，宣讀論文十五篇。

11.4 俄國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教授潘佐夫 (Alexandre V. Pantsov) 應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中國留蘇學生概況，1921-1930」。

11.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翟志成先生報告：「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之四變」。

1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紀念曾國藩逝世雙甲子，舉辦四場演講會，邀請大陸學者唐浩明、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張玉法、研究員呂實強作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曾國藩先生之生平與事業」、「曾國藩先生的士大夫之學」、「曾國藩先生之歷史地位」、「曾國藩先生之行誼」。

11.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討論會，由澳洲 Tasmania 大學博士候選人王大綱先生主講：「中蘇關係中的新疆問題(1917~1990)」。

11.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討論會，由潘露莉博士主講：「海外華人對於華人教育的言論——以菲律賓華語教學研討會為例」。

11.28 由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汕頭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93 世界華僑華人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汕頭大學舉行，出席會議專家、學者共138人，發表論文130篇。

1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約聘研究助理張春蘭小姐報告：「巴黎和會時期顧維鈞的角色與外交策略——以山東問題為中心」。

12.9 法國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魏丕信 (Piere-Etienne Will) 應邀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為：「Official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2.17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假政治大學藝文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臺灣光復初期史料研討會」，邀請主講人及論文如下：賴澤涵：「臺灣光復

初期歷史資料」、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臺灣研究相關資料簡介」、簡榮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光復初期臺灣史料概況、黃秀政：「鍾著『辛酸六十年』的史料價值——以光復初期歷史為中心」、侯坤宏：「『二二八事件』有關史料與研究之分析」、蔡相輝：「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臺灣特檔之史料及運用」、簡笙簧：「國史館典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史料舉隅」、陳鵬仁：「戰後初期研究臺灣的日文文獻」。

12.2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民族所約聘助理研究員方為謙先生主講：「建立弱勢的霸權統治：日據下臺灣人民的文化經驗，1895~1945」。

12.28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專題演講，由加拿大卑詩大學亞洲系客座研究員劉再復先生主講：「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歷史角色的變遷」。

12.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許雪姬小姐報告：「日本政府在臺的協力者林熊徵——日據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二」。

(1994) 1.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聯合舉辦「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假該所檔案館會議室召開，與會學者 140 餘人，會議發表論文 20 篇，歷時三天（至 1.14）結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17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兼東亞研究所所長魏斐德(Frederic E. Wakewan, Jr.) 先生，應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邀請、行政院國科會贊助，於 1 月 17 日至 28 日至該所訪問，並於 19 日、27 日在該所及中研院近史所演講，講題分別為：「Reconsiderations of the Ch'ing-Unresolved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Study of Late Imperial China」、「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1.1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逢甲大學鄭梓教授主講：「戰後初期臺灣地方政權之重建——以『地方自治』為中心的討論」。

1.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慶成先生，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於元月六日至二月六日至該所訪問研究，並於一月二十日在該所演講，講題：「太平天國對儒學經籍的態度和刪改出版四書五經問題」。

1.25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李榮村先生演講：「清代湖北容美土司轄地之研究」。

2.3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副教授，應中研院近史所之邀，於元月八日至二月十九日至該所訪問研究，並於 2 月 3 日及 2 月 17 日演講，講題為「Japanese Colonial ideology in Manchukuo: A preliminary Report」及「How well do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ccount for China and India?」

2.24 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於 1993 年八月至 1994 年 1 月在國立政治大學訪問教學，並於 1994 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一日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於二月二十四日在該所演講，講題：「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以貝德士文獻為實證」。

3.8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王鐸全教授，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演講：「大陸中學歷史教育之發展與教科書之編輯」。

3.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滿紅小姐報告：「清末大陸來臺貿易商人（郊商）的興衰問題——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可以結合思考之一事例」。

3.1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臺灣史研究座談會」，邀請美國夏威夷大學藍厚理教授 (Prof. Harry Lamley)、日本關西大學石田浩教授，及該所兼任研究員王世慶、曹永和、研究員張炎憲，就十七世紀以來臺灣史研究之課題作回顧與檢討，其講題如下：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研究的回顧、石田浩：戰後日本的臺灣研究與臺灣經濟研究上的幾個問題、曹永和：十七世紀臺灣史研究的課題、Harry Lamley：日治時代臺灣人的文化認同 (Taiwanese Culture Identity: Change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張炎憲：二十世紀臺灣史研究的課題。

3.17 由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自立晚報協助，邀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小姐演講，講題：「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

3.17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舉行「亞洲商業網絡會議」，會期三天（至 19 日）。此會係 1994 年世界經濟史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之會前會，會議主題側重亞洲商業之探討，關涉日趨重要之泛太平洋經濟圈之歷史發展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女士應邀在會中宣讀論文：「Decline or Prosperity?.....Mainland China's Merchants Tra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1820s~1895」。

3.24 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高黎明 (Alexander M. Grigoriev)，應中研院近史所之邀，於三月二日至四月三日至該所訪問研究，並於三月二十四日演講，講題：「俄羅斯檔案館中保存的有關中國的材料」。



出版消息

# 新書出版消息

張 珍 琳\* 輯

## 一九九一年出版

- 林家有等編 共和國的追求與挫折：辛亥革命 北京 文物出版社 十一月  
茅家琦編 太平天國通史 三冊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八月 一六八六  
頁  
馬小泉等著 強權與民聲：民初十年社會透視 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三  
五七頁  
容閔著、王秦譯 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 北京 中華書局 十月  
一五五頁  
華 強 太平天國地理志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三月 四四二頁  
董志羣 中國近代史 臺北 正中書局 六月 八八頁  
小林文男 中國往環——現代史の視點 東京 勁草書房 三五七頁  
久保亨 中國經濟一〇〇年のあゆみ——統計資料で見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創研出版 四月 一三五頁  
古野直也 臺灣軍司令部（1895—1945） 東京 國書刊行會 三〇七頁  
矢吹晉 毛澤東と周恩來 講談社 二三八頁  
朱建榮 毛澤東の朝鮮戰爭——中國が鴨綠江を渡るまで 東京 岩波書店  
三六二頁  
西村成雄 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  
な視界 研文出版 九月 三四一頁  
白井勝美等 張學良の昭和史最後の證言 角川書店 二八八頁  
秋永芳郎 滿州國——虛構の國の彷徨 光人社 五一七頁  
森正孝等編 中國側史料・日本の中國侵略——南京大虐殺，占領支配政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用助理

- 策，毒ガス戰，細菌戰，人體實驗 明石書店 五一九頁
- Elman, Benjamin A.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8pp.
- Hooton, E. R.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48pp.
- Lardy, Nicholas R.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2pp.
- Lee, Thomas H. ed.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16th-18th Centuries*. Coronet Books, 356pp.
- Lowe, Joseph 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onducted by the Warlords: 1916-1928*. Lowe, Joseph D., publisher.
- Roberts, J. A. G.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Reader in History*. Phoenix Mill: Alan Sutton Publishing, 167pp.
- Sandmeyer, Elmer C.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44pp.
- Simith, Richard J.; Fairbank, John K. and Bruner, Katherine F.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84pp.
- Vohra, Ranbir.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Prentice Hall, 336pp.

### 一九九二年出版

- 人民日報新聞信息中心等編 張學良將軍資料索引 瀋陽 東北工學院出版社 四月 三三四頁
- 丁捷 時代與抉擇：胡適和中西文化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二五九頁
- 王松等 孔祥熙和宋藹齡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五七頁

- 王曉明 魯迅傳：無法直面的人生 臺北 業強出版社 十二月 二七四頁
- 王曉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北京 中華書局 九月 五六二頁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一～四冊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編 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濟南 齊魯書社 七月 九七四頁
- 任訪秋 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論集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八七  
頁
- 阮榮春、胡光華 中華民國美術史：1911-1949 成都 四川美術出版社  
六月 四二八頁
- 肖 玫 郭沫若 一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十一月
- 汪毓和 中國近現代音樂家評傳 上冊：近代部分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五月 二六一頁
- 何鶴志編 論陶澍 長沙 岳麓書社 七月 三三八頁
- 李 非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史 廈門 鷺江出版社 十月 三六〇頁
- 李亞寧 明清之際的科學文化與社會：十七、十八世紀中西文化關係引論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十月 三四八頁
- 李雲漢 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 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六月
- 李雲漢 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一)(二) 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八月
- 李澤厚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臺北 風時出版社 十一月
- 李瀛洲編 帝國主義從海上入侵中國大事記：1838-1971 北京 海潮出版  
社 二月 九〇頁
- 宋新中主編 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研究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四月  
二四五頁
- 林保淳 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者 臺北 幼獅文化公司 九月
- 周永祥 瞿秋白年譜新編 上海 學林出版社 八月 四一一頁
- 金春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 香港 開明書店 二月 三三〇頁
- 季甄馥、高振農編 中國近代哲學史史料學簡編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 十二月 二二二頁
- 胡平生編 復辟運動史料 臺北 正中書局 二月 五一六頁

- 范鈺昌編 瞿秋白在汀州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六月 二三一頁
- 洪金陵編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第三、四冊補編：1927-1937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八月 五七五頁
- 茅家琦 太平天國與列強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六六頁
- 高力克 歷史與價值的張力：中國現代化思想史論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五月 二九六頁
- 高惠羣、烏傳袞 翻譯家嚴復傳論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十月 一四六頁
- 麻天祥 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卷上：總論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五月 二九四頁
- 麻天祥 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卷下：各論 臺北 文津出版社 十一月 二八四頁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 抗日戰史 第二冊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十二月 四四二頁
- 康念德著、楊天宏等譯 李鴻章與中國軍事工業近代化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九月 一九四頁
- 馮 治、劉永彪 民國名人逸聞錄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三月 二八七頁
- 陳永志 郭沫若思想整體觀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十一月 三一頁
- 陳其光編 中國當代文學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一月 五七四頁
- 陳香梅 春水東流：陳香梅回憶錄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四二三頁
- 陳祖武 清初學術思辨錄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三四四頁
- 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等紀錄 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一九九頁
- 陳錫祺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七月 四七一頁
-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書信(五) 長沙 岳麓書社 八月 三八五二頁
- 黃逸平 近代中國經濟變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八月 四七〇頁
- 傅衣凌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月 二二九頁
- 張本楠 王國維美學思想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一月 二六八頁



- 張順清、李金山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六月 三三六頁
- 張錫勤 中國近代的文化革命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十月 三二八  
頁
- 張靜如、劉志強編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 北京 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六月 三八九頁
- 賈祖麟 胡適之評傳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三月 三〇七頁
- 楊紀元 李大釗研究論札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六月 二六七頁
- 楊錦麟 李萬居評傳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八月 二九二頁
- 鄭繼兵等 艱難的歷程：中國百年的現代化追求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 九月 二八二頁
- 劉秉揚、曹培森編 中國近代史：1912-1987 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 八  
月 六一五頁
- 劉留生、張治榮 中國近代戰爭實錄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十二月  
一五五頁
- 蔣永敬 中國對日抗戰史 臺北 正中書局 四月 一一四頁
- 橫松宗 魯迅評傳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二三五頁
- 戴震研究會等編 戴震全集 第二冊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六月 一二  
四七頁
- 鍾文典 太平天國開國史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四四八頁
- 蘇中立 救國啟蒙啟示：嚴復和中西文化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六  
月 二八九頁
- 中央檔案館等編，小林英夫等編譯 證言：細菌作戰——BC兵器的原點  
東京 同文館出版 十二月 三三九頁
- 中村哲夫 同盟の時代——中國同盟會の成立過程の研究 京都 人文學院  
三月 二三頁
- 田嶋信雄 ナチズム外交と「滿州國」 千倉書房 二七九頁
- 佐藤元英 昭和初期對中國政策の研究 東京 原書房 四三二頁
- 依田憲家教授還曆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 日中兩國の傳統と近代化：依  
田憲家教授還曆紀念 東京 龍溪書舍 四月 四九一頁
- 金靜美 中國東北部における抗日朝鮮・中國民眾史序說 東京 現代企劃  
室 六月 五二〇頁

- 長野廣生 西安事變 東京 三一書房 四〇六頁  
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編譯 南京事件資料集 二冊 東京 青木書店 十月  
九六四頁  
隅谷三喜男等 臺灣の經濟：典型 NIES の光と影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二月 三二七頁  
Alexander, Bevin. *The Strange Connection: U.S. 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72*.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64pp.  
Ching, Julia & Oxtoby, Willard G. eds. *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33pp.  
Dittmer, Lowell.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  
shington Press.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ding, Harry. *A Fri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  
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458pp.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Ident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4pp.  
Huang, Sung-K'ang. *Lu Hsu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Hyperion Press, 158pp.  
Jenner, W.J.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Viking Penguin, 272pp.  
Kelliher, Daniel.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  
rm, 1979-198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4pp.  
Leung, Edwin P.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576pp.  
Lowe, Joseph D.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iest  
Dynasties to the Present Day*. Lowe, Joseph D., Publisher, 565pp.  
Lowe, Joseph 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ce 1894*. Lowe, Joseph

- D., Publisher, 375pp.
- Niu, Xiaodong. *Policy, Education and Inequalities in Communist China Since 1949*.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Ranis, Gustav ed. *Taiwan: From Developing to Mature Economy*. Westview Press, 454pp.
- Schram, Stuart R.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I The Pre-Marxist, 1912-1920*. Armonk, NY: M. E. Sharpe, 639pp.
- Shaw, Yu-Ming.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81pp.
- Tang, James Tuck-Ho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5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64pp.
- Yinde, Zhang. *Le Roman Chinois Moderne, 1918-194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69pp.
- Zhang, Shu-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02pp.

### 一九九三年出版

- 于化民 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二月 一九四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三)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四〇一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五八三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口述歷史(4) 二二八事件專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月 三九三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期 二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八八一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一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三〇〇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目室編 經濟檔案函目彙編 第二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二三九頁

- 中央檔案館編 毛澤東手書選集 1-10 卷 北京 北京出版社 十月
-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 毛澤東軍事生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八月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 北京 中華書局 四月  
一一七七頁
-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十五) 臺北 近代  
中國出版社 五月
- 尹萍 海洋臺灣 臺北 天下雜誌社 六月 一九六頁
- 王育德 臺灣：苦悶的歷史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月 二八八  
頁
- 王慶祥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二月 三七〇頁
-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 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1898-1911 北京 北  
京大學出版社 四月
- 古井喜實 日中關係十八年——古井喜實回憶錄 北京 中國和平出版社  
十一月
- 江秀平 走向近代化的東方對話：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 北京 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九月
- 江鳳蘭編 國民政府時期的鹽政史料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五二五頁
- 江燦騰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六月 二四二頁
- 朱文原編 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 二冊 臺北 國史館 四月 九四  
二頁
- 朱金甫編 清末教案 第一冊 北京 中華書局 三月
- 余繩武、劉存寬編 十九世紀的香港 北京 中華書局
-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等紀錄 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五月 五六九頁
- 汪榮祖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十一月 四三一頁
- 李松林 蔣氏父子在臺灣 北京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六月 六六九頁
- 李恩涵 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八月 三五六頁
- 李筱峯 從終戰到二二八——島嶼新胎記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月 二一六頁
- 李進發 日據時期臺灣東洋畫發展之研究 臺北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六月

## 四六三頁

- 李雲漢編 中華民國名人傳(十二) 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八月
- 李瑞全 當代新儒學之哲學開拓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三月 三〇九頁
- 松本一男 毛澤東評傳 臺北 新潮社文化公司 二月 三二八頁
- 松本一男 周恩來之路 臺北 新潮社文化公司 二月 三一四頁
- 林品桐等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二輯)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四月 五五〇頁
- 林能士 辛亥時期北方的革命活動 臺北 正中書局 一月 五一〇頁
- 林偉盛 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羅漢腳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部 三月 一九二頁
- 林瑞明 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 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八月 四六〇頁
- 拓曉堂 中國近代外交內幕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十一月
- 來新夏主編 北洋軍閥(一)——(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四月 三六一  
一三頁
- 吳田泉 臺灣農業史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四月 五四六頁
- 吳劍雄 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 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十一月 三四二  
頁
- 金石井編著 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 北京 中國大地出版社 三〇三  
頁
- 金鳳 鄧穎超傳 二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三月 一一一七頁
-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 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關係  
編年史(1919-1991)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月 七〇二頁
- 范咸 重修臺灣府志(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五月 四八四頁
- 范咸 重修臺灣府志(下)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五月 三二六頁
- 姜明清編 捐獻史料 臺北 國史館 二冊 六月
- 侯外廬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月
- 高拱聯 臺灣府志(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五月 三〇二頁
- 高泉 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上)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七  
月 四六九頁
- 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 晉察冀日報史：1937-1948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孫洪智、張春雷 梁啟超 大連 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 一月 一八四頁

- 唐振常主編 近代上海繁華錄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二九五頁
- 唐瑞裕 清季天津教案研究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二月 一八六頁
- 許家屯 許家屯回憶錄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十月 六六六頁
- 許雪姬 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北京的辮子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月 一三六頁
- 許雪姬訪問、官曼莉等紀錄 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1940-1962)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月 三一五頁
- 陳正茂等編 曾琦先生文集 三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一月 一七四三頁
- 陳存恭訪問、陳美惠紀錄 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月 二一二頁
- 陳志明 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臺北 商鼎出版社 一月 三四五頁
- 陳芳 王國維：新史學的開山祖 臺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四月 一三二頁
- 陳書麟、陳貞壽 中華民國海軍通史 北京 海潮出版社 二月 六〇五頁
- 陳偉 中國現代美學思想史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四一六頁
- 梁培寬編 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 北京 中國工人出版社 八月
- 康無爲 (Harold Kahn) 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月 一〇〇頁
- 康綠島 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臺灣經驗 臺北 卓越出版社 十月 二八九頁
- 曹永祥 噶瑪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 臺北 前衛出版社 二月 三九〇頁
- 曹靖國 中國近代新史學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四月
- 國史館編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八輯) 臺北 國史館 三月 五六四頁
- 國史館編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九輯)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五四四頁
- 國史館編 國史擬傳(第四輯)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三五九頁
- 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編 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六月 五二六頁

- 國立藝術學院編 近代中國美術研究資料彙編 臺北 國立藝術學院 九月  
一七六頁
- 黃振涼 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關係 臺北 正中書局 八月 三三九頁
- 黃嫣梨 蔣春霖評傳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八月 四二六頁
- 張文江 文化崑崙：錢鍾書傳 臺北 業強出版社 六月 二六四頁
- 張希賢 陳布雷與陳伯達：踩在中國歷史轉折點上的兩位秘書 太原市 書  
海出版社 五月 四八三頁
- 張晉藩編 清朝法制史 北京 法律出版社 十月
- 張國風 儒林外史及其時代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三月 六〇〇頁
- 張魁堂 張學良傳 臺北 新潮社文化公司 二月 三九八頁
- 張錫勤 中國近代思想史 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三月 六七五頁
- 馮爾康 清史史料學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十一月 五九六頁
- 葉石濤 臺灣文學史綱 高雄市 文學雜誌出版社 九月 三五二頁
- 葉高樹 降清明將研究(1618-1638)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專刊第23種 十月 三七二頁
- 葉肅科 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 臺北 自立  
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九月 三七六頁
- 楊 健 墓地與搖籃：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 北京 朝華出版社 一月  
四五二頁
- 楊錦麟 李萬居評傳 臺北 人間出版社 十一月 四一六頁
- 鄭大華 梁漱溟與現代新儒學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九月 三六〇頁
- 鄭明嫻等編 當代臺灣文學評論大系 五冊 臺北 正中書局 五月 二七  
六九頁
- 鄭樑生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三)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二月 二一〇頁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通志(上)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五月  
四二八頁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通志(下)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五月  
三九四頁
- 臺灣總督府編著 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臺北 捷幼出版社 九  
月 四二〇頁
- 蔣永敬 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五月
- 霍啟昌 香港與近代中國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八月 二〇〇頁

-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譯 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三月 四〇八頁
- 薛化元 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 臺北 稻禾  
出版社 二月 四〇七頁
- 戴寶村 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月  
一三六頁
- 謝國興 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  
月 一三六頁
- 鍾逸人 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回憶錄 臺北 前衛  
出版社 十一月 六九一頁
- 藍博洲編著 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  
公司 四月 三八六頁
- 韓文甫 鄧小平傳（上、下）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九月 一〇〇〇  
頁
- 懷 冰 徐蚌會戰 臺北 耀昇出版社 六月
- 三日月直之 臺灣拓殖會社とその時代（1936-1946） 福岡 葦書房 八  
月 五三七頁
-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 日中戰爭：日本・中國・アメリカ 東京 中  
央大學出版部 三月 四六五頁
- 井尻秀憲 臺灣經驗と冷戦後のアジア 東京 勁草書房 七月 二五八頁
- 日本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三卷（昭和四年對中國  
關係） 外務省 三月 一一五九頁
- 矢澤利彥 西洋人の見た十六——十八世紀の中國官僚 東京 東方書店  
十一月 二一六頁
- 伊藤潔 臺灣——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 東京 中央公論社 十一月 二五  
二頁
- 安井三吉 盧溝橋事件 研文出版 十一月 三四三頁
- 吉田莊人 人物で見る臺灣百年史 東京 東方書店 十月 二五六頁
- 宮島昭二郎編著 現代中國農業の構造變貌 福岡 九州大學出版社 二月  
三九八頁
- 塚瀨進 中國近代東北經濟史研究——鐵道敷設と中國東北經濟の變化 東  
京 東方書店 十一月 二五六頁



- 楊威理 ある臺灣知識人の悲劇：中國と日本のはざまで葉盛吉傳 東京  
岩波書店 二月 二九一頁
- 藤井省三 現代中國の輪廓：魯迅、胡適から鄭義、莫言まで文學を通して  
読む 東京 自由國民社 六月 二三九頁
- 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369pp.
- Bickers, Robert A.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  
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93pp.
- Cushman, Jennifer.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216pp.
- Finkelstein, David M.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From Aban-  
donment to Salvation*. University Publishing Associates, Inc., 392  
pp.
-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  
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reng, Do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Saint Martin's Press.
- Harrell, Stevan and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Westview Press, 300pp.
- Henriot, Christian.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  
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sieh, Jimmy. *China: A Provincial Atla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Hunter, Alan and Chan, Kim-Kwong.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4pp.
- Johnson, Linda Cooke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  
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310pp.
- Leng, Shao-Chuan ed. *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in the Deve-*

- 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Vol. III.*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30pp.
- Leonard, Jane K. and Watt, John R. *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 The Qing Imperial State and the Economy, 1644-191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6pp.
- Lu, Tonglin ed.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14pp.
- Manion, Melanie.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4pp.
- Muehl, Lois and Muehl Siegmar. *Trading Cultures in the Classroom: Two American Teacher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88pp.
- Ruitenbeek, Klaas. *Carpentry and 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the Fifteenth-Century Carpenter's Manual Lu Ban jing.* Leiden, New York, and Köln: E. J. Brill, Sinica Leidensia vol. XXIII, 520pp.
- Singer, Aubrey.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Qian Long, 1729-94.* Trafalgar Square, 192 pp.
- Smith, Richard J. and Kwok, D. W. eds.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inese Though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64pp.
- Solinger, Dorothy J.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 Wang, Yeu-Far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1949-1989.* Aldershot: Avebury, 173pp.
- Widmer, Ellen and Wang, David Der-Wei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韋慶遠教授

↓ 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右）與葉文心博士（左）主持歡迎酒會



## 本期要目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  
曾國藩先生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  
亞洲商業網路（1850－1930）會議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第43次全國學術大會  
學人簡介 韋慶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度藏中國檔案之介紹〈一〉  
俄羅斯檔案館中保存的有關中國的材料  
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1918－1937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簡介  
新書評介八本

